

1770

麻城文史

第四輯

政協麻城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麻 城 文 史

第 四 辑

(内部发行)

政协麻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月

封面题字：范志斌

封面设计：李志华

校 对：黄立美

赵华荣

李清萍

冯 同

范道熙

范志斌

《麻城文史》 内部资料 1992年10月

编辑出版：麻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开本：1/32

印 刷：麻城市印刷厂 印数：2500册 字数：183千字

湖北省内部图书准印证：〔1992〕鄂麻图内字 第8014号

工本费：3.00元

主 编：范志斌

ZB05/45

编 辑：范志斌 范道熙

继续弘扬民族精神
继承光荣传统
弘毅教育
两新白文
明

李蔚青题

九二年十月十日

目 录

麻城市政协主席李蔚青题词

大 别 山 麓

大别山明珠——麻城市

.....李德望 (1)

当 代 风 流

董老与麻城人士座谈和诗

.....胡金勇 (4)

在朝鲜战场上的邓岳将军

..... (湖南) 盛星辉 (6)

人 物 春 秋

严立三先生传

..... (台湾) 袁守谦 (17)

- 严立三先生的学术著作
 澳 瀛 (33)
- 清廉爱国的湖北“三怪”之一严立三
 汪承武 (46)
- 清末翰林余晋芳事略
 吴树威 (49)
- 范赓尧和他的遗孀
 王慧芳口述 范道熙整理 (60)
- 坚强的战士 光辉的榜样
 统战部供稿 (74)
- 余少仁、余远声在辛亥革命前后
 余佩鸿 (76)
- 民主革命先驱屈子厚
 段美钧 (79)
- 辛亥革命先驱余万卿革命事略
 余佩鸿 (80)
- 余诚轶事
 余品安 (85)
- 林则徐与麻城籍学者袁铎
 ——最新发现的一则重要史料..... 刘 宏 (92)

明末文学家刘侗

.....江乐山 (96)

张献忠兵部尚书周文江

.....段美钧 (104)

古时才女亦多情

.....江乐山 (106)

苏轼与麻城

.....刘宏 (108)

梅之焕与“宝树”的传说

.....汪海藩 (110)

水 电 撷 英

峡谷明珠

——三河口水库、电站简介及修建侧记

.....阳绍江 (112)

历 史 回 顾

在龟山区斗争的岁月

.....贾本德 何钧 (128)

我在麻城“县委高产办公室”工作期间的见闻

.....缪境洁 (135)

教育史话

六十年来麻城教育史简略纪要

..... **吴伯厚** (140)

麻城风物

杏花村在麻城

..... 江乐山 (172)

麻城境内的史前文化遗存

..... 江益林 (179)

麻城建置沿革概述

..... 市台湾事务办公室 (182)

麻城市“八景”简介

..... 范志斌 (185)

五脑仙山

..... 李德望 (192)

五脑山帝主庙

麻姑仙洞

玉阁钟神秀 庙宇气轩昂

..... 刘昌珍 (196)

大别山里吊锅香

..... 周书安 (199)

故 乡 月 圆

麻城“五脑山”纪游

..... (台湾) 王忠顺 (200)

争 鸣 园 地

敦煌文书与王道士

..... 江益林 (210)

资 料 考 辨

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 邹功勇 (214)

湖广填四川

——入营占籍时期、祖籍、人数、分布、

性质、繁衍初考

..... (四川) 张映斗 范志斌摘 (218)

文海拾遗

关于《金瓶梅》最早收藏者的补正

..... 刘 宏 (221)

蜂业春秋

麻城蜂业溯源

..... 范道熙 (227)

科技之花

星火之光

——麻城市制药厂简介

..... 范志斌撰文 胡光全摄影 封二、封三

开创鄂麻人工科学栽培食、药用菌之
起源与发展

..... 李敬白 (241)

政协麻城市第三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成
员名单

..... (244)

编 后

..... (245)

大别山明珠——麻城市

李德望

麻城市位于中原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南麓，总面积3747平方公里，人口108万人。

麻城市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冲，往北经河南省的潢川、信阳，可达郑州、北京市；往东经安徽省的六安，可到合肥、南京、上海市；西南距武汉市130公里。106国道纵贯南北，国家已确定的京九铁路将横穿东西，并在麻城建中间站，京九线与京广线接轨点定在麻城。公路铁路交错，形成交通枢纽。另外，在距麻城100公里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和距麻城70公里的阳逻长江深水码头的建成，将进一步扩大麻城的航运、海运能力。麻城市的电话通讯可直拔国内300多个大中城市和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开通了国内外电报、电传业务，市内电话年增容量为4000门，基本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连结乡镇、沟通国内外、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

麻城市处在由安徽的合肥市、河南的郑州市和湖北的武汉市组成的中原大三角经济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是武汉、黄石、鄂州等城市向大别山辐射和吸引的窗口和门户，又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原料和产

品市场稳定、广阔，易受鄂豫皖三省省会城市的辐射和吸引，发展成为山区经济中心。

麻城市工业生产已达一定规模，骨干企业设备技术起点高、带动系数大，具备了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组成企业集团、实行系列开发的基础。工业以轻型、资源型为主体，能耗低，运量小，能实现扬长避短的良性发展。棉纺厂、气门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初具规模，外贸出口额逐年增加，已建成蚕茧、板栗、棉花等三个出口原料基地和八个出口专厂。黄金桥开发区的建设已经起步。

麻城市农业基础坚实，农业经济保障率强。由于气候条件优越，一般情况下，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境内既有平原又有山区和丘陵，大中小型水库星罗棋布，粮、棉、油、丝、茶、果、栗、桐、木、油茶、药材、猪牛羊肉和禽蛋等农副土特产品的商品率较高。随着农业商品基地的开发和建设，将有更多更优的商品为外贸出口和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货源和原料。

麻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大，现已探明的非金属矿产有优质陶土、大理石、花岗岩、玄武岩等17种，且分布集中，蕴藏量大。金属矿产有钛、铁、磁石、赤铁、铝、锌、铜、黄金等，品位高，质量优，可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能源基础设施明显加强。现建有110千伏变电站一座，容量为4万千伏安；35千伏变电站12座，容量为3万千伏安，均与华中大电网并网供电。市内小水电站85座，计120台，年发电1.9万多千瓦，还正在抓紧建设220千伏和11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各一座，35千伏输变电站6处，小水电5座。

麻城市城市建设初具规模。目前市区面积达 18 平方公里，人口 10 万人，近期内将发展成为 3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986 年撤县设市后，城市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除原有的东、西、南、北正街外，近年又新建了将军路、陵园路、工业路、青年路，开通了南、北环城路。市区人平住宅面积为 16 平方米。建有日供水量为 1.5 万吨的自来水厂一座，正在筹建日供水 3 万吨的第二自来水厂，可保证市区的生活和工业用水。有 110 千伏的输变电站一座。启用了微波通讯系统和程控自动电话，市区内各种服务配套设施如宾馆、医院、学校、影剧院、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场等齐全。市区商业繁荣，有商业网点 883 个，矗立市中心的麻城商场是鄂东第一流的商业大楼。

麻城市历史悠久，旧时名胜古迹比比皆是，现在仍供旅游的景点有龟峰旭日、柏子秋荫、麻姑仙洞、五脑山庙、杏花村遗址等。已建成的有龟山风景区，正在开发的有五脑山游览区。

董老与麻城民主人士座谈和诗

胡 金 勇

麻城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1962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莅临麻城视察。当时麻城知名民主人士——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吴伯厚，湖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胡衡甫（字秉钧）受到董老亲切接见，并相互诗词酬唱，谈笑风生，饶有风趣，在麻城传为佳话。

这天，风和日丽，董老神采奕奕，亲见旧地新颜，思绪万千，颇有所感。欣然作了一首题为《麻城》的七绝：“五十年前教学来，河山犹是市廛非。人民自建新生活，且喜麻安共举旗。”并在诗前序云：“一九一一年春，余曾执教麻城小学，尔来五十有一年矣。再到麻的则面貌大改，喜而有咏，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此诗后被录入《董必武诗选》第155页。吴伯厚、胡衡甫二先生对董老这位革命元勋十分敬仰，两位政协副主席即向董老献了两首七绝颂诗：“慈祥畴昔幸麻城，群众欢呼接寿星。七十万和六亿五，齐声共唱党恩深。”“德高望重白头翁，执教曾经驻考棚。五十年前施化雨，至今犹似太阳红。”董老见诗，非常高兴，写下了格调高雅，质朴清新的三首七绝，全诗如次：

“别麻城兼谢吴副县长伯厚、胡副主席秉钧赠诗。

多年未入麻城境，一望龟峰气已雄。人民衣食初能给，不久终将庆永丰。

辱承明教幸为多，况复深情作颂歌。我愧未能当万一，薰香盥沐诵无讹。

小住才廛五日期，采风已获数篇诗。十年改革兴新象，人物衣冠异昔时。

敬 请

胡副主席秉钧指正。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

董必武 未定草”。

董老德高望重，学识渊博，“革命功高誉未过”。而他写的诗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虚怀若谷、胸襟坦荡的风度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对民主人士的尊重。今读董老这些诗作，真不禁感慨系之，令人倍增敬仰。

嗣后，胡衡甫先生还就发麻城烈士陵园一事致函董老，董老曾惠赠过书签给胡衡甫先生。胡先生当时年届七十，曾深为感动地写道：“董老来麻城与我座谈和诗，这是我生平历史光荣的第一页，……我只有把毕生的精力，把学术经验毫不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努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并写下“研讨经方传后学，发扬仁术寿斯民”，“更喜东风陶万物，新栽桃李满山城”等激情满怀的诗句。

在朝鲜战场上的邓岳将军

湖南 盛星辉

邓岳，湖北省麻城人，生于1918年。他于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大学警卫排排长，后随部队参加了长征。抗日时期，他任抗大一分校区队长、干部营营长、军分区参谋长、八路军某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副旅长，副师长，师长。在抗美援朝时期，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第118师师长，后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组织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和阵地防御战。本文将介绍邓岳将军在朝鲜的战绩，特别是如何取得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的伟大胜利的。

1950年10月19日17时半，邓岳带领所属部队，肩负祖国人民的重托，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战场。当我军渡江入朝后，敌人没有发现我军，仍然继续分兵快速冒进。东西两线都有南朝鲜军进入我预定防御地区，我军利用敌人战略上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抓住这个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极好战机。

邓岳带领部队依据上级指示，连续行军五天，于10月24日达到北镇附近的大榆洞。邓岳停下等待从后面上来的张玉

华政委后。他们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警卫员带领四名朝鲜军人走过来，一问，才知他们是金日成的警卫队战士。他们说人民军总部就设在前面的山沟里，彭德怀司令员现在也在那里，要见邓岳、张玉华。大榆洞是朝鲜著名的四大金矿之一，位于平安北道西部。邓、张立即跟着朝鲜同志沿着山沟中一条小路疾步走去。透过半开的门，邓、张看到彭总在房里踱来踱去。

邓岳喊了声报告。彭总看到后脸上布满了笑容，与他们握手，招呼他俩坐下，讲了战场态势，然后说：“你们上来了，很好。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朝鲜战场形势不容乐观，我们要抓住战机，打好出国第一仗，为尔后扭转战局开个好头。……这里目前情况比较紧急，金日成同志也在这里，你们把部队拉上去，在温井北部，准备做个口袋，相机歼灭一部分冒进的敌人，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邓岳当即表示：“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彭总的期望。”邓岳建议彭总往后撤一下。彭总说：“我在这里不走了，这头一仗，我要看看你们怎么过打法，行还是不行。”邓岳感到肩上的担子一下重了许多，既要打好出国第一仗，又要保卫彭总的安全。他给彭总敬礼后，就与政委一起走了出来，边走边议论，无论如何要打好这一仗，因这一仗关系到国威军威，也关系到金日成和彭德怀同志的安全。

10月24日夜，邓岳带领部队进入北镇以东地区。此时，能隐隐见到处于几十里以外的温井燃烧的火光，由此看来，敌人已先于我军占领温井的判断是正确的。分析当前敌我态势，在敌人尚不知我军主力已过江的情况下，还有可能继续北犯，为了做好战斗准备，邓、张商量后，决心以行军序列

为基础，利用有利地形相机歼敌一部。

在温井北两水洞以北的483高地上，邓岳设立了指挥部，随即召开了作战会议，研究具体打法。师长虽已有了腹案，但还是让大家先谈谈自己的想法，才站起来指着地图谈自己的意见。当面之敌是伪军主力第六师，进展最快。估计他们可能要经温井、松木洞，直扑楚山。敌占温井后为保障其侧翼安全，有可能派部分兵力攻占北镇。而我们恰恰守在这条路上，若依靠东木山下的诸高地，居高临下，可趁敌人未发现我军前打他个措手不及。他看表已是凌晨4点。这时部队大调动已来不及了，便明确354团就地打，要迅速占领牛下洞、富光洞、216、409·5、239·8高地。以一个营守住216、409·5高地，这个营要把敌人放进来，一直放到师指挥所鼻子底下这座山为止，然后再把口子卡住，既封住里边敌人，又抗击增援之敌。352团、353团在两水洞西北和北镇以东地区就地占领阵地，随时准备战斗。邓岳还说，这么打实际还没有形成彭总所要求的“装口袋战术”，而只是一次山地伏击。他还交代说：“战斗打响后，敌人可能要向九龙江逃跑，如敌人涉江逃跑，就用火力和步兵追击，把他们消灭在九龙江两岸。”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多钟，朝鲜大榆洞志愿军作战司令部里，气氛十分紧张。巨幅作战地图上，从温井伸出的一支兰色箭头指向两水洞，这是伪六师二团的两个营。从北镇伸出的两支红色箭头象一把钳子，将两水洞吞向虎口。这就是我40军118师的作战部署。根据邓岳早上来电，就汇报了敌人一部兵力和火炮正从温井顺公路大摇大摆地开进了两水洞我方埋伏区域。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仗就要打响了！彭

德怀司令员和邓华、洪学智副司令员正在等着消息。

一切情况都证明我方估计的正确。二十五日八点多钟，敌先遣尖兵班二十多人分乘两辆中型卡车，顺着通往温井的公路，从牛下洞那边开过来，沿路进行侦察。达伙强盗们远远撇开他们的大部队，大模大样在公路上行进。九点钟后，大队敌人毫无戒备，也大摇大摆乘车前进。当敌人尖兵进至两水洞小桥时，被我军侦察连迎头截住。战斗打响后，我354团1、3营，352团、353团各一个营，由四面突然向敌射击，数辆满载敌人的汽车顷刻被击毁，30多辆汽车和后面的步兵被切成三段。南朝鲜军遭到突然攻击后，顿时大乱，兵力来不及展开，火炮挂在车上，也忘了卸架。一会儿功夫，两个步兵连及尖兵连的一部就被包了“饺子”。为了解救在包围圈里的前卫营，敌团主力向我防守的216、490高地的二营发起了猛烈攻击，企图占领高地，撕破伏击圈，掩护被包围的部队后撤。战斗渐渐发展到激烈状态。

邓岳站在483高地隐蔽处，手托望远镜，密切注视战斗形势的变化。战斗一开始，他就非常关心担任扎口子任务的一营的情况。他一遍又一遍让通讯员、让参谋了解二营前面敌人的情况。他忘记了抽烟喝水，因入朝第一仗不只关系本师的荣誉，且和志愿军、新中国的威望联系在一起，和今后的作战任务联系在一起，他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邓岳通知二营，拼死也得挡住敌人，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许用预备队。他一边观察，一边听情况报告，把注意力集中在二营防御的216、490高地上。此时，二营阵地硝烟弥漫，枪炮轰鸣。南朝鲜军在山下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反扑。在2营4连防守的牛下洞216高地前，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先后

发起了十次进攻。由于坚守前沿阵地的8班大部伤亡，3排弹药又全部打完，阵地一度丢失。但4连又组织2排夺回了阵地，把敌人击退。我军情绪越战越高昂，李承晚军越冲越泄气，最后几次冲锋尽管有军官督战，几个士兵冲到了山腰又被反击下去。一部分敌人涉水逃到了九龙江南岸，也被奉命前来配合温井作战的120师部队歼灭。战斗进行到下午2时，这个被敌人誉为神锐的伪2师2团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全部被我歼灭。据初步统计，毙敌300多名，俘敌160多人，缴获火枪22门，汽车38辆和大批军用物资。美军上校顾问赖勒斯亦被生擒。此刻，邓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抹了一把湿润润的额头，大声对警卫员说，给我找点吃的来。

“铃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在志司指挥部的木板楼里激响着。一位参谋接过电话后，说：“彭总，是118师邓师长的电话。”彭总接过电话就问：“怎么样？邓岳！吃了肉包子没有？”“吃上啦，全肉馅的！”话筒里传出的声音很大，直震彭总的耳鼓。彭总有意将话筒从耳畔拿开些，好让凑上来的邓华、洪学智等人也听得清楚。“露了馅没有？”彭总又问。“一点没露，包得严严实实”。邓师长的声音因兴奋而有些发颤，“敌人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毫无搜索，顺大路来了，钻进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三个团采用迎头、截尾、斩腰的办法，向敌突然猛攻，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敌人大炮还没有卸架就位就被缴获啦，还抓了一个美军顾问，我已派人把这家伙押到总部去啦……彭总，这一仗真痛快，一个小时解决战斗，全部歼灭！”“好，打得好！总部要通令嘉奖你们。”彭总激动地说。“彭总，给我们交代新任务吧！”“今晚你们就会同一二〇师攻占温

井，之后调头北上，截住伪六师七团……”放下电话后，彭总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大叫：“参谋，快给毛主席发电，报告首战胜利，让他放心。”

当晚，我军乘胜占领了温井，击溃了李伪军一个团。这样，我军就在温井挡住了冲向鸭绿江的敌人。在出国第一仗中，我军就以勇敢顽强的胜利，作了光荣的开端。我军温井初捷，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所以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这正是敌人侵占平壤后的第五天。

美军和南朝鲜军并没有因温井一仗而停止冒进。南朝鲜美军六师七团先头营乘车进至鸭绿江边的楚山，并炮击中国边境。为歼灭冒进之敌，彭总命令118师连续作战，沿北镇北上，堵歼南朝鲜军6师7团，同时令50军148师由辑安过江向楚山前进，两师协力会歼，突进至楚山、古场洞地区之敌，并令邓岳指挥两师作战。接到命令后，邓岳虽几天没休息，但因他具有越打仗身体越舒服的习惯，所以神情仍然饱满，一面和张政委商量如何完成任务，一面命令部队迅速北上。

两天后，邓岳率部在龙谷洞一带发现了敌人，但148师还未到，是打还是等？如果打，本部将受到很大压力，且恐打草惊蛇；如不打，则不能诱使南朝鲜军的增援，影响总部歼灭一部分敌人的战役企图。他终于果断地下达了“打”的决心。他命令353团首先夺取752高地，然后沿公路向龙谷洞攻击。353团两个营插到龙渊洞公路断敌退路，该团一个营和352团一个营向古场洞攻击前进，于30日2时攻占龙谷洞，将李伪军7团大部歼灭。至此，118师九昼夜连续不停打了

三仗，歼敌1900名，缴获各种炮77门，枪枝509支，各种车辆209台，打了出国作战第一个句号，获得志愿军首长的嘉奖。

敌人为了维护全球称霸的战略，决定于11月24日，发动所谓“圣诞还乡”的总攻势。118师正面之敌美2师接替了李伪军第六师球场至德川以西西仓线的价川地区作战任务，沿清川江东岸，向熙川方向进犯。25日，其9团进抵新兴洞，38团进至苏民洞一线。邓岳所部奉命配合，38军在宁边、球场、云山一带地区作战。11月25日，北朝鲜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清川江江宽60多米，水深平均一米。根据任务需要，邓岳带领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徒涉清川江。江险水寒，诚非易事。他命令，353团两个营从正面由北向南攻击，留1个营在江西岸攻歼柳洞之敌；354团由左侧插到敌后，由南向北，配合353团攻歼新兴洞之敌；352团则于江西岸作预备队视情况加入战斗。353团先声夺人，以迅速动作歼敌一个连。1连周清高单枪杀入敌群，一人打死打伤30名美国鬼子。在指挥所里，邓岳听到这个消息连声说，一定要给这小伙子请功。战斗一打响，指挥所气氛紧张，354团走错方向联络不上。右翼120师359团过江突破了敌人防线，切断了球场与新兴洞之敌的联系，这时如354团加入战斗，敌人必毁无疑。然而354团打错了方向，使新兴洞之敌得以逃脱。邓岳边生气边调整部署，组织部队由北向南展开追击。29日，他指挥352团追敌至腹里地区展开激战。6连冲锋在前，在侠下站北山，副排长金克智率一个战斗小组，以短兵火器打死美国鬼子20多人，用破甲雷连续击毁敌坦克五辆，在步兵打坦克方面立了头功。敌且战且退，29日，邓岳率部尾追溃逃

敌人至军隅里附近，为了保证部队冲击有力，邓岳集中352、353团主力攻歼军隅里之敌。30日白天，他指挥部队与有空军掩护的美2师展开激战，歼美2师一部。美军向安州跑去，邓岳率部追到安州，占领了这个作战要地。在第二次战役中，118师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第一次交战取得了优异成绩：歼敌776名，缴获各种炮60门，枪544支（挺）、汽车136辆。

在第二次战役中，敌遭我沉重打击后，被迫退回“三八线”以南地区，建立纵深防线。志愿军组成左右两个纵队，以志愿军6个军、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作战，实施进攻，粉碎敌在“三八线”预设阵地的防御，歼灭临津江东岸迄北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布防之伪军第1、第2、第6师及5师一部。作为右纵队的组成部分，118师当面之敌是伪军第6师。1950年12月31日，根据伪军第6师的部署，邓岳带领部队以高昂的战斗热情向敌人发起了突然攻击。352团渡江后向大田里攻击，354团向大田里北山攻击，353团为师预备队。

由于敌人工事和火力强，地形对我不利，易守难攻，加之渡江地点处分上的失误，又遭敌人航空兵的袭击。同样由于空袭的原因，配属的炮兵29团仅上来一个连，这一切，使战斗发展不太理想。邓岳很着急，他想不能在路上耽误，下令要各团尽最大的努力发动进攻。于是，352团、354团，不畏艰险，与敌展开了逐地、逐堡争夺。战斗到第2天拂晓，终将敌“三八防线”突破。

这时，友邻119师主力突破临津江后，进展到安兴里、上牌里地区，将伪6师退路切断，形成歼敌的良好时机。战斗发展到这一步，邓岳焦急的心情消去一半，随即向全师发出

兜屁股歼敌的命令。但事情不能尽如人愿，友邻部队未能完全切断敌人退路，敌伪6师在飞机掩护下，一部歼灭、大部逃脱。战斗至1月8日，鉴于敌军有诱我深入而后在我侧后登陆的企图，我军停止追击。这一仗，经历七昼夜行军战斗，118师追到“三七线”，歼敌2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54支，击毁击伤伪机各一架。

美李军遭我第三次打击，退至“三七线”后，为挽回失败影响，缓和内部矛盾，纠集了16个多师约25万人，趁我军疲劳、补给困难之际，采取齐头并进，发起全线进攻。至2月9日，东线美2师第33团及法国营被阻止在砥平里地区，伪8师、5师进抵横城以北，7师、9师及首都师进占大美山、江陵之线。在整个战线上，横城、砥平里地区之敌相当突出，造成了有利我反击的态势。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在汉江以东的东线和汉江西的西线积极抗击敌人，集中兵力对中线突进之敌反突击，求得在运动中歼敌一部并向敌纵深发展，威胁西线之敌侧后，以粉碎敌之进攻。

2月5日，邓岳师结束修整，部队由逍遥洞、议政府地区出发，于2月10日20时前进至龙头里、安兴里、寺洞、葛岁里地区待机歼敌。西线部队将敌主力钳制在汉江以南后，邓岳奉命率全师，并指挥355团、军炮兵团大部及炮兵29团2个连，向化岱、大之马地段实施反击，主力直插广田，割裂敌防御部署。邓岳经过认真思索，在师作战会议上，宣布了作战命令，作了具体部署：354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在上桥洞、白化岱之间实施反击，首先歼灭397.4高地之敌，同时团主力直插新岱。353团配属师山炮营，首先以一个营的兵力攻歼上高岱东山之敌，同时以一个营迅速攻占地吾谷和

373高地，尔后主力向城谷、广田进攻。352团在354团、353团之间经谷村直插广田地区，抢占要点断敌退路，若敌南逃则追歼之。353团、354团在向敌纵深发展进攻时，应主动与352团取得联系，积极向其靠拢。355团为师第二梯队，配置在安兴里以南地区，反击发起后，负责堵歼逃敌，保证师侧后安全，并随时准备支援352团战斗。2月11日17时，炮火打破了寂静。17时20分，全线发起攻击。

经过激烈战斗，敌部署被我完全打乱，预定计划均已实现。邓岳为了歼敌大部或争取全歼敌人，即向352团下达了于12日拂晓前想尽一切办法攻占广田东山和526·7高地的命令。352团即以2营攻击广田东山，3营攻击536·7高地。12日，3营7、8连攻占了536·7高地，2营5、6连也迅速攻占了广田东头。清晨，2营发现新村以北和碧鸡山西侧公路上的敌人在30多架飞机、十几辆坦克掩护下夺路突围，遂令五连迅速出击，击毁敌汽车、坦克数辆，堵塞了敌人南逃的公路。敌为掩护主力撤退，猛烈轰击我二营阵地，随后步兵疯狂反扑。5连激战两小时，仅剩下5人，仍在喊：“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跑掉！”广田东山腿阵地因5连伤亡较大一度失守，6连随即猛扑上去，夺回了该山腿。12日10时敌人纷纷溃逃，被我围歼。12日15时，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共歼敌2798人（其中俘美军267人，日军1人，菲军2人），击毁坦克4辆；缴获各种火炮75门，枪1800余支（挺），汽车140余辆，炮弹2700余发，子弹12万余发，以及其它军用物质。

在第五次战役中，邓岳指挥全师于1951年4月27日突破伪军第6师防线，当夜前进60余公里，直插敌纵深，按时到

达上级指定位置，完成断敌退路与割裂敌人的任务。至4月26日，他们在加平以北地区连续粉碎了美骑一师7团、英27旅、加拿大25旅等部的反扑，歼敌1529名，逼迫敌人退至汉江南岸。5月12日，118师进至平壤以南的祥原地区，一面担任守备西海岸防敌登陆的任务，一面进行整训。

1952年2月，邓岳又率领部队担任西线作战，全军转隶第19兵团指挥，防守马良山、天德山，反敌袭击。1952年10月，邓岳指挥部队参加了秋季战术反击，圆满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邓岳自1950年10月19日入朝，至1953年7月28日回国，他带领部队在朝鲜战斗1000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他显示了一个高级指挥员果断、坚韧、灵活的指挥才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邓岳将军已在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任上离休。

(作者曾任邓岳部队司令部译电员)

严立三先生传

袁守谦

作者袁守谦，字企止，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随由严重（立三）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参加北伐战争。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防部上将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本文原刊于台湾《湖北文献》。

引 言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创校时，分编考录之学生为四个步兵队，上设总队，置总队长，承校长命，并受训练部之指导，负学生生活管教及操场野外术科督练之责。一期学生施教约至中期，严重先生以战术教官兼总队长，迄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总队长一职都是先生连任，至第四期才调为训练部及教授部主任，旋外调出任北伐军军职。军校教育到了二、三、四三期，增设了几个兵科，编队也加多了，合第一期及尚在学校受训第四期学生的总人数，约五千有奇，这些受过先生教导的学生，对于先生的学问、人格及诲人不倦的精神，无不由衷地兴起崇高的敬仰，没有间言。先生于民国

三十三年病逝湖北恩施，距今已三十五年，我起了多次念头，拟为先生写传记，总是迫于战事，迁延未能执笔，觉得非常负疚。幸而先生几册遗著孤本，还有录有副本的日记、读书录、杂著、文件等，都由颜道鹏兄带到了台湾，今复得以细读一遍，羹墙之影，警欬之声，感印益深，谨草此文，及年表一篇，以告亲炙先生训诲诸同学，与世之欲知先生行谊之人士。

家世及学历

先生姓严名重，字立三，晚年字以行，湖北麻城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年九月二日（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岁）。父宜焕先生，有军功，做过江西新建县县丞，又任江西臬司文案颇久，以治狱精审，为选任主管所倚重，后来调职安徽省颖州府通判，并摄理一个短时期的府事，大概在满清被推翻时解职了。母蔡太夫人。兄治卿。弟正，字公威，黄埔军校二期生。妹细姑，适王云章。夫人杨姓名佩秋，汉阳杨春泉知县女，民国二年与先生在安庆结婚，时先生二十二岁，夫妻终身相敬有加，到三十八岁时举一子，名善明，其前所育，都夭折了，这是先生家世的大略情形。

先生六岁在南昌寄寓家塾中启蒙，一直到十六岁未间断，塾师也始终是钱尧峰先生。这期间，先生读过些什么书，无从查考，惟就宣统二年写有日记时起，常载有温习五经、四子书、史记、古文及作文做诗之要领、写字执笔运腕之领悟等记录，可以推知先生曾经读过这类书籍做过这些功课，且在科举未废以前，制艺时文，读过做过，也是意

料中事。民国前四年冬季，先生考进安徽陆军小学四期肄业，民前一年武昌起义时辍学，参加了推翻满清帝制的民族革命大业，其详另章叙述。陆军小学于民国元年九月复课，先生回校续读，十二月以优等第一名毕业。三年五月获准入安徽陆军预备所补习，八月升学北平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二期，五年九月毕业。是月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候补生队工科，六年三月入伍期满，编为军官学校第五期军官生，七年九月毕业。分派参战军服务。八年六月入参战军交通教练所速成班肄业，九年四月毕业。是月入陆军部无线电传习所肄业，六月直皖战起，传习所停办，八月复课，十年四月毕业。先生学校学业至是结束。

出处与事功

先生自谓：“平生出处可分为三期，辛亥参加起义，推翻帝制，为第一期；任教黄埔军校，参加北伐，驱除北洋军阀，为第二期；出任省政，参加民族抗战，为第三期。”兹依其所示，分述如左：

第一时期：民国前一年八月（旧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陆军小学校。校中学生在九月间纷纷走散，先生也请假到了武昌，投效义军，剪去辫发，作家书禀告父母，表示献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忠义军任先生为第二营司书生，先生不顾职位之高低，到职不久，凭其观察，凭其见解，概然上书都督黎元洪，论推翻满清用兵之大战略，又上书忠义军统领王国栋，论武汉地区对抗清军攻守形势之得失，发抒了起义的雄抱。其上黎元洪书，亟言当时起义军固

守长江汉水，以老清师之策略为非计，应该上联湖南军下荆州，断敌的右臂，下联九江军，登陆黄州，扼敌的东疆，此为三方环攻却敌之方，而大举进攻之策，则必须联闽粤江浙的水师兵舰，自渤海叩大沽以击其东，联川洛淮泗的陆军，渡黄河以击其南，号召晋陕之师，自大同宣化以击其西北，这样四面楚歌之势形成，清室没有不面缚衔璧以投诚的了。其上王国栋书，畅论兵法攻坚则瑕亦坚，攻瑕则坚以瑕的道理，而谓前此上黎都督书不报，终于见到了汉阳失利之事，今日重兵固守龟山青山，为我之坚，蔡甸河窄，守兵不多，敌若来攻，为我之瑕，故分兵自汉水上游渡河攻敌，乃为不可缓之图，两书又有一共同建议，先生以为新募的士兵，与知识闭塞的民众，都不知道起义军之所谓义是什么？满清祸国殃民的罪恶是什么？这必须随时地派人广为宣讲（意即宣传），士气才会振奋起来，民心才会向附而助我，此为我最大的疏忽，必须即刻改进。从上面两书的论点看来，虽然当时全国的政情，先生未必全盘了解，但以弱冠青年，仅在陆军小学研习两三年，就有这种攻势战略的思想，及宣传为作战先锋的看法，如果没有学养基础，是不会具申这等意见的。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说，那就是先生上书黎元洪，虽然没有着落，而另一书却为王国栋所重视，要调他到司令部去当差，先生认为他的建议，乃为大局着想，不是以此为进身的手段，因此谢绝了这位统领的好意，先生的人格，于此也可以窥见其端倪。等到清帝逊位，民国建元的春初，先生深感起义军各将领，思想陈腐，积习太深，而自身又位卑年轻，不能有所建白，就毅然离开忠义军，应友人之约东游徐州，但所谋未能有成，乃藉此机会旅行济南、泰安、曲阜等

地，临黄河、登泰山、礼孔圣庙而回至安庆待命。九月陆军小学复课，得以完成其学业。

第二时期：民国十年先生将眷属安顿在南京居住，冬季到达广东，惟所存日记阙失民国八、九、十三年，其行止原委，无从查明，只知到广州后，出任了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某营副营长，营长为邓演达，邓为先生同期同学，此行当然是受了邓的邀约。十一年粤军第一师奉命北伐，先生参加五、六两月南雄至赣州间各次战役。十二年一月邓演达升三团团长，先生随升该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是时，总统府明令讨伐陈逆炯明，一月至十一月，先生率所部在西江、东江各地与陈逆部队作战十有余役。在这两年的军旅生活中，先生目击当时军中许多措施，如重赏组织敢死队，死刑处决逃兵，以及友军之纪律废弛、将领生活糜烂、残暴人民、干涉地方行政等等行为，认为都是军人的耻辱，不时发出感叹。经向邓演达多次陈明，决心退出戎马阵营，到十一月得到邓的谅解，允其回去南京休息，这一段经历，该是先生出处的序幕。十三年，总理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参与筹备，邀先生前往服务，从教育入手，培植新生干部、改革军队恶习、建立革命新基，是先生一向的主张，因此欣然就道。三月到广州，任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五月开学，任战术教官，八月调兼学生队总队长，十一月初，一期学生毕业，先生率领二期学生各队移驻广州市北校场，称为分校，校务由先生素揽。但开课之后，行政方面对于教委之配合，诸多棘手，先生觉得难以发挥教育功能，时萌去志，卒于十四年一月以料理私事为由，请假回南京了。回到私寓，即订定潜心做学问计划，颇有不再出任公

职之意愿。及至二、三月间，听到了党军东征与东江战事消息，先生却以未能献身此一战役，深深感到不安，然又不欲立即中辍其正在草拟“道学宣言”之写作课程，心情非常徬徨，旋以校长蒋公、党代表廖仲凯先生迭致函电驰召先生，乃摒挡再至广州，时第一次东征战事已告结束。六月，先生奉命仍任学生队总队长，时二、三期学生均在施教，九月，二期学生毕业，十五年一月，三期学生毕业。是月，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四期学生在校，调先生为训练部主任，五月，调任教授部主任，六月，调任北伐总司令部训练处长，先生从事之军校教育任务，终止于此。综观先生施教态度与教授方法，平实而专一，诚笃而谨严，每日先学生而起，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充分发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精神，尤以在操场上，观察极为周详，于收操时，讲评其得失，善则奖许之，遇有错误，必反复指陈训诫，或示范要求改正。官长、学生亦有苦其训导过严而繁者。我在二、三期时，任总队部教育副官，偶尔反映此情于先生，先生说：“矫正受教者的错误，是师道的神圣责任，知其失而不言，言而不透辟，即有失我的职责，他们久后，自然会体会到我这点苦口婆心不是误人子弟的。”到了晚上，先生总是后学生而就寝，一以准备课业，一以做些自己的功课，到了周末，更是繁忙。盖军校课程，有全期计划，有每周预定之进度，这预定表，先生总是饬我先拟初稿，呈阅时，必指出某处没有针对上周的得失，某处不合典范令的规定，某处违背了战术的原则，命照其指示重拟，然后作最后的核定，因是一表之成，常在夜深或星期日上午。此是先生对我个人的督教，既纯挚，又殷切，从不觉有厌倦意态。

至于先生律己之严格，生活之俭朴，处事之正直，在学生之心目中，不期然建立了最崇高人格的偶像，故其所发生潜移默化影响，亦至深远。十五年六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先生东调为总司令部训练处长，八月，兼任补充师师长，积极补训新兵，十一月开拔至韶关，转入江西，加入北伐军行列，十二月到达赣州，先生间道至南昌晋谒总司令蒋公，请示机宜。其时，补充师番号改为二十一师，战斗序列隶属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之一，东路军总司令为何应钦将军，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将军。十六年一月，二十一师全部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一月二十九日进击洋埠游埠孙传芳所属孟绍月部敌人，展开序幕之战，二月三日攻入严州，十三日进至浪石埠，敌人在此处部署重兵，顽强抵抗，激战至十四日晚上，终于把他们击溃，至是敌人之实力与士气，摧毁不可收拾，节节败退，我军乘胜追击，十九日进占杭州，二十三日进占嘉兴，随向左翼进展，三月十八日攻入吴江，二十一日攻占苏州，除吴江一役外，其余各地，均无激战。四月七日全师集中南京，待命向江北推进，浪石埠之役，二十一师虽赢了一场光荣大胜仗，但官兵的伤亡，却极惨重，先生看到阵亡枕籍，以及受伤呻吟的官兵，一如在广东作战时不时发出感伤的叹息。又在其日记中记有某役料敌未当，某地用兵欠稳许多自责语，流露着战阵之事，非其所长的感想。加之军校一至四期学生，以其时容共政策之故，就羸有共产党员在里面，且在学校中发展其组织，故北伐军各部队中，都有他们的人充任各级干部。南京光复之后，宁汉分裂，中央厉行清党，此时，“二十一师掩护共产党徒”之谣言，颇在外间流传，先生以为罔顾事实，听了非

常灰心，基于这两重因素，先生下了坚定的决心，自此摆脱军旅生活，即一再恳切向总司令蒋公辞去二十一师师长，于四月十一日移交该师六十三团陈诚团长代理。先生卸职后，回到杭州休息，并督率办理结束事务的部属做了两樁事情。先生一生公私分明，廉洁清介，二十一师在补训期间，就明令在师、团、连部中组织经理委员会，规定遴选下级干部及士兵参加，定期审核清结帐目，公布收支，务使各单位的官兵，都知道经费使用情形。军队有审查经费组织之设置，当以二十一师为嚆矢。先生既对经费公开如此重视，故其师长任内之移交，实做到分毫不差，我在二十一师出发时，由连长调任为经理处长，移交任务，由我负责，这笔移交帐目数字，至今还保留着，除拨出作为建筑阵亡将士公墓之经费外，计有现金银洋四万六千元、中央大洋券三万六千元、三省通用券四万元、国库券五万七千六百元，全移交后任接收了，此是一事。其次在西湖高峰半山建筑一座阵亡将士墓，在战事开始之时，先生曾规定要掩埋阵亡官兵的遗体，并在掩埋处树立标记，记明死者职称姓名，在建墓时，命我派员到江浙各战场搜集火化，运其骨灰封空墓窟中，墓上建一纪念塔，颇为雄峻，计运回之骨灰约二百余具，安葬时先生颇为慰，惟死事者实不止此数，以未及掩埋或未立标记，无法指认，先生軫念他们，表示非常遗憾。纪念塔后建有楼房，中陈列有姓名官兵之灵位，及若干官长之相片（其中职位最高者为营长赵敬统，军校一期学生，河南人），此又是一事。于此一事之处理，可以看到先生实事求是之精神。总之，先生治军，有其基本原则，民前一年先生自陆军小学假归时日记有载，“父语予，用兵之道，奇正相生，权诈百

出，非尔所长，参议得失，论辩是非，从事于文墨之场，乐庶能之。予曰，机谋受诈，固非予之所长，然居己以恭，抚众以义，行事以敬，对敌以诚，此予所愿学也。诈而成功者固有之，诚而僨事者，未之见也。”先生此处所说之诚，盖即认真不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意。及至率师北伐，则倾其全力以发扬革命精神，自广州出征时，曾提出“官兵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二十一师实践国民革命之官兵守则，不仅要求军队纪律严明，与民众相结合，同时也宣导民众接受革命之号召，与国民革命军融成一体，故二十一师所到之处，军誉雀起，倍受民众之拥戴与协助，得以先声夺人之势，瓦解了敌人士气。至于视官兵如子弟、与官兵同甘苦，乃是先生的习性，临阵时，广搜情报，详咨幕僚，洞察敌军之企图，然后定谋而动，动则必以勇决之进取心，坚苦之持久力，以达成其预定之战果，则又是先生的军事素养。先生统御军旅，虽短短不足一年，却已为北伐战史写下辉煌之一页，尤可贵者，先生当年改革军队之理想与抱负，均能躬自一一付诸实施，还有曾受先生陶冶的学生，遍布于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中，多不负先生在军校时之教导，使百万雄师，蔚成有新生命之革命武力，此在先生第二期出处事功中，最为重要最值得称颂之史页。

第三时期：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日寇进犯芦沟桥，举国动员的大抗战，随即展开，十月委员长蒋公电召先生赴国难，先生慨然放弃其十年来不下山惟恐不深之做学问生涯，束装入京，面陈方略，又至苏州前线，访问慰劳各高级指挥将领，并提供作战意见。十一月，委员长命先生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先生赴难，愿拟本其所学，参赞军事

机宜，地方行政，雅非所愿就，但辞不获准，遂回鄂，于是月二十九日接长民政厅长，二十七年七月省政府改组，先生以民政厅厅长代行主席职务，时寇犯日深，先生于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端绪纷纭，一一规划，付之实施，到了武汉撤退前夕（十月二十五日），始乘轮西上，驻宜昌，设行署，布置未来战局各种因应时宜，抚辑流亡，抢救青年，抢救物资，再迁省属各机关于恩施，力愈形痛，至废寝食，先生体质素弱，而繁剧日增，深感难以胜此重任，十二月至陪都重庆，呈请辞职，当被慰留，二十八年一月，中央明令派先生代理省主席。五月，先生再至重庆，与有关方面洽商省府局部改组人事，定案后，改兼建设厅长，终以常驻宜昌，厅长职务，再请准另行派员代理。十月至衡山，出席军事会议，会后至桂林考察广西省政。二十八年至次年五月之间，先生除坐镇宜昌处理日常政务外，并数度至恩施督导所属工作，又乘间更番出巡鄂中、鄂北各县市，视察训练民众御寇之实况，解决当地已发生或势将形成之问题，加强军民之联系，更竭力之所能抢运鄂中粮食、棉花。二十九年六月，宜昌陷敌，先生随部队西撤，移行署至巴东办公。至是忧伤劳瘁，益感体力不给，再三恳切请辞本代各职，八月邀准。九月交由陈诚主席接任。惟仍留任省府委员，于三十年三月迁家宣恩时，并受命兼督县境内垦殖事。三十一年五月膺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地方行政工作乃得全部解除。陈故副总统辞修先生著有石叟丛书一书；其“我与湖北”回忆一章中，记有“严立三先生代主省政”一节，兹摘录数段，以见先生在这一时期之功业与立身处事

之态度。其言曰：“严先生是湖北麻城人，其悲天悯人之怀，固未尝有疆界之限，然敬恭桑梓，古有明训，以严先生之久无宦情，终于再度出任湖北民政者，盖欲尽其悲悯之怀于乡邦耳。”又说“立三先生主持这两年多的省政，正在大局极端动荡不安的时候，湖北位居全国腹心，各方震动的幅度，莫不牵系于此，此一地如应付乖方，其影响于大局之深重，是可想而知的，而立三先生能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持续于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足不朽矣。”又说：“再则立三先生的廉介清操，可谓并世无两……，他代行主席职务逾两年，主席的特别办公费应当归他领用，是天公地道的事，但他不要，等我回主省政的时候，他全数移交给我，我既没有在省实际办公，自无领用此款之理，请他收回，他执意不肯，后来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即将此款存入银行，作奖助本省清寒学生之用，由他给这项存款立了个户头，叫‘惠廉有道’，盖取孟子‘可以取，可以勿取’、‘可以予，可以勿予’之义，立三先生于取予之际，大抵可以作如是观。所以立三先生一生，不但谈不到余财余帛，简直过得是清苦不堪的生活。综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又说：“立三先生立身行己如此，绝无半点矫饰，待人则一片纯诚，苦口婆心，必欲人人为圣为贤而后已，当然立三先生不能不有所失望，但其人格潜移默化之功，不会是全无收获的，我个人虽不尽赞同他的想法，但于束身自爱方面，未尝不是受他人格方面的影响，……我觉得立三先生如能久其任

的话，人心是会转移的，风气是会丕变的。以人心风气的转变为基础，再致力推行省政，必有更宏远的建树，应属不成问题，不过君子易退而难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仅仅在两年多的一点时间内，他已三番五次的求去。有一次来信说：‘所以致我狼狈如此者，无非眼见一部痛苦无告之人民，没法找生路，良心总难自安，这是我受的最高压力。’

“这种心情，我非常了解，大抵济世之念越深，责任之心越重，而济世救民，非可咄嗟可办之事，见有一夫一妇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因为难得心之所安，所以只有求去了。至二十九年八月，我来他去的时机已然成熟，终于达成了他求去的初衷。”辞修先生这几段话，说的非常扼要而真实，爰为录载，籍以说明先生主持省政时之政绩及其高尚之人格。

隐 居 读 书

民国十六年十月，先生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十一月父宜煥公逝世，十二月辞职，携眷回武昌奔丧。十七年四月，出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先生以为民政首在推行地方自治，因计划划县为若干区，设区长，负训练人民实行自治之责，并先设训政讲习班，考选英才，躬自教导，俾成为区长候选人才，但限于客观事势，其计划未及施行，即十一月辞职赴庐山休养。先生于此两次职务之就与否，均经过深长之考虑，终以前者，正北伐军事进行之际，后者在为桑梓服务，不得已应命而出。惟此两职，尤其后者，不仅不能展布先生之抱负，反而促成了先生隐居不仕

之决心。庐山山南太乙峰下，建有太乙村，住户十数自成村落，先生友人侨居其间，先生上山，熊君留客先生，先生喜其地与山北嚣境隔绝，托熊君代为经营，筑室于其比邻，十九年九月落成，迁入，取无逸豫意，颜其室曰劬园，独居治学，饮食之炊爨、薪水之樵汲、蔬圃之培灌、衣服之洗濯，皆躬任之，怡然自得其乐，自是或终岁山居，或年一度两度回武昌寓与家人聚首以为常。其间二十年三月，曾访友上海，九月遂至杭州，巡视所筑阵亡将士墓。至桐庐，登严子陵钓台。至绍兴，游兰亭、禹陵、阳明洞。至余姚，游王阳明故里。经宁波，游普陀山定海，再经宁波、杭州，于十一月回至上海度岁。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后，西归庐山。二十四年，先生以庐山山南及星子县，军事委员会兴办各种训练，友人乘便造访者多，苦于款待，妨研读，且为其眷属永久居住计，筑宅于武昌义庄，亲督工役，是岁未赴劬园，二十五年仍留武昌。黄河上游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观览其形胜、考察其古迹，为先生多年之心愿，是岁十月，筹得旅费就道，自汉口经郑州至开封，复西行至洛阳，至偃师登封、登嵩山。至西安，登终南山，至咸阳，游周文王、武王、太公诸陵墓，自潼关渡河至永济，游夷齐庙、娥皇女英墓，欲谒尧舜二陵，不果。东还至华阴、登华山，经徐州至南京，旅行共一月又五日。旅途中，先生一本其生活刻苦素习，携简单之行李（自称以己身所能胜任者为度），住湫陋之客栈，食粗粝之伙食，洒然不以为苦。所著旅行日记，于抵达南京之日有云：“夜半抵首都，投宿下关小客栈，近日周身痒渐剧，解衣视之，虬虱成群，往时游览奔走甚劳，故不觉之耳。”此数语足以概见其生活之一斑，至其

内心之感受，则于日记弁言末段中见之，其言曰：“华北冀鲁两省，少时经历有年、秦晋豫西，本虞夏商周汉唐发祥所在，古迹足资凭吊者多，而生平未尝身历其境，每一念及，怅怅何如，况今日寇焰匪氛交汇于此，前途何敢预言，是以排除万难而为此行，向慕之忧，诀别之痛，兼而有之，兼而尽之，此固不足为不知者道也”。民族国家遭遇之危难，先生已预测其即将到临，故不觉其言之沉痛。现在要回述一下先生在此一时期中之治学情形，先生于十八年遁迹劬园，冬季写成大学辩宗一书，以后岁月，即专心研读，未尝有著述，其读书范围，除史学外，大都以哲理为中心，自古籍以及近人著作译述无不探究，据日记所载，读书年自二十余种至五十余种不等，书籍多托友人自城市购寄。西湖阵亡将士墓落成时，中华书局正发售四部备要预约，余曾以建筑余款购置一部，原拟藏之幕楼中，供同袍休假居住该处时阅读，亦先生之旨意，其后深恐无人保管，函得先生同意，改寄劬园，先生于二十一年收到第一部，及二十三年全部收讫该书时，日记中均表示极为欣慰。先生入山之初，友好有责其消极逃避现实者，先生答谓：“治军从政，曾经过实验，均非我之所长，做学问则立志始自幼年，倘为学有成，从学术上开辟一条人生可行之大道，不能说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没有贡献，惟轻率操觚，是我深戒，所以要闭户专心再读几年书，以期深造。”惜写作尚未开始，抗战军兴，东南各省逐次沦陷，劬园毁于兵灾，存书荡然散失，此为先生最痛心之事。二十九年先生交卸兼任省主席，即于次年三月移家宣恩长潭河，息劳养病，恢复读书生活。三十一年膺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至重庆出席会议，会后于十月至成都，寓省立图

书馆中，整集资料，十二月初住灌县友人家，开始属草礼记大学篇考释及大学释义两书，三十二年三月回成都，仍寓图书馆，改正两书稿本，五月脱稿付印，两书合约十余万言，为先生最巨之著作，亦为先生最后之著作。先生以此书授颜道鹏兄及余，均于其扉页手示附注曰：“游川经年，偶将大学问题详述一通，唯率尔成篇，将来当须修正，因便印少许，寄供友人评议，衰病日侵，此久被人轻蔑遗忘之问题，未知能及身得有能论定者否耶？”又先生草成大学辩宗一书，其后跋有语云：“末学哗众，素所深恨，尤而效之，非所敢为。”其立言之旨趣与执笔之虚衷，均尽于此数语中矣。

病逝时情形

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先生至恩施，为青年团湖北支团监察会监督，二十一日回宣恩，此数日内，集会、讲演、接见友好及省府旧日同事、处理公私有关事务，日夜不得宁息，当其行时，神形似极疲惫，到家未久，即患重感冒，日记绝笔于二十六日，证明次日病情已趋恶化，驻宣恩，省立医院院长、医生更番前往诊治，断定并发之症为肺炎、肋膜炎、中经胃炎，最后加上肾脏炎，至是医生感到束手。在此一月中，先生每于病况略减时，即促医生回恩施，力言不可以他一人之病，迟误多数人之医疗，医院方面，自然不同意，因此，先生决定住医院。于四月二十七日到恩施，然已无可挽救了。二十八日，先生示意要写字，亲友为安排纸墨扶他执笔，在两目直视、汗流气促情势之下写了“近来”二字即不能再写，手持纸翻转数次，亲友察知其意，另换一纸，力疾写了“有罪要火葬”五字，“罪”字“葬”字均模糊不甚清

晰，亲友劝其不必再写，才掷笔望榻前亲友含含糊糊说了几句话，但舌根已僵，不知所作何语。午夜，夫人与其世兄赶到，先生又写了“宣舍事”及以下几个不能认识的字，随即进入弥留，延至四月三十日上午七时二十分，溘然与世长辞。当时随侍左右的亲友，推想先生所书遗意，其第一只近来二字，仍对时事有所表示，因先生在病中，仍时时探问战况及苏联关系消息，第二纸遗命火葬，此为先生平日主张，知者颇多，至何以说有罪？公认是先生苦心之所在，先生深知戮于此时此地，政府、友好必决定由公家为之治丧，不以个人私事，耗费一文公帑，乃先生做人根本精神，现虽口不能言，手不能书，仍欲勉强挣扎表达其意志，以贯彻其精神到最后一刻，先生之意是说：国家正在艰危时，我对国家亦无贡献，切不可由政府为我治丧厚葬，此看法自属正确。再就余之观察，忏悔为宗教家修业功夫，先生博究各家宗教家哲理，故亦深契宗教家精神，观其平时于境遇有拂逆，言行有差错时，辄以不期吐露有罪二字话头。再者，先生治学终身，庐山苦读十年，思以学术贡献于天下后世之素志，固始终不渝，但其前一年发愤著述之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并未定稿，其他计划，至是更成虚愿；又其时抗战犹在激烈进行，而自身已不复能为此神圣民族大战再尽一分心力，故病中不时发出“尚有理想工作未完成，责任未尽”一类之感叹语，其所谓罪，殆皆指此种种方面而言。先生遥承儒家道统坠绪，死生之际，湛然不惑之神明，实涵有许多学力、许多苦志、许多真情之深至素养在其中，谨为伸述之如此。

（原载台湾《湖北文献》

摘自《湖北档案》1989年二、四期）

严立三先生的学术著作

淡 瀛

严立三先生，原名重，后期字以行。湖北麻城县人。1883年生。16岁入安徽陆军小学。辛亥武昌首义，回鄂参加民军。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1922年，应邓演达之邀，任粤军第一师营长，曾扈从孙中山巡视东江。1923年，任黄埔军官学校筹备委员。历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总队长、训练部主任、教授部主任，深受学生爱戴，称为良师。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所部纪律严明，战绩卓著，时称名将。“四·一二”政变后，因素与邓演达交情深挚，为蒋介石所疑忌，愤而辞职。1928年，与张难先、石瑛同时回鄂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财政、建设厅长，廉洁、朴素、励精图治，力矫时弊，自此有“湖北三怪”之名。未久即引退，隐居庐山，筑室读书，自食其力。“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专题报道，称之为“当代的严子陵”，意在讽示南京当局起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同意改组政府，准备抗日，提出人事名单，拟任先生为军政部长，事后未践约言。“七·七”抗战爆发，先生始应蒋召，入南京赴国难，自请赴前线，适值上海我军溃退，中途折返。旋回鄂再任民政厅长。1938年6月，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由先生代行其职务。武汉沦陷，省府西迁恩施。先生至

宜昌设行署办公，力撑危局。1939年，奉命代理省主席。1940年，宜昌失守，陈诚到恩施，先生告退。在任3年，维护国共合作，动员民众应战，于抚辑流亡、抢救物资、肃清烟毒、转移风气诸大端，无不尽力以赴。尤以设立联合中学，实行公费制度，保全公共图书，使战时青年学生不失学，全省文教事业不中断，其影响尤为深远。1941年移寓宣恩，任中学教员，不受报酬。1942年当选国民参政员。1944年4月30日病逝于恩施，终年仅53岁。

熊十力先生说：“立三诚摅，念念与生民痛痒相关。……耻不义而富贵，弃官，隐庐山，躬耕自给，长服菜羹，竟以苦至死”①。由此可以想见他的生平②。

严先生自幼刻苦自励，好学深思。肄业保定军校期间，于军事课程外，兼治孔、孟、荀、墨、老、庄学说，参考有关欧西译著，以及佛经、圣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并与同学10数人立会切磋。隐居庐山10年，每年读书数10种，钻研益深，心得益多。后期寓居宣恩，恢复读书生活，于出席国民参政会之便，曾往成都，灌县等地，寄寓图书馆中，以便博考群书，取材著述。所撰《礼记·大学篇考释》脱稿付印后，董老（必武）索阅，即以一册相赠，并于扉页上题数语以相商榷，先生逝世后，董老手书挽联云：“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独探立国千年奥……”即指此。熊十力先生称此书“通论中国学术流变，自出心裁，识者重焉”③。由此可见一代的评价。

先生生平讲学之友，早期保定同学，或为国牺牲，或声名寂寞④，或改途易辙。在学术界，后来相与商榷，相知较深的，仅梁漱溟⑤、熊十力、林宰平、张仲如等少数几位学

者。严先生曾说：“未俗哗众，素所深恨，尤而效之，非所敢为”⑥。他既与学术界少通声气，又不愿露名扬己，自力付印之作，印册很少，仅以就正师友和启示及门生为限，流传未广，且多散失。他的学术生活和学术著作，为他的军政经历和高风亮节的大名所掩，长期没有引起各界人士的注视，现在更少有人知道了。

严先生的学术著作，生前自力付印的计有5种，现据所知，记叙如次：

一 《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

这是一篇仅有3000多字的学术论文，曾铅印64开本的小册子若干份，分赠师友。1938年，我随先生左右工作期间，承检赠一册，旨在启示治学途径，并告以印本剩存无几了。其撰写时间，印本未见注明，现已无从查考。1941年，我在长沙《阵中日报》任总编辑，任启珊、郑天健先生向我索阅此册，乃于《阵中日报》上辟栏转载原文以应之，借广流传。抗战胜利后，先生惠赠的几种著作和手札，复员途中，因托运的木船在秭归失事，统统沦没了。稍后才获悉此文和《道学宣言》，已被辑入《湖北文征》，深幸吉光片羽之传，赖以不坠。前年看到1980年台北正中书局印行的《严立三先生遗稿汇编》，收载尚全⑦，编者也说到此文作于何时，未有记载，仅据先生日记存缺的情况，推想写定时间可能在1919年至1921年之间，但仍把它列在1918年的《道学宣言》之前，作为先生的第一篇著作。这样编次还是恰当的。只要通读先生全部遗著，便会看出这篇短论，不仅是《道学宣言》的先声，而且是他研究《大学》的三部著作的导源，

应当把它看作先生学术思想的第一块基石。

这篇论文是根据《庄子·天下篇》的“绪论”——即“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一大段（四小段）原文的旨意，来探讨和阐明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规模条贯。文章首先提出“原一”、“合二”、“贯三”三个基本观点，来阐明中国古代学术（即道术未分裂以前）的整体观，说：

“《天下篇》首严方术道术之辨。通变之谓道，偏执之谓方，离方术亦无道术，故曰‘无乎不在’；离道术则方术尚何所存，故曰‘皆原于一’。一者，彻内彻外，彻始彻终，默识心通，莫容拟议，盖名言之究极，道术之本宗也。此之谓原一。

道存乎人，人成乎事，自天人以至于民理，自物养以溯于精神，内外精粗，本末一贯，广之旷世，近之一身，固阶段似别为三，而体用不离乎二。此之谓合二。

人事代谢，惟迹为存，继往开来，学者是赖。数度诗礼百家之言，固先后以遗存，而史志经传论著之文，迄末世则同期而并列。史本守礼，经传兴，性学盛，而礼制愈明。子固别经，众论起，玄学昌，而性理益畅。故百家作，三宗全，而中夏学术始可谓灿然大备矣。达者溯其源流而汇通之，焉见其往而不合？要在于有以见乎古人之大体，而明乎内外之分，至一之原耳。此之谓贯三。”

作者曾指出《天下篇绪论》所说的“不离于宗……谓之至人”，讲的是玄宗；“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薰然慈仁，谓之君子”，讲的是性宗；“以法为分，以名为表，…

…以衣食为主，蓄息蓄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讲的是礼宗。三宗的兴起、具备、汇通，形成了过国学术的完整体系，展示出中国古文化的全貌和发展的中程。文中据此断言：

有清二百余年，钳制之余，人心愤发，而五经四子中已觉更无致力之地，而庶人之政与百家之学并兴，此固不必因外力而然者也。”

对于封建时代的学术，文中有深刻评论，

师儒一代之学，虽曰以六经为归依，其实，礼乐无成文，诗书多补缀，易春秋离本传，几无意义可言。…其他主要议论，均仅见于论孟，礼记各篇。故名虽尊经，实传记为其宗主也。其为学工夫，专致力于性情心术之间，诚得其要，然于诸子之学，玄礼二宗，为之湮没废绝者，已不在少矣。……盖师儒之道，以圣人、君子、王侯、卿相为准的。上之达于圣神功化之极，所谓天人、至人之域者，皆以为夸诞而不敢闻；下之则凡百官之事，有待于参验稽决，而关于蓄息蓄藏者，皆不屑理。是以一则任令方技之士，虚伪假托，说鬼道神，俨与分庭抗礼而不之耻；一则坐视愚拙之民，灾难疾苦，流离转徙而不之恤。……是故二千年来，道术既裂，中国之学术，实可谓一无宗主。……

说得鞭辟入里，十分痛切。

文中还说明了《庄子·天运篇》“绪论”的历史意义：

“班氏汉志，本自二刘，原为师儒一代开基之皇皇大文，事过境迁，多无足取。由此上溯，如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淮南《要略》、韩非《显学》、荀子《非

十二子》各篇，互为抑扬，其批评范围亦仅及先后同时各家而止，而于文献之全部，体用之宏规，皆未之及也。《庄子天下篇》，在全书中固属后序之文，其通篇自亦以泛评各家独标自义为主旨。唯其首章‘绪论’，追述道术未裂以前古人学术之规模条贯，反复慨叹，词旨精深。无论此文作于何人，成于何代，其非学承千古、志迈群伦者，断乎不能为此言也。数十年来，阐释此篇者固多，而能特重‘绪论’之旨，且因是而窥见古人学术之全者，犹未之见。”

因此，他认为“此文急待榷商”，对重整中国学术文化旧基，建设庶民时代的新文化、新学术具有迫切的和深远的意义。

二 《道学宣言》

初稿写于1918年，改订于1925年3月，分两部分：前面仍用文言，将原稿内容总结为十条；后面用语体文约8000字作为补充说明。1918年，先生于保定军校将届毕业时，与同学邓演达、刘慧凡等10数人结立“道学会”，以“探究精微，昌明学理，讲习集会，启诱同人，聚款输财，共襄善举”三事互勉。这是他为“道学会”所撰的宣言，作为会友们治学做人，服务社会公约的同时，也表明了先生的学术思想。

这里所说的“道学”，即《庄子天下篇》“绪论”中所讲的“道术”。作者认为这是“中土文教之通称，”最足以表明“东方人文特立固有之精粹。”《宣言》中曾说到名称问题：“就如普通称道的中国哲学或国学等名词，似乎也可

以使用。但我们恐怕因名乱实，当初却要费了许多心血，穷根到底，一变再变，归终结局，还是用上这个令人厌恶、令人误会的老道学名词。”在《宣言》的开头就说明：

“道之字，其义略释为三：曰究竟，尽一切言；曰周流，通一切言；曰典要，成一切言。……盖其本义即为实践自得，日用不离，通变无方，莫容拟议之意。”

《宣言》进一步指出：

“实体而身行之之谓学”。

道之所实际表现于人心者，是谓学；学之所以实际推行于事实者，是谓会。”

“我们求学，是要明德、成圣、做王；所以我们的学就叫做，内圣外王之学’。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这件事。我们民族的特点就在这里。我们一部历史，从元后、王官、师儒逐渐代兴以来，就是道统的承继史，也就是王权的进化史，也就是知识界、思想界的扩大史。……从这一点用道学的历史眼光看来，这才是我们的真革命，也就是我们革命史的特性。”

“圣君的时代过了，王官的时代过了，师儒的时代又经过了，现在是学期普及，道在庶民，政由群主，正是群治时代的起首呵！一切法度，从新创始，一切残贼，根本铲除；继周百世之运既终，万代太平之基重启。我们何幸生当此时，我们决不以眼前的困苦为念，只要我们男女都觉到这种尊荣在目，都觉到这种责任在身……那就决没有负担不起的道理呵！”

《宣言》“用上这个令人厌恶、令人误会的老道学名词”，却赋予了新的解释和新的内容，就中国历史、文化学

术、人生修养、社会实践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新的见解和主张。这是“原一”、“合二”、“贯三”的理论体系的开展。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份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文献。

三 《大学辨宗》

四 《礼记大学篇考释》

五 《大学释义》

以上三书，是严先生多年研究《大学》的成果。

《大学辨宗》写于1929年隐居庐山的农隙。1930年托友携汉付印若干份，分致远方师友商讨。此书申论《大学》为性宗之学，格致为《大学》全篇宗义之所托。《大学》首章，开宗明义，“明德、亲民、止至善”，推极于止至善，都是讲的格致。他引据《诗》、《书》、等古籍，认为：

“格物之格，当释以感通之义。格物者，感物而通之也。通物者，不蔽于物也。不蔽于物者，推己以及物，而事物之情无不通之于己之谓也。致者，至也，……至，犹极也。知至云者，情之感物而极之，则通而无间，如疾病痛苦之通于一体也。”“推己者，格物也；尽己者，致知也。格致之学，忠恕之道，一而已矣。”除对《大学》作出了很多精到的发挥以外，还阐述了玄、礼、性三宗的关系，评论了朱熹、王守仁两家的得失。

《礼记大学篇考释》是他研究《大学》心得的结晶。1932年开始属草，1933年5月脱稿于恩施付印。并曾分赠恩施、成都等地省立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尚有存本，内分四部分：1、考订本文；2、略明要旨；3、通释全篇；4、

述朱子、阳明之释《大学》及略论学宗之演变。前有自序，说明此书旨意在于解答读经问题，昌明中国学术，“以见人类之伟大，其所致力者本末精粗各有不同，未可以数量相较论……所据《庄子·天下篇》绪论原一、合二、贯三之旨，系方来世界学术之总归宿。”后有附录，转载陈确的《大学辨》和摘录潘用微的《求仁录》大意。全书约10万余言。

《礼记·大学篇》为儒家记传中的重要之作。自宋代程灏、程颐兄弟特加重视，并发现其中有错简，提出了改本以后，朱熹继之，又认为尚有缺文，再加补订，另成《大学章句》一种改本，合《中庸章句》与《论语》、《孟子》为《四书集注》。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四书”被官方规定学校必读之书，也是科举考试命题试士的依据，因而流传最广，影响极大。其间，相继有人对朱熹的《大学》初其提出异议，先后有各种不同的本。明代王守仁又提出恢复古本的主张，于是聚讼纷纭，久无定论。《考释》首先考订本文，理顺了古本的错简，从而解决了久悬未决的公案。这个贡献，已在拙作《关于〈大学〉古本错简及诸家改本异同的考述》一文中有所说明。足供参考。

“略明要旨”的部分，是继《辨宗》之后，进一步阐明《大学》的要义。首先，阐明首章“明明德”之义，以见“人我同体、内外合一”的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个“在”字，一气贯下，不是并列，而是表明先后的层次，归结到“至善”。下文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至“致知在格物”，全是由此三句推来。论修己则以“善”易“德”，并在八目中详加分析，具见首章标的之所在，纲领与条目间的内在联系。继而申论“至

善”为统摄“修身”以下之文，所言定、静、安、虑，均属心理情态，再就“善”字上推究格致之义，并论证格致之学与忠恕之道，实为一事。五、六节详论心性的内因，感情的积极作用，物我感通的缘故，进而提出“盈天地皆情，盈天地皆感”的命题。第七节讲明《大学》中所说的“家”指的是“氏族集团”，并不是“庶人八口之家”；所说的“国”即《书》所谓“百姓之邦”，或“公侯皆方百里之国”。结合现状来说，各级地方自治组织和各种职业团体，才是群治的基础，文化生活的寄托，情感相通的渠道。继论革命改制和文化继承的关系，末论学术上正名的重要，不可忘己徇人，一切比附西方。

“通释全篇”的部分是根据上所考定的本文及所阐明的宗旨，先就《大学》的书名论述其性质和作用，重新评价为庶民时代有益于成德、乐群、敬业、议政之书。以下则就本文分段逐句详加解释。除音读概从朱熹审定外，在原文词旨上，参考朱熹、王守仁之说，特申己见来发微穷本，其中有不少精湛的见解。

“述朱子阳明之释大学及略论学宗之演变”这部分，通过对朱、王和戴震三家的评论，阐明中国学术史上玄、礼、性三宗的流变及其主潮，并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当代的任务。

首先就朱熹、王守仁解释《大学》的要点，考论其异得失，他认为在《大学》研究上，阳明对朱的批评：“合之以敬而益纒，补之以传而益离”，是根据《大学》本文立论的；论证“亲民”的“亲”字不误，也极为详审；都足以动摇朱的改本。但阳明的讲《大学》，却又等于讲他自己的

“致良知”，有的说得太简单，有的又说得太神秘。总的说，“晦翁（朱）重视乎物，故卒致误认其知；阳明专贵乎知，故卒招离物之谓”。虽然如此，但他们还是“归本于性宗求仁之学”。接着，便着重评述王守仁的思想。作者认为性宗论心，主于感情，阳明所讲的“心”，正是《大学》所讲的“心”。主情然后知性，知仁，肯定人在本质上的平等。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就是由感及情、推情及物的实践过程。因而阳明主张学贵自得于书本之外，学术是“天下之公”，不是孔子、朱熹说了就算数，反对党同伐异，贵耳贱目，尊古抑今；在学术上人人平等，虽贩夫走卒也都能做学问，有发言权；在教育上则主张尊重个性，发展个性，反对鞭答压制儿童。在阳明的视线中，简直要把一切传统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统统加以清理。所以数传以后，便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产生。

对于戴震（东原）的学术思想的批评，多发人所未发。他指出：东原批评宋儒最得力的地方，都是本于情性（情欲）立言，但东原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在名物、考证、天算、推步上面，都是从博学、多识而来，却与性情心术无涉。东原之学术本于荀子，是“智术之事”，据此以讨论人类的性情心术而作《原善》，就似隔靴搔痒了，戴的《孟子字义疏证》，其基本观点本出于荀，总体上是以荀释孟，中间也“有以情经理之言，适符孟子之旨”，但这只是偶合，与其全书主旨，毕竟格格不入，显见思想上的矛盾，所以焦循对此也深感苦闷，不得其解。作者由对戴学的批评，进而指明清代学术的局限和流弊。作者指出：

“大致人类非具知见、感通、超悟三者之性能，不

足以全生。其愈隐微者于人生关系愈大，愈属内层者其含盖愈广愈深。如能感通则其知见愈真切而少差误，能超悟则感通必愈神速而广远。故知三者又原属一体，其性能之差异，实亦不过程度之深浅而已耳。……”

这就是他衡量学术的一个标准。

这部分有很多沉挚沉痛的议论。

1988年，我对照原来的恩施印本和后来的台北汇编本，曾对此书重加标点和校勘。

《大学释义》是与《考释》同时先后写定的，作为《考释》中“通释全篇”的补充，并为研读《大学》的人们提供一种简明的注释读本。

除上述五种而外，还有《日记》、《读书录》、《杂著》等，原由家属保存，据闻有所散失，颜道鹏君录有副本，带往台湾。严先生自十九岁订立日记体例，开始作《日记》，三十余年中，很少间断。就先生的军政经历和治学情况而言，他的《日记》，是很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台北出版的《严立三先生遗稿汇编》，仅选载其1936年10月至11月旅行西北的《日记》，其余概未辑入发表。

注 释：

①、③、④见《十力语要》卷一，《十力丛书》湖北本。

②、关于严先生的生平，有贺有年先生撰《严立三先生事略》，已收入《湖北文徵》。我于1947年4月撰有《纪念严立三先生》一文，载《新湖北日报》，1981年撰有《记严重——立三先生》，载《武汉市文史资料》，1988年撰有《严立三先生小传》，已辑入《武

汉人物选录》。均可参考，

⑤、严与梁等数人，早年曾相聚桂林讨论学术和中国文化问题。见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

⑥、见《大学辨宗附记》

⑦、严先生原作于前首引《庄子天上篇》“绪论”。原文，据马叙伦之说，删去其中“诗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六句。台北汇编本的《校读后记》却认为是原稿的脱落，这是误会。倒是台北汇编本所印的《庄子天上篇》“绪论”原文，既有错文，又有缺文。这只要细读原著，就会看出来。

(摘自1990年《荆楚文史》)



清廉爱国的湖北“三怪”之一严立三

汪承武

严立三、石瑛、张难先三人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南方政坛上的三位湖北籍爱国志士。他们均为国民党高级官员。但却以其桀骜不羁，敢怒敢言、忠诚正直，廉洁奉公而闻名于世，与当时官场的尔虞我诈，贪污腐败之徒形成鲜明的对比。故有湖北“三怪”之称。

“赴国难、求所以”而不得的严重

严立三（严重），麻城县城关镇人，1892年生。他早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生活清苦。后考入陆军小学。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他以陆军小学学生奋起参加保卫武汉革命中心的战斗而初露头角。民国初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他与同学邓演达、叶楚傖、季方等志趣相投，交谊很深，成为军校内外的活跃人物。

毕业后经邓演达的介绍，他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粤军第一师，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及留守处主任等职，他治军有方，特别注重部队的纪律和训练；他与士兵同甘共苦，爱护群众；其人品、学识与带兵、练兵的能力，甚为时人所称道。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很快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严立三相继离开粤军，参加黄埔军校

工作。邓任教育长、严任总队长及训练部长。

严立三在担任黄埔军校一、二、三期总队长期间，言教身教并重。对学生的训练，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学生的生活思想，他关怀备至，亲如弟兄。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优秀品格，被师生们所广为传诵。

1926年，北伐开始。严立三被任命为21师师长。他率部从广东出发，经湖南、江西入浙江，一直打到苏州，一路上所向披靡、节节胜利，特别在桐州一役中，以寡胜众，重挫孙传芳的精锐，受到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刮目相看，并当即向总司令蒋介石报捷，盛赞“严立三不但是一位少见的军事教育家，也是一位罕见的卓越将帅”。称21师是北伐军中以少胜多的模范师。

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互相倾轧，严立三终被蒋介石、陈诚所不容，无端被逐出21师。以后，严立三居庐山，自食其力，竟达十年之久。其间虽然一度与石瑛、张难先等共同主持湖北政务有年（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等职），工作上则仍是上下掣肘，无法遂其心愿。因此这段时间，他内心极度苦闷彷徨，对国家前途失去了信心。然而，到了抗战前夕，他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曙光。同时，他凭着与共产党人董必武等早年相知有素的关系，思想上自然受到一定影响。曾密访过延安，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表赞赏，增强了抗日救国的信念。他曾提出“官皆将，民皆兵”，“官不离民，民不离土”等口号，反映了他强烈的抗敌御侮的决心。但残酷的现实一再令他感到失望！到1944年他逝世为止，蒋介石所奉行的依然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身为“党国要人”，目睹

国土沦陷，内战不已的时局，实在痛心疾首。使他既感到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痛苦，又深觉壮志未酬，“求所死而不得”的悲哀。总之，他悲愤交集，愧疚难当，再也说不出别的——只有责己而已！临终时写下遗嘱：“有罪、要火葬”以一“罪”字而谢国人，以明青史了！

（原载1991年7月20日《团结报》标题编者略有改动）



清末翰林余晋芳事略

吴树威

我的姑曾祖父余晋芳。(1861——1938)。字子青。晚年号春晖老人。白果区冯头垵人。1888年中举。1894年中进士。为翰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分广东司行走，兼贵州司帮稿。1897年春，丁父忧回籍，主讲黄州河东书院。1902年，擢贵州司主稿，兼银行库值班，则例馆协修，北档房帮办。1906年放云南清理财政监理官，兼云南造币厂总办。云南大清银行监督、云南矿物局会办。辛亥后，蔡锷聘为咨议。1912年春，入都清理“大清积案”，后回乡。

余晋芳聪慧机敏，博学多才。所著有《春晖堂文略》、《筱吟馆诗存》、《医学初阶》。

他特别长于编纂史考。清季，部中档案积200余年，他受命编案，颇称精核。

我曾保存一张颇带暗黄色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中二十余人，以旧黄鹤楼为背景，或坐或立，男女老少井然有序。居中段坐一位白发长须，长袍马褂的长者。这就是我的姑曾祖父余晋芳翰林。从衣着、发饰上看，照片摄于辛亥革命之后。

家父吴楚瑛先生曾多次叮嘱我：照片极为珍贵，不得遗失。可惜事与愿违，它与我家珍藏的《资治通鉴》、《二十

四史》等典籍在“文革”中均付之一炬，余晋芳的诗文、手稿、印章、楹联等文物焚烧殆尽，照片也一毁无余。

余晋芳的珍闻逸事、史实掌故颇丰，尽我所知，录其一二，让我们在一代儒人的足迹中得到一点历史的启迪。

一、翰林拜年，天摇地动

1913年正月初二的早晨，一轮红日从白鸭山上冉冉升起。迎河集和吴家酒垆正处于春节拜年的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平日难得走出闺房的年轻姑娘和媳妇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徜徉在去亲戚家拜年的道路上、河堤旁。年轻的小伙子们更不甘寂寞，抢着打六圆秋、举碌子、玩采莲船、耍滚龙、玩狮子。锣鼓声，此起彼伏，鞭炮声连绵不断。

正在此时，白果冯头垆那个方向传来一阵紧一阵的报锣声，吆喝声。人们立即停下手中的玩艺儿，用惊疑的眼光注视着从东南方向走过来的人群。只见一乘八人大轿抬着一位官员涌了过来。

吴家酒垆的户长、房长，迎集街的集长等一千绅士们不约而同地毕恭毕敬地齐集路旁迎候。

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只有抬轿子的“吱呀”声很有节奏地往前进行着。一位白发老太婆颤巍巍地告诫着自己的小孙子：“快别动，余翰林来了。”

轿子到了迎集街头的前头棚。此时大地忽地一下振动，轿子歪了，涌挤的人群哗地一下倒了，街头池塘里本来平静如镜的碧水掀起了巨浪，大小鱼儿窜出水面蹦跳不已，树上的鸟儿离开树枝飞向天空。本已回避了的姑娘媳妇们也顾不

得抛头露面，忽地一下慌忙离开尘土直落摇摇晃晃的房屋涌向场院、道旁。

轿子着地，轿夫垂立两旁，吓得面如土色。

轿子门帘一掀，余翰林身着大红披风，头戴翰林制帽，足登粉底官靴，从容镇定地走出了轿子。略一定神，举起双手向迎候的人群拱了拱，高声说：“乡亲们！恭喜！大家不必惊慌，刚才这是地震。余某在这里顺便向诸位拜年、问候！”说完又连连拱手，向人们致意。

人群中一片欢腾、惊诧：“翰林拜年，天摇地动。啧啧！啧啧！”“哎呀！钦点翰林，皇恩浩荡，了不起！”“官可大哩！户部主事！”赞叹之声，不绝于耳。老年人忙拱手不迭，小子们也纷纷下拜。辛亥革命在落后愚昧的农村竟然没有大的震动。岂非咄咄怪事。

我的曾祖父家琦、家琦、家珍、家琛兄弟四人，我的祖父振荣、振煊、振煌、振耀、振灯、振辉、振炳，振昆、振皎、振曦兄弟十人急忙抢步向前迎接。

余翰林见人群中仍有惊慌之色，情不自禁地连连拱手说：“诸位请起，切莫惊慌。这是地震，偶然巧合。与余某来拜年毫不相涉。”

这时，我家厅屋前（此屋现由煊公后人思宝居住）鞭炮齐鸣，翰林在乡里士绅和家琦公的簇拥下走进了厅屋。

我的高祖父、真桂公（国学生）高祖母（罗氏）也为这位衣锦还乡的女婿来拜年而春风满面地在堂前的太师椅前站起来迎接。

二、姑表联姻 寄人篱下

清廷腐败，国势日颓，天灾战祸，饿殍遍野。农村中的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灾难深重的农民更是苦不堪言。

余晋芳家居冯头垵，是我太高祖父旭公（附贡生）的嫡亲外孙。我高祖父其桂公又以长女与其联姻。眼看冯头垵家道中落，以致四日八餐难以为继。其时我的叔高祖父其沅公（邑增生，号芷生，永旭公长子）正在吴氏祠堂内设馆课读族下子孙，我太高祖父永旭公即令其在家附读，既解决了每日三餐的现实问题，又可免于困贫辍学。

这可从光绪二十九年续的《吴氏宗谱》内余晋芳为其外祖父永旭公和其舅父其沅公撰写的传记中窥其一斑。

余晋芳十四受业于舅父吴芷生先生之门下。先生教人，口讲指画，必期于领悟而后已，迄十余年不少懈。晋芳至今得有一知半解，皆赖先生。先生之学，则源于外王父（即外祖公，作者注）凤苞公也。按状（作者注，即永旭公）公讳彰彰，字凤苞，行二。于学无所不窥。言动必循礼法。少时家道殷实，公恂恂若寒素。图书之外，一无嗜好。道光时以经古受知于督学方公。科举试辄冠曹，偶旋读书鄂垣，一时知名士皆慕于公文。顾屡膺乡试不得解。晚遂绝意进取，援例为附贡生。家居教子课孙，推财让产。一门之内，怡怡肃肃。人以为有汉石崇、唐张芝之风焉！生平推诚待人，好奖掖后进。见人一善，赞之不容口。谈道讲艺，批隙导窾，终日娓娓无倦容。凡亲眷子弟来谒时，无不存严惮心。坐听既久，则又依依不忍去。盖真气之足以感人也。公既经明行

修，尤善草隶，汉唐以来金石碑版，多能详其缘起，著述经乱多散佚，存者仅《分类格言》、《文学启蒙》若干卷待梓。公生于嘉庆壬申年正月十九日未时，歿于光绪四年戊寅十一月初十辰时。

配黄太儒人，能以勤俭佐公。子即舅父芷生先生，邑增生，屡膺房荐。孙家梅、家松、家荣、家楨。家梅，康膳生。皆能守公家学，以文章有声于时。妣生于……歿于……合葬。

钦点 翰林院分户部主事

外孙 余晋芳顿首谨撰”

此时，他饱尝吴姓族人、富绅子弟之歧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促使其发愤求学至彻夜不眠。凡同窗学友中偷鸡摸狗、不求上进者无不侧目视之，或怒目对之，屡欲驱之而后快。但由于其外祖父永旭公的支持，其舅父芷生公作为塾师多方奖掖，肇事者也无从得逞。

面对家衰国破的艰辛，少年气盛的晋芳已在逐步形成其特有的性格——蕴藉温和，不露机锋，埋头故纸堆中，苦钻八股文，力求进取。

在同一谱内，他为其舅父兼岳父其桂公撰写的传记里这样写着：

“其桂公，（国学生）字馥臣，行三，少读书，通大义，以食指繁，遂学贾，偏历荆襄江右间。归移居近市经纪。益饶性孝友，事太儒人中衣厕牖之役，敬谨不懈数十年如一日。兄弟至老相爱。有匮乏者时资助之。歿于光绪壬辰三月二十八，春秋六十有八。配罗母生道光乙未六月十九

日，现年六十九岁。

解余晋芳谨撰”

“有匮乏者时资助之”——这其中也包括了晋芳本人及其家中老母，过中甘苦，自不待言。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腊月二十四，冯头垸村头传来两声微弱的犬吠，晋芳正侍奉母亲喝药。大门忽然推开，永旭公家的长工老林挑着一担过年货，其桂公家的长工老腾挑着一担松树杈走了进来。

余晋芳招呼两位长工后说：“我早已对舅父、家公说过，生平不食‘嗟来之食’，麻烦你们还是挑了转去吧！”老腾笑着说：“相公，你就高抬贵手收下吧！我俩挑来已经气喘吁吁，哪还有劲挑得回去呢？”

晋芳苦着脸说：“你们救了我一家，你们能救得了迎集街头的那么多的乞丐吗？况且我家米缸里熬稀饭的米还是有的。”老林也接着说：“老太爷太慈大悲，今年的租子已由三、七交改为四、六交了，昨天还接济了好几家过年揭不开锅煮的呢！”

这时，房里传来他母亲的断喝声：“芳儿，不得无理！快打发两位走吧！叫老腾老林向太公、太婆和舅父、舅母们请安。”

老腾转向房门里，说：“老太夫人还传下话，请夫人和相公在腊月二十八去吴家泗垸团年。”余晋芳接着说：“我母亲有病，恐怕去不成了，到时候我一个人去吧！”

十余年后，余晋芳进京赶考，被钦点翰林院分户部主事，报子锣打至冯头垸，吵着闹着要报子锣钱，硬赖着不走。消息传到吴家泗垸，也是其舅父、岳父送银子去开销了事。

所以至今人们不无感慨地说：“宝剑须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真是良有以也！

三、反正前后 殷望弥深

武昌首义的枪声，惊醒了沉睡中的亚洲东方的雄狮——华夏，也使仕途坎坷中的余晋芳得到了一线希望。

宣统元年，我家在沙市开的恒春茂花布行因钞庄的钞票倒了而随之倒闭，并欠下了好大一笔债务。我的曾祖父家琦公和舅太方先生沿途讨米回家。舅太眼睛哭瞎，家琦公也成了疯子。田产抵了债，家中应有尽有，典光卖尽。我祖父弟兄十人，讨米的讨米，帮工的去帮工，仅只二伯祖父、四伯祖父文化较高，给人家当了管帐先生。我的祖父振燊公，行十，最小，讨米、卖油条、学篾匠、打洋铁，仍然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奈，弟兄十人先后赶到云南余晋芳的任所，请求姑父找差事，混饭吃。

政局激剧动荡，云南反满情绪犹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余晋芳“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帮这些内侄们去忙乎了一阵子。但终于作出决定：一纸书札，弟兄们十个全部送到了武昌新军营，参加辛亥革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一年，有的半载，大都退了下来。只有我的八伯祖父振灯公在新军中一直干至团总之职，并在汀泗桥战役中壮烈牺牲。

余晋芳为其写的祭文悲痛欲绝，催人泪下，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可惜原稿散佚无存，仅记得他写的挽联：

振军威，乃姑难入梦；
登旅次，尔父远招魂。

没有用典，没有矫揉造作，直抒胸臆，既有褒掖其英勇善战，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又有对烈士亲属的慰勉。作为清廷的一位官员，一位名实相符的遗老，对革命，对烈士能有此襟怀，有此义举，有此哀婉、愤慨交加的悼念，实实在在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抱残守阙、顽固不化、时刻企图恢复帝制如张勋之流的冬烘头脑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家父吴楚瑛先生在北伐时期已是一位英俊少年，随之住在武昌黄鹤楼附近的私宅之中，民国十四年余晋芳任麻城劝学所长兼校长时，又随至麻城就读，常常为姑祖父铺纸研墨，拿烟倒茶，亲聆其教。北洋军阀袁英部窜至麻城，校舍捣毁尽矣。余晋芳回至冯头垸避乱，临行书一联赠给家父：

鹰隼人云睐所向，

骅骝得路慎于平。

“睐所向”“慎于平”真是至理名言。即使时处今日，作为后人的我们，能不细味其做人行事的真谛？同时，这两句又何尝不是余晋芳本人的自我概括和总结？

对辛亥革命抱着莫大希望的余晋芳到了此时，更是忧于衷，而发之于外。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国内军阀割据，战祸连绵不断。中国向何处去，在余晋芳的晚境心目中，仍是一个谜团。他曾为一个下野军官草书一联：

英雄未必难成佛，

隐士何尝不爱名。

言下之意，还是希望那热衷于打内战的“英雄好汉”们以生灵为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自命清高的隐士们迅速丢掉幻想，投身到拯救中华民族的洪流中来。但这也是一种哀叹和无可奈何的表白。

此类联楹，流传桑梓甚多，民间常视为“墨宝”，珍藏不愿示人。文革期间经过横扫四旧不知所剩有几？

我的姑祖母也是一位颇通经史，尤善书法的贤淑老太儒人。在余晋芳1925年任麻城劝学所长和1934年应邀回县总纂《县志》期间，求字之人甚众。作为其贤内助，为之代笔（笔迹近似，落款仍是余晋芳）亦甚多。故今日收藏余晋芳之墨宝者，微有传言，认为余字赝品特多。这恐怕是与我这位姑曾祖母爱惜夫君，为夫代劳分忧有关。

四、知识渊博 尤长史志

1984年，余晋芳受到麻城县各士绅之邀请，特别是得到在庐山隐居的严重的大力合作和支持，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回县总纂《麻城县志》。

北伐时战功显赫的二十一师师长严重，此时以年富力强四十二岁的年龄与余晋芳成为莫逆之交，旨趣相降，有时形影不离。据当时跟随余晋芳左右的家父吴楚瑛先生说：“严师长与姑爹有时彻夜长谈，鸡叫头遍才‘销夜’假寐。‘9·18’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姑爹亲送严重赴上海营救，还设宴为严重洗尘践行。宴席上，余晋芳还大骂蒋介石‘不是东西’”。

家父吴楚瑛先生曾多次教育我和小妹吴树芬、妹夫范志斌说：“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读古代史不如读现代史，读全国史不如读地方志。知今不知古，失诸陋；知古不知今，失诸碍。有机会你们一定要读一读《县志》，其中有姑太的心血，有前人的血和泪。读史可以

长志气，读史可以硬骨气，可以学会做人，做一个有益于故土的志士仁人。”

据家父说，《县志》的编纂，其主旨是欲启迪桑梓后起之秀，能有所作为。当然余晋芳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大前提下，其中也有不少的地方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立场的制约，他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之路。作为一代儒人，在他的足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余晋芳的一生，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直到他的最后一息。

《麻城县志》，以光绪八年的《麻城县志》为兰本，前后分编。《前编》断限于1911年（辛亥），《后编起于武昌起义，迄于1934年。

余晋芳不仅亲自审核全部书稿，还担任例言、序言及疆域等章的撰写和全书的校勘。

经一冬一春的奋战，成书16本，32卷。1935年出版，据家父吴楚瑛先生说，余做事一丝不苟，以治学严谨著称。一次夜深人静，当家父为其泡上一壶新茶、递上水烟壶之时，发现一篇印证材料有误，余晋芳茶不喝、烟不吸，命家父在其身后打扇，一直翻阅宗卷到凌晨。事情稍有眉目，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才叫家父递上茶来，可是茶早已凉了。

嗣后，年事日高，贫病交加之中，靠写几个字补贴家用。最后，日寇大举进攻，面对国家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忧心如焚，沉疴日积。病榻前对探问的亲友询问时局的变化。时而吟诵岳武穆、陆放翁的爱国诗词以抒发其胸中的积郁，时而仰面长叹：“天亡我乎？何如得了！”1938年，在极端忧郁之中病逝，终年七十七岁。

纵观余晋芳的一生，出身寒门，深谙人间疾苦；仕途坎

坷，从来两袖清风；著书编志，企望桑梓有幸；教书应诊，穷愁潦倒而终。一代儒人，身跨两个世纪；上下求索，何如渺渺茫茫。余翰林在天之灵如若有所知，回头再看看今日之麻城，恐怕要挥毫疾书：“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了！

※ ※ ※

家父吴楚瑛跟随余晋芳多年，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乡民代表”的身份，心有余悸而不敢动笔，竟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在1984年匆匆去世。以上所述也只是家父、家祖父以及余晋芳的第四子余觉生先生（我的塾师）摆龙门阵的谈话内容。幼年的我，侍立一旁，听后也是神彩飞扬，如临其境。如今写下来，虽有“拾人牙慧”之嫌，但总算了却了家父的一樁宿愿。



范赓尧和他的遗孀

王慧芳 口述

范道熙 整理

1985年春天，我收到政协麻城县委员会征集麻城文史资料的通告，旋即与政协文史委员会有关同志联系，着我搜集国民党军团长范赓尧轶事。我走访了范赓尧遗孀王慧芳，我是其族孙。王慧芳奶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头脑清醒，记忆力尚好。惟陈年旧事，难免触及某些隐痛，采访是艰难的。从话家常开始，逐步涉及主题，她再三叮嘱，你只当听王奶奶讲故事，不要写成文字材料了。当涉及某些往事时，不无唏嘘，感伤者久之。基于此，我迟迟未能动笔。去秋王慧芳奶奶已经作古，为了忘却的纪念，我还是将她讲的“故事”整理成此文了。

· 投笔从戎的故事 ·

范赓尧是麻城县西后街人，生于清光绪19年（1893），幼习儒书，聪颖好学，父母十分赏识、喜爱，常对亲友夸耀说：“此吾家千里驹也。”清季以科举取仕，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范赓尧也不例

外，他经常做着金榜题名的美梦。

清末国家多难，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侵略，在范赓尧年轻的心中，也萌发爱国救国的思想火花，他立志报国，要在他做官以后有一番作为，像历代忠臣志士那样，拯救自己的祖国。尽管他的思想是朦胧的，把忠君和爱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合而为一。

在他达到应试年龄时，维新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危于累卵，终于废除了科举制度。士子们听说保定办起了军官学校，范赓尧游说同窗学友去投考军校，走投笔从戎之路。但响应者寥寥，均嫌离家太远又害怕打仗。只和族兄范直存（整理者祖父）一道，束装北上，双双考取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高等军事学校，和蒋介石同学。保定军官学校为北洋军阀创办，有洋教官，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教习西洋军事理论，也开数理等现代课程。范赓尧成绩较好。军校思想比私塾活跃，民主思潮和西方军事学说自然一道引进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范赓尧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忠君爱国发展到反满革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毕业后他和你祖父范直存投奔了国民党革命军第四集团军。范赓尧任某团团长，你祖父范直存任某团军需主任。你祖父上任不久，双眼患恶疾，住院医治数月，他出院后，部队已经开拔，他没有寻找部队，据说是行踪不定，失去了联系。他隻身入川，赴自流井盐业公司谋职，任高级职员。后转到成都市盐业总公司工作。几年后回麻城结婚，住了大半年时间，复辞家入川，到你父亲范策先满周岁后，你祖父范直存又请假回麻城接家眷，因你老太（曾祖父）范芳圃爱孙，不准带孙入川，你祖父只得带你祖母刘一珍到成都定

居，你祖父在四川住了二十多个春秋，直到芦沟桥事变后，才双双买舟回故乡。范赓尧和范直存虽然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却走的是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捉摸，飘忽不定的。

· 做一个双手干净的军官 ·

范赓尧虽然和蒋先生同学，但他不属黄浦军校那个体系，不是蒋的嫡系部队。他参加北伐战争，和叶挺也没有交往。他当了团长，仍爱琴棋书画，没有脱尽书生的迂气。一直未曾提升。他曾笑着说：“我这个团长算是当到顶了。”他率领他的团北伐，进驻长沙时，和我结了婚。婚后，我一直是随军眷属。他的原配夫人成氏在麻县老家照顾公婆生活。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四一二事变，五月二十日，长沙许克强发动马日事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事变。全国各地开始杀人了。范赓尧他惶惑了，他失望了。他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那场全国性的清党事件中，他持中立立场。既不是怀疑、清理对象，也不是蒋的忠实嫡系。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按照儒家的祖制要奔丧、致仕、守制（守孝三年不做官），部队驻在沙市一带。对于他这样一个中不溜儿的军官，要回家奔丧守制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三年期满后，他仍然在家中过着一个地主的生活，再也不想带兵打仗，也不谋取地方官职了。他说他的手是干净的，没有沾上无辜同胞的鲜血。贫无所苦，清静贞正自娱而已，做一个穷则独善其身的人。这正是他在实践儒家的做人准则。

· “捷报图” 的故事 ·

他爱收藏名字画。平时舍不得买鱼买肉吃，只要有他看得起的古籍、字画，他是不惜破费的，这一点同你祖父范直存的秉性是完全一致的。你祖父当了二十多年富商号的高级职员，回家时也只是买回几十箱古籍、字画、古铜器，其中不乏稀世珍宝，可惜都给毁了。王奶奶黯然者久之。

就在我们回麻城赋闲以后，有一个人送一幅大型工笔画来出卖，索价一百元大洋。家人说一幅破画哪能卖那么贵，哪有闲钱补破锅，快拿走吧。那人说是稀世珍品，执意要请范团长鉴赏，被庚尧听见了，他出来一看，二话没说，照价收买下了。那是一幅大型壁挂画，比一般中堂画大几倍，题有“捷报图”字样。是清末的工笔画（整理者儿时见过）。他亲自动手挂在壁上，高兴得象发疯一样，连声赞好，呼我们快来看。我仔细观赏，果然笔手不凡，真是美极了。画的中上方，坐着两位神彩奕奕的古代将帅，正在对奕。门口一个军士右手中高扬着一个秉帖（捷报），军帽略偏，口中似乎冒着热气，门口柱上系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口向天，似乎长啸，尾巴高高扬起。而两位将帅眉宇间掩不住英俊的喜气，昂坐不动，眼神则谛视着棋枰，这一切是如此协调，丝丝入扣，活生生的。观赏者似乎听到了兵弁的欢呼，听到了战马的呼啸。而主帅则运筹帷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稳操胜券，成竹在胸。多么生动的合乎逻辑的历史场面。再往略下观赏，第二匹马飞奔而来，马上的兵弁双手向上，仍用右手握着秉帖，身向前倾，巴不得立即飞向主帅身边，报告

决定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告捷的特大喜讯。再往略下观赏，第三匹、第四匹、第五匹……（简直数不清了）战马，驮着兵弁，向一个地方，向主帅身边奔来，“报捷啊，报捷啊，敌人全军覆灭了，敌人全军覆灭了！”我们似乎听到了这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再往下观赏，山川隐约，无数战马飞奔，无数兵士在欢呼，旌旗招展，山呼海啸。在云山深处，似乎隐隐看到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弃甲丢盔，望风逃窜，尸横遍野的惨败景象。范赓尧说这是无价的珍宝啊。

“王奶奶，这是谁的杰作呀？”我不禁问道。

说来话长。我他观赏了良久，赓尧亲自动手，小心翼翼地吧画取下来，卷好，用布单包好，因其太大，只好竖着放在大立柜中，外面加锁锁好后，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嘴角还挂着甜密的微笑，完全沉醉在诗情画意的激动之中。良久，良久，他说你来，让我讲个故事你听。

从前静月寺的住寺是位有学问的长老，静月寺又是富寺，收藏着许多珍贵的文物，经常轮换地向香客展览，惟独这“捷报图”是不肯轻易示人的，除非知名的骚人墨客，即使是达官贵人也难以识荆的。如今“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静月寺的住持（法号我忘了，王奶奶说）乐善好施，寺中又富，他出家人，不聚财，肯破费。一天一个青衣小帽的老人来到寺中，住持接待了他，他未露身世，似有难言之隐，住持可怜他，让他住下。布衣斋食也不多了，一个可怜的老人。闲来他俩谈诗对奕，相处甚安。一是方外人，一是落魄者，彼此彼此。日诸月诸，光阴如白驹过隙，大概有几年了，老人无去意，住持不逐客。什么叫缘分，这恐怕就是缘

分吧。

一日朔风凛冽，大雪封山。住持和老者在斋房闲话，一小徒弟兴冲冲地跑来喊他们出来看猫戏雪。他们走出斋房，果然见一只四脚白全身黑的猫儿在雪地打滚，大概这雪里钻（猫的美称）也喜爱这净化了的世界而尽情地嬉戏着呢。

后来天晴了，雪在融化，雪里钻再也没有那天的雅兴了。小徒弟似有遗憾。老人在寺中白住了几年，无以为报，他向住持要了宣纸笔墨，当着师徒的面挥挥洒洒作了一幅维妙维肖的猫戏雪图。师徒大惊，太美了，太美了，赞不兴口。住持邀老人上座，鞠躬作揖，连赔不是，说真人不露面，我有眼不识泰山，大画家，几年来简慢了。老人惨然说，看来缘分将尽！我是朝廷要犯，我在宫庭画苑作画时无意中得罪了喜怒无常的老佛爷，犯了杀身大祸，幸平日人缘好，小太监们及时向我吹风，机敏地躲过了老佛爷和李莲英的眼睛，死里逃生，在贵寺苟延残喘有年了，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用生平绝技绘一幅大型工笔画相赠，以报知遇之恩。但贵寺现有的绘画材料不行，我得亲自上北京购买，盘缠和买宣纸、颜料的费用共约白银百两，不知长老是否信任而肯破费，以完成我的宿愿？后来住持给他二百两白银，洒泪分别。老画家许以一年后相见。但一去杳然，过了两年还无音信。住持坚信他会回来。又是一个大雪天，老人风尘仆仆地归来了。他说在京城也不敢露面，好不容易托人用高价才买到了理想的材料，跋山涉水，回到知己身旁。从此他专心致志，闭门作画，凡三月，始成。又亲自指导装裱成卷轴，恭恭敬敬地双手托画相赠。他说，缘已尽矣，请从此别！住持苦留不住，美术大师遂上路，飘然远去。住持久久地望着白

云出神。从此云山远隔，后遂无音问，不知所终。住持物故后，寺院萧条，文物散失，捷报图流落到狮子庵，不久又失。终于好花落我家了。这可是稀世珍宝，可别让它再失了呀。

我饶有兴致地听完王慧芳转述范赓尧讲的捷报图的传奇。这幅以谢安、谢玄指挥淝水大战告捷的名画，逃脱了日机的轰炸和日寇的搜山，却未能回到人民的手中。在时局巨变时，被不知其价值的人当浮财收去又当废物给销毁了。王奶奶流出了惋惜的泪。

· 当抗日团长 ·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芦沟桥事变后，范赓尧再也不能寄情山水了。他向政府请求复职出征，投身到抗日的伟大洪流中。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复，1939年任命为鄂豫皖游击战区某支队（团）支队长（团长），转战于鄂豫皖边区大别山中，和中共五大队（属新四军）配合默契。一次在黄冈贾庙总路咀与日寇激战，范赓尧亲临前线指挥，其手负伤，不下火线，直至胜利。这次我居住在牛占鼻附近的山冲家中，没有再随军了。

你父亲范策先原是一位教师，民国二十七年秋麻城县城沦陷于日寇，书教不成了。你父亲于民国二十八年去投奔抗日军的团长叔叔，赓尧见他爱国热情可嘉，请示上峰领导后任命他为支队上尉军需主任——你团长爹的脾气你不知道，一生不愿安排族人，不网罗羽翼做谋私的团长，安排你父亲是唯一的例外。国难当头，炎黄子孙人人都有守土抗

战之责。你父亲当时是有志青年，在任职期间，廉洁奉公，没有丝毫赎职行为，更不用说发国难财了。后来麇尧对我说，他对你父亲在军中的尽职行为是很满意的。

· 再次申请解甲归田 ·

当时国共合作，枪口一致对外，士气也很高，虽然危险、艰苦，但麇尧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治军极严，要求部属对老百姓要秋毫无犯。他是读书人，向往中国古代王者之师，以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为荣。他爱兵如子，体恤部属，为部属所爱戴。后来廖磊去世，陈汝怀消极抗战，制造磨擦。他叹息，他摇头。民国二十九年，局势越来越复杂，麇尧对你父亲说，军中不可久留，你还是回去教书吧！你父亲听从了劝告，不久办清交待就回家了。民国三十年，发生皖南事变，麇尧彻底失望了。他的部队既不能抗日，他还留在军中有什么意义？他再次请求去职还乡，因为他资格老，程汝怀见麇尧既不反共，只好准他解甲归田。

· 刘长卿的故事 ·

支队长要走了，部属挽留不住，都很依恋。一位四川籍的勤务兵刘长卿（和唐代诗人同名姓——整理者），一定要随他一道离队，一直在我家生活。这个刘长卿蛮勤快，在我家挑水劈柴，样样事干，把工钱他也不要，和我们同吃同喝，和一家人没有两样。叫婆婆为老太太，叫麇尧为团长，叫成氏做成太太，叫我王太太，蛮讲理啊。直到日本鬼子投

降以后，我们才打发盘缠路费，再三劝他回老家去团聚，他是哭着离开我们的。三十多岁了，没有成家，我们就是再舍不得，也要劝他回家的。人是有感情的，只是后来局势变化，再也打听不到他回四川老家后的情况了。

· 一失足成千古恨 ·

赧尧一生谨慎，不愿意枪口对内，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奶奶泪如雨下，喉咙哽咽，好半天哭成泪人了。我真后悔，不该来打扰老人家，挑起了她心头的隐痛。

民国三十六年秋天，那时你正在武昌高级商校念书。那年刘邓大军进军中原，麻城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成了国共争夺的战场。一天罗文郎来拜访他。赧尧几十年不和官场中人来往，这个不速之客来有什么好事，叫人纳闷。我和成奶奶都想旁听旁听，可罗文郎连连挥手，说和赧尧兄闲谈谈，散散心，二位嫂夫人请便，放心吧。他不让我们旁听，也怪我一时拘守礼节，冒坚持听听，怏怏不乐地离开了。过了片刻，赧尧送客，罗文郎再三邀他，“请到寒舍一叙”、赧尧面有难色，说不必了，改日再会。罗文郎生拉活拽，说小弟新上任，略备薄酒，请赧尧兄赏光一叙。赧尧推脱不成，遂至母亲身边，叩头一拜，说娘多保重，儿去去就回。起来时双泪直流，和罗文郎一同出门而去，从此再未能进这个家门了。那情景，和穿着大猩红披风的贾宝玉在两个疯颠僧道的簇拥下，在雪地里拜别贾政一样凄惨。

罗文郎把他骗到县署，和县署勤杂人员、几百名保安队

士兵簇拥着他向宋埠逃去。全家人一等不来，二等无音讯，都哭断肝肠了。那是一个愁云惨雾的日子。一个月后，宋埠解放了。范赓尧不知所终，连尸首也未找到。

· 艰难的转变历程 ·

王奶奶伤心极了。我也准备告辞。

她说，你坐坐，轻易不来，吃完晚饭再去。今天打开了几十年的话匣子，再让我把王奶奶的身世告诉你，你会写诗词，看王奶奶的身世可不可以入诗词？

“饭是不吃了，我愿意听王奶奶经历的故事，等我学问有长进时，一定给王奶奶写几首好诗词。”我十分尴尬。

赓尧死后，八十多岁的婆母也病逝了。第三年麻城就解放了。那时我家有十多亩田，是一个小地主家庭。赓尧当几任团长，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只学会带兵打仗，可不知道什么刮地皮，饱私囊那一套。他一生的教条是清清白白的做人，他生前淡泊持家，日子也过得紧巴艰苦，要不是罗文郎骗他害他，当了一个多月的乌合之众的保安团长，解放了也能得到政府的宽大。那么多的战犯都宽大了，何况两次反共战争中洗手不干的爱国军人范赓尧呢？棋错一著，满盘是输，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王奶奶是个苦命人。

她又哭了。

解放那年，我以地主兼反革命军官太太之罪，被扫地出门。成奶奶生一子名绍禹，体弱多病，解放后病故了。后来，成奶奶在火灾中被烧死。只有我、媳妇邹秋华和一个一两岁的小孙范道孝三人相依为命。我未生育。娘家在长沙是

清白人家，是政府的团结对象。解放那年我不到四十岁。土改时人家逼我改嫁。我誓死不从，多次受斗争，受处罚，我甘心情愿。媳妇同情我，劝我回长沙老家避避风。一个弱女子千里寻亲，身无分文，头上有帽，谈何容易。我历经了千辛万险好不容易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长沙老家！我离开麻城后，社会舆论说我不会再回来了。我想到的不是死，而是要活着；不是为我一人活着，我要为这个家活着。我要对得起赧尧，我要对得起这个给了我温暖的家。我要是不回来，媳妇怎么办，孙怎么办？家乡亲人也不同意我回来。我一天也住不下，我魂系麻城，我爱这个赖我撑持的家，我就是榨干骨髓也得把孙养大。老家中的亲人也感动得流泪，终于资助我回麻城了。回家那天媳妇和孙高兴得流泪。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和顶梁柱。我回来接受斗争，接受教育，接受改造。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净我的灵魂。劳动既然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世界，我坚信劳动也能改造一个人的灵魂。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我争着干，一次扎石子时不小心我用铁锤扎在左手上，手指扎扁了，鲜血染红了石子，也洗净了我的灵魂。我扯片衣片包扎后又继续扎呀。挑泥巴，修水库，修河堤，出义务工，我从不叫苦，默默地干呀，任脚磨出老茧，任肩压破了皮肉，经常我饿得昏倒在地，善良的人们都避着我，只有回到家中，孙儿倒在我怀里，用一个纯洁的幼小的灵魂给我以无穷的慰藉，给了我战胜困难的无穷的勇气和力量。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我精神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离的要素。我就是吃糠、吃树皮、吃野菜、吃观音土也要用米汤用汗水把孙儿抚养大。送他读书，培养成为有用之材。

改造世界观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是艰难的。俄国一个

作家不是说过吗，要在盐水里煮三次，要在血水里泡三次，要在清水里洗三次，才能脱胎换骨，（注）象神话中的红孩儿一样，拆肉还母，拆骨还父，不经过这一系列的艰苦过程，改造是不可能的，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对人的改造是伟大人道主义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爱，对人的爱。

我是学生出身，从小读圣贤书，学做人的道理。我和麋尧是恩爱夫妻，也许我受孔孟的毒太深。中华民族四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人格和骨气是不能丢的。我接受改造，但坚持人格，保持做人的骨气。不错我是团长的二夫人，在旧中国准许一夫多妻，封建社会是一夫多妻制的土壤，不应由一二个弱女子负这个历史责任。我和成奶奶以姐妹相称，互相敬重、礼让，没有封建社会女人间争风吃醋的丑事发生。麋尧为这敬重我。我就更敬重成奶奶，成奶奶就更关怀我，体贴我。一夫多妻这个制度是该废除，但我从前没有这个觉悟。女子从一而终也是应该批判的封建道德。但我还认为当年我的选择——不改嫁是唯一正大光明的道路。我只有把这个家撑持下来的义务，没有在这个家不能没有我时抛开它不顾的权利。我要是改嫁而去，或许我个人少为一些难，少吃一些苦，但精神的痛苦是无法解脱的。疾风如草劲，王慧芳就是要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走完人生的道路的。

媳妇邹秋华也为这个家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她学会了助产技术，以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她还经常抽血卖给医院，总之，是以血汗来滋养这个家庭。两个寡妇硬是把这个家庭撑持下来了。

· 晚 晴 颂 ·

我的行为准则终于赢得了人们的理解。

现在有句口号：理解万岁。好。理解是应该称它万岁的了。因为理解能沟通人的灵魂，使这个世界温情脉脉，使这个世界更美好。理解能增强人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不仅族人理解、尊重我，就是原先逼我改嫁的人也渐渐心平气和了。终于打消了他们的想法。三军之帅可夺，匹夫匹妇之志不可夺，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原先人们称呼我时总要附加一个“新”字。长辈称我新媳妇儿，平辈称我新嫂、新姐，晚辈称我新娘、新奶。我懂，这个“新”是贬义词，是二夫人的同义词。在封建、半封建的旧中国，在麻城，就是活到一百岁，二夫人头上这个“新”字是万万去不掉的。这比摘右派帽子还难得多。可我的这顶“新”字帽子终于摘去了，是劳动给我摘去的。

你父亲范策先是教书先生，知书达礼。解放后在河南新县工作，难得回麻城，要是回来，总要来看看我。要是过春节时回麻城了，还要给我叩头拜年。对我的尊重，超过我当团长太太时十倍。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时穷节乃见，世事是奥秘的。

劳动给了我一个新家庭。孙儿参加工作了，也接了一个有工作的孙媳妇。在家中，媳妇、孙儿、孙媳妇，曾孙们个个亲热我，敬重我。日子一天天火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准许回城，盖了新瓦房，现在翻修楼房的资金、材料正在筹备，很快就要开工了。旧社会我没住过楼房，在新社会很快

我就要住上新楼房了。孙儿也评上中级职称了。

从实践中，我深深地认识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旧中国太穷太弱太苦了，新中国一天天强大，国富民强，人民生活一天天幸福。人民幸福的靠山是祖国的强大，共产党的好领导是这一切的根本保证。

我人老了，行动不便，经常卧病，不能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添瓦了。我要教育子孙后代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人间有晚晴。

苦尽甘来，王奶奶有一个幸福的新家庭，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她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苦苦争来的。不容易啊。

我答应给王奶奶写晚晴颂，还未来得及动笔时，她却含笑而去了。她是一个传奇式人物。

人生似此应无恨，何必踌躇唱大风！

1991年6月18日于红安县二旅社一号房

〔注〕指苏联作家阿·托尔思泰《苦难的历程》



坚强的战士 光辉的榜样

——回忆革命烈士施小青同志

(统战部供稿)

举水河沿岸的乡亲们都知道有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为了抗日，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战斗，而又血洒举水。他就是冯家凉亭乡施家大坑的革命烈士施小青同志。他生于一九一七年，一九四一年参加新四军便衣队，以种佃田，打短工为掩护，为革命队伍筹集军粮，设立税卡，为革命筹措经费，同时利用同苦共仇深的农民易于接近的条件，宣传革命的道理，发展我地下交通站和联络员，由于他工作出色，被上级任命为凉亭地区新四军便衣组长。

一九四五年因为地下税收员张某，被指派到宋埠镇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当张某接近城门哨卡时被日伪哨兵发现，当即被抓住。张某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出卖了革命同志，招出来施小青是他的领导人，并当夜由日寇带叛徒赶到陶元管理区的一个联络点逮捕了施小青。

施小青同志平时工作严守党的机密，总是默默地工作，乡邻们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更无人知道他是革命战士。由于叛徒的出卖，宋埠镇的日寇和棒棒队千方百计想从他口里得到我地下组织的情况，这可是白日做梦。严刑拷打，他

从没吭一声，上踩杠、坐水牢，他从没张过一次口，就这样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在狱中同敌人斗争，日寇和棒棒无计可施最后把施小青同志杀害在举水河畔。

多少年来，乡亲们只知道施小青是一条硬汉子，从又没人知道他们的功绩。这就是共产党人，革命干部的本色。直到一九六四年，东北政法机关抓获当时作恶多端杀害施小青的敌棒棒队长时，来凉亭核对材料，人们才知道日寇、汉奸对施小青的非人折磨，人们才知道他是为了革命，为了家乡人民献出了宝贵生命。

每年杜鹃花开放的时候，举水河畔虽没有丰碑，人们心中却有施小青这个烈士的名字，举水畔虽没有坟墓，却有一队队少先队员敬献在大堤上的束束杜鹃花。人们没有忘记烈士，您将同举水河一起永存。



余少仁，余远声在辛亥革命前后

余佩鸿

余少仁，（1892——1915）。余远声，（1894——1922）。湖北麻城木樨河人。他们幼小时，正值我国研究西洋各种学说已到高潮时候。他们启蒙学习就授以新学。加之接受力强，便成熟较早，认识事物最快。1907年随先君至县城入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少仁叔入武昌文普中学，远声叔进武昌陆军测绘学堂。自日知会（湖北同盟会总部）遭封后，文普中学同盟会亦无形解散。少仁叔入校后即恢复组织，与各方面联系更密。尤其与黄州各地的联系，更加强了黄州与武汉联成一片。十月十日事发，他即入学生军，参加守汉阳之役。北伐左翼军成立，任职文书助理秘书工作。南北和成，左军奉调回鄂，被排除黎元洪改编。原武昌出发的士兵编入季雨霖部下。襄樊子弟及左军收编的队伍遣散。他因扁担山之役胸部受伤未得休息治疗，致使肺病上身遂请假返里养病。1915年春，肺部全肿不能呼吸，逝世于家。

远声叔自入陆军测绘学堂后，与同学蔡文藻在学堂组织同盟活动最力。运送革命宣传品来往麻城、宋埠、团风、黄

州、武汉间。某次被学堂发觉，学堂当事恐事情扩大，以犯堂规开除学籍。武昌事起，他即返学堂与蔡文藻入学生军参加守汉阳之役。

北伐左军成立，他任总司令部监视官。左军进河南后，他任职河南宣抚使政务处。未几，即回武汉与石瑛、李子祥改组湖北同盟会，成立湖北国民党分部。并任湖北总稽查部教练员。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的党徒在武汉屠杀革命党人。他与先君避地西南至宜昌，继遣云南。1924年，西南各省同志意见渐渐扩大。先君嘱其继续求学。翌年夏，他至北京。秋入北京大学。笔研书籍刚刚排定，“筹安会”的爪牙到校，要学校写请愿书。他在同学中首先奋起反对，险遭爪牙毒手。于是学校命他退学南回。他仍留京，联络同乡和云南同学继续活动。得知蔡锷秘密南下，即返云南，任护国军参谋。护国军由蔡锷统率，北上攻川湘，东征广东，全国响应，袁世凯死去，洪宪帝制消灭。继之发生新旧约法之争，孙中山先生号召扩军。他至广东，会见孙中山，嘱万卿回鄂组织武装响应，于是兄弟同行返里。

鄂东护法军成立：他任参谋及协助先君联络各县县长、士绅、辛亥革命老人，并宣传护法的意义。湖北武装响应护法北伐的有鄂西、荆州、鄂东三处。三处以鄂东兵力较少而声势最大。（武汉、郑州的大小军阀甚为恐惶两处的报纸均报送其消息）因指挥统一，进军神速，人民拥护和联络各方及宣传有力，对鄂东后来影响最为深远。青年学子，再不固守田园纷纷外出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鄂东护法军失败后，两叔走上海，先君再至宜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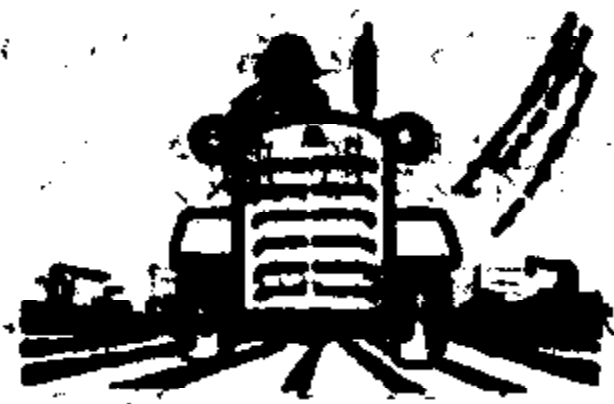
是年秋，南北出现调和现象，应夏斗寅之请至湖南，建

立“鄂军团”。鄂军团人员均系辛亥武昌起义的士兵。他们被黎元洪遗散，不能归家，流落鄂南、鄂西、湘北及长沙。念革命、念家乡而成立一支湖北队伍。参谋、秘书、交际及政治教导员由他一身兼任，并在讲武学堂讲授政治课程。

“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长沙。他首先赴各学校演讲，宣传北洋军阀卖国罪恶，运动很快展开到湖南全省，成为响震最激烈的省份之一。

1921年春，湖南省当局特请他任湖南浏阳县县长。因浏阳、醴陵一带连年被北洋军阀烧杀掳掠、施行苛政，使人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他至该县即免捐减税，亲自下乡放赈，召回流民重整家园，并贷款恢复各种手工业。兴办教育，亲至各学校视察演讲，改进课程，浏阳元气渐复。此时，叔父十余年来为国奔走，未曾息，以致劳疾一发而药石无功。于1922年农历九月逝世，时年二十有八。浏阳各界代表护送棺槨至长沙。长沙痛哭，屈贾同悲！

他英俊潇洒，健谈善辩，思想敏捷，作文赋诗，提笔即成。尤长七绝，写有云、贵、湖南风俗七绝二卷约三百余首。



民主革命先驱屈子厚

段 美 钧

屈子厚，字开埏，又字伯原。1851年生；1911年卒。宋埠区屈家巷人。共和党员，县议会议员。

1851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1853年，其军千余人由河南进入麻城宋埠。屈子厚家为宋埠地区富户，为避太平天国军，其父登嵩携其眷属逃往四川寄居叙州府。其时，荆州何雪圆掌教翠屏书院，江夏彭瑞毓亦寄居叙州府。子厚父视何、彭为湖北大同乡，便使其子就读于翠屏。1873年，登嵩谢世，子厚随母周氏扶柩回乡。后从周歧源、邓润生先生受业。1879年，屈子厚参加县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取入县庠。1882年，参加乡试，名列第三，考入省经心书院肄业。1891年，张孝达移任两湖总督，取屈子厚入两湖书院。屈子厚与同学甘云鹏、王葆心为研究经济之学，探求振兴中华途径，组织“质学会”，主张推翻满清腐朽统治，振兴民族革命精神。又以国事日非，与同学唐才常等锐意革新。甲午（1894）中日战争爆发，屈子厚以办团练为名回麻城，召集有志之士，成立“救国军”，反帝，反清。1898年，唐才常等于日本东京成立“自立会”遥推屈子厚为二十干事之一。1900年，唐才常等归国至汉口，秘密组织领导“自立军”起事，屈子厚积极响应参加。起事旨在“保全中国自主

权，创建新自立国”。拟以汉口为中心，乘北方义和团进入京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在长江中下游起事。后为巡抚于荫霖侦知，唐才常被逮。在唐才常行箱内搜有刘遂仁致屈子厚的信，即发出逮逮屈子厚的通缉令。屈子厚因有事已至河南，故得以幸免。不久，于荫霖解任，屈等由豫返鄂，并上书张督，进行申诉。义正辞严，张从其诉，并解除通缉。

1903年，屈子厚应知县李汝钊之聘筹建县高等小学堂，不及半年，学堂建成，被聘为堂长。1906年，又受知县李士英之聘，任劝学所学董（教育局长）。同时，督理建成宋埠高等小学堂，并兼任堂长。

1908年，屈子厚召集“救国团”旧部，计划与荆州、罗田会堂共举反清起义旗帜。事被湖北巡抚陈夔龙侦知，屈又被通缉，遂逃走河南。受其提学使孔祥霖之聘，充任第二师范学堂监督。后又历任北京江汉学堂监督、黑龙江绥化府中学堂监督。1911年春节里，被选为县议会议长。此时，屈子厚仍与武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

武昌起义爆发，屈子厚集合爱国志士，仿制起义旗帜，响应武昌起义，劝说知县张锦云反正，张不但不从，反视屈为叛逆，遂起心加害。适驻麻城防营管带刘金堂向张锦云借饷军餉。张锦云本不愿意，乃嫁祸于屈子厚，说议长不准。刘金堂怀恨在心，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带兵闯入议会。一士兵持刀直砍屈子厚颈部，屈当即毙命。

屈佩兰（子厚之胞侄）在施南师范闻耗即赶赴省城诉冤。黎洪元立派旅长罗鸿升来麻城，将凶手就地正法，刘金堂被解省处决，张锦云被革职。

事后，麻城人民为屈子厚及为革命牺牲的余诚，周干丞，于歧亭杏花村建立烈士祠以记。

辛亥革命先驱余万卿革命事略

余 佩 鸿

余万卿（1886年——1930），湖北麻城市木樨河人，母亲贤慧、勤俭，教管颇严。使万卿叔从幼小就养成了三不怕的性格：一不怕自己苦，二不怕事情难，三不怕别人强。为人朴素爽直，机警勇敢，而忠于事业。因鄙视科举，不愿应试，于是母亲嘱其至武昌求学，遂弃学从军。

1905年冬末，简斋叔由日本回国，值“日知会”组织“湖北同盟会”，叔首先响应参加。因活动最力，所负工作亦多，致屡犯军规，被开除军籍。组织遂派赴鄂北、黄州、荆州等地，联络“联络点”同志。同盟会被郭尧阶报密破坏，日知会遭封。简斋叔化装逃沪，叔父习之促叔回里，叔恐家中谴责，犹豫未决。适行中有黄安（现改名红安）丝油商人带货返里，遂化装与其同行至该县之龙潭寺。后得知武昌搜查革命党人仍急，遂往鄂北豫南，继至四川万县重庆等地活动。

1909年秋，简斋叔第三次由日本回国，与詹大悲、蒋翊武联络军中同志集合于武昌抱冰堂，由简斋演讲“党的主义和政策”后，即组织军中同盟会。后又组织湖北共进会，简斋担任联络员。当文学社成立时，简斋极力主张与该社联合，

并任合并筹备员。

武昌起义前夕，共进会以简斋对鄂北豫南情况较熟即派往活动。武昌事发，消息传开，中州境内县镇纷纷反正，并迎接左军北上，使左军入豫如入无人之境。南北和成，左军奉调回鄂。此时简斋所指挥的中州反正队伍已进河边。河南未独立，清驻河南队伍继续反抗起义军，故叔仍留河南继续斗争。失败后，即第二次进川。在川东继续组织队伍活动。秋，熊克武、杨××在重庆举兵讨伐袁世凯，相互联系声势震惊全川，响应者甚众。熊、杨失利后，简斋坚持奋斗转战川东数县达数月之久。失败回鄂，第三次走大别山在老河口、襄樊与同志组织武装计划定后，至武汉活动，在汉阳购得枪支火药运过汉口宗关时被稽查人员发觉。简斋与之周旋，乘机逃脱。第二次军警搜索，而他已在汉口开往黄州的船上。

1917年秋，孙中山先生号召护法运动。简斋赴广州。孙中山囑他回鄂组织武装响应。他回里即与先君、朱亚藩、远声叔组织“鄂东护法军”，由简斋任总司令，朱亚藩副之，远声任参谋。是年农历腊月初二武装起义于故里麻城县（现改麻城市）木樨河余家冲之新兴庙。首至罗田藤家堡收编商团队伍，是夜继续北上松子关围攻盐卡、哨所官兵。得手后，乘胜前进未逾月即将罗（田）麻（城）黄（安）三县界嵌的盐卡、哨所队伍缴械收编。入黄安、黄陂进孝感袭击京汉铁路。与王占元队伍战于黄、麻、黄陂之间。为保存实力，退入河南，遇河南督军赵倜所辖之队伍战于穆陵关。再转入麻城回藤家堡。继沿巴水两侧，南下入浠水黄冈。准备渡江迎接北伐队伍。不料北上护法军失利。直系军阀吴佩孚

乘有利之机调兵由鄂城渡江会同王占元队伍夹攻，初战于巴水下游，继战于黄冈之旦店，玉里畈等处，最后退至麻（城）罗（田）黄（冈）三县交界之黄岗庙。此时赵倜所派的军队已至松子关。于是解散队伍。至此，鄂东护法军与三省军阀奋战半载遂告失败。简斋与远声走上海，先君再至宜昌。

失败后，王占元继派一营队伍进驻木樨河镇，营长曹某强压地方供应粮油、鱼肉。事后均由我族照付。其连长王某至余家冲将简斋所居的全垸（名杨树垸）房屋烧毁殆尽。继续准备烧毁对面的二垸（名新屋二垸）不料途中下山坡，王的铁杠忽然折断，王迷信重认为不利，遂罢而返。

几次举兵失败，简斋仍未曾一日忘记武装起义。时与人言：“革命要以武力为主，武力又要建立在乡间”。他作事简便敏捷，最厌高谈阔论。某次会议与詹大悲发生争论，举手击詹而不悔。詹亦不介意，自后二人交游更密。

1922年春，他乘直奉两系军阀战争之际，四至鄂北、豫南组织武装起义，未及数月即占领自老河口以上，荆紫关以下两省边界的地方，控制数县。后直系胜利回师河南，与湖北督军肖耀南夹攻。叔坚持奋斗至翌年秋因粮弹缺乏，战地缩小，外地无法援助。为保存实力，以图异日，遣散人员，密藏枪支于民间。他至上海，路经襄、樊至武汉，真可谓胆量出众。

大革命北伐，党派他前行，首至湖南，使鄂军混成旅顺利迎接革命编为陆军十三师。当北伐军与敌激战于湘北、鄂南时，他活动于武汉。武昌克复，政府即派他任鄂北老河口市公安局局长。其时鄂北仍在北洋军阀势力之下。还有军阀残余队伍。他集合老同志、旧部下，不数日，革命旗帜飘扬于

老河口市。遂使鄂北各地重要镇市顺利收复。后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鄂北、豫南人民起义，成为革命根据地，人们都认为他打下的良好基础。翌年春初，奉调任湖北全省茶税总局局长（时詹大悲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他肺病已复发，仍坚持工作。总局之下有六分局分布全省。他一一视察。汪精卫背叛革命时他病重入日租界医院治疗。待病好转出院，同时来租界的詹大悲、李汉俊均已遇难。其他同志亦不能立足而星散，消息断绝、音信不通。未几，旧病复发，未能奔走。于1930年初夏逝世于汉口之日租界。

其故里先人产业毁于北洋军阀，无立锥之地。他虽曾任税政工作，因性豪爽耿直、忠于革命事业，厚待同志而不私己，故无蓄囊，以致家境困顿。无子女，逝世时棺槨无着，由在武汉族人集资安葬于硃口铁路外之义地。他好金石善书，气势雄伟，笔力刚劲颇似其人。

抗战胜利佩鸿路遇武汉，晋谒叔墓，而面貌全非，壁空一片，杂草萋萋。痛哉！



余 诚 轶 事

余品安

我的祖父余诚的革命事迹，八十多年来，虽传颂不少，然因资料遗失太多，不免挂一漏万。据叔祖余淑先和其他一些长辈的回忆，还有不少轶事。现整理数则如后——

· 天资聪颖 勤奋好学 ·

诚公自幼聪明，过目成诵。十二岁即读完四书五经等很多书，能诗能文。是年，一长辈去世，令其诵悼词，但祭奠时，只有开头数语而无下文；而他立即口诵成章，且首尾贯通未曾中断。在场长者无不称赞。令其写出，是一篇很好的骈文。

由于自幼博览群书，学业尤精。1902年参加县试获第一名；次年省试中付榜。时年十九岁。

诚公读书，有一条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珍惜时光，日必求学。常常深夜读书，有时行路也手不释卷，边走边看。一次，其叔雅言问曰：“尔至聪明，还这用功？”他曰：“我并不聪明，只不过记住前人劝学的话：学要专心致微；学而时习之；要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所以

我手不离书”。

诚公学习时，做到三到：口到、手到、心到，故开卷必得。他常说“读书的时候要想，想了以后要写，心口手三者合结，读过的书就会记牢”。

他的这些方法，不仅在求学期间如此，就是在留学回国以后，不论是回家探亲，还是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如在上海、武汉筹建中国公学，组织同盟会（湖北分会），在那么繁忙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懈。据这个时期日记记载说“虽如何匆忙，一日当求一日之学问”及每日读书的记载与心得。他曾有一首自责自警的五言诗曰：

光阴逝如飞，学业滞不长，
何如桃李华，独自当风赏。

诚公的求学精神，就象一条红线贯穿他短暂的一生。十多年购书两千多册，且都阅过。如《庄子》、《荀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乃至纪晓岚的《阅微堂笔记》等等，都有朱笔圈点和眉批。从这可以看到他在学习上做到博约并重，而在约的方面，可算做到了“求鱼”而“涸泽”的地步，深有感人之处。

· 访民疾苦 立志救国 ·

诚公所处时代，适置国弱民穷，时势倾颓，故痛恨清廷内政不修、外交失败而残酷压迫人民的丑恶局面。

少时，目睹满清腐败，曾痛切呼喊：“今时何时也，最危险最可惜之时也”。

1893年，听伯父浩吾从北京传来康梁变法失败消息而义

愤填膺，捶胸顿足；

1899年，在武汉求学，随族叔子存遍访各地爱国人士和哥老会、三合会等，先后至鄂南、湘北、宜昌、万县、重庆、九江、安庆、上海、苏杭等，深入调查民间疾苦。

1900—1902年，又与族兄北上观察北方形势，调查民情，曾走访义和团战士，在河南见人民流离失所而痛哭流涕。……

忧国忧民，使他认识到要拯民救国，振兴中华，走改良主义道路不行。

特别是他博览群书，广纳百家之言，又不为封建道德和在科举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所束缚，而能根据时代与人民的需要，“御其精者”，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新认识、新思想，就是民主主义思想。

因此，他对科举采取否定态度，毅然走上唤起民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

他的目的，就是要“养拯高尚之人格，造取精绝之学业，建设新政府。使中国为第一等强国，皆吾辈份之事。若以小得而自矜，奚足与言大计”。

他还说“当立身于喜马拉雅山之颠，放眼以察大势，将中外古今之事迹，置吾眼底，以公理藏于吾脑海，择其尤精，以施诸吾民，乃我今之第一宗旨也。若徒断于尺寸间，适足见其小而可怜耳”。

这是他平生志愿的表白，又是他革命实践的概括。他是如是言而如是作的。

· 不惜家产 从事革命 ·

在科举时代，读书人通常向往的是功名利禄为此而寒窗苦读，谋求一个宽阔而平坦的仕途。诚公若是走这条道路，其前景必然可观，十九岁即中付榜，留过学，可是他为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毅然投身当时国内外一系列革命活动。

当时从事革命活动，不仅政治环境险恶，经济状况也十分困窘，诚公的革命是不避艰险，不计名利，不惜家产去寻求真理，从事活动的。

祖父时候的家庭，在河南商城经商，资产颇丰，在老家麻城又添置了一些田产。可是诚公为革命奔波，开支浩繁，全部由家庭接济，几年工夫，频于破产。这对一个封建家庭来说，虽然有些矛盾，然家中、族中特别一些兄长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在对待财产问题上极为开明。

诚公既不吝惜家产，不计名利，也不因此影响工作和求乞他人。这在他回家时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并曾录《崇明学案》语以自警“大丈夫冻则冻死，饿则饿死，方能堂堂立于天地间，若开口告人贫要人怜我，以小惠啣沫我，则无为贱丈夫乎？”又说“欲为豪杰者，责任心不可不强烈，名利心不可不扫除尽净”。“不将名利圈打破，终不能养成高尚之人格，遑救国乎！”

这说明诚公为人高洁，克苦厉志，不惜牺牲个人、家庭利益从事革命的。

· 不顾生死 奋斗不息 ·

清朝末年，对敢言革命者尚予治罪，对实行革命者则更行杀戮。诚公就是在这样残酷统治的逆境中，置生死于不顾，唤起革命的。如：

1904年与张难先等组织“科学补习所”，与湖南黄兴的“华兴会”兴谋起事。这在当时国内，没有胆识是做不到的。

1906年“醴萍事败”，九人下狱，他曾计划招九江敢死队两千人来武昌，用炸药炸毁各官署，这没有不怕牺牲的勇气也是不敢想的。

这些说明，诚公在生死问题是随时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曾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吾人立志救国，须先打破生死关，其余名利心等自然易断”。又说“生命既能牺牲，则声色货利自不足当吾一顾。

既然不怕牺牲，何言疾病。在长期的日以继夜的奔走中，积劳成疾，长辈们曾劝其稍事休息，勿操之过急。他说“救灾拯溺，岂可缓也”，这时他已患重病，仍置身体于不顾。如在1909年回国后，在武汉仍与詹大悲等商量布置工作，在蛇山抱水堂发表演讲；路过团风时，仍详细了解鄂东革命发展情况，宣传革命。直到回到老家危在旦夕，仍念念不忘学习和工作。于辛亥革命的上半年去世，时年26岁。

（余品礼整理）

（附记：这是根据余品安兄提供材料的一部分。按我所知：诚公事迹，从早年张难先写的《余诚传》，到现在的省

政协贺觉非整理的《余诚》以及《麻城县志》《武昌文史》、湖北省和麻城市的《文史资料》，都只是主要事迹（也都称事略）。确有些轶事见诸报刊，仍有遗漏和错讹。如《江汉早报》曾有一篇《余简斋遁迹龙潭寺》的短文，就是把余万卿伯祖的事与诚公（简斋）混为一谈了。借此予以澄清）。

并附诚公遗诗（载《麻城文史资料第三辑》）读后，依原韵、二首：——

其一：谁为首义开生路，① 一代英雄振国魂。
唤起江流翻巨浪； 誓驱鞑虏出榆关。
生灵涂炭何能忍？ 华夏硝烟怎得阑。
痛惜沉痾犹不息， “救焚拯溺”为元元。②

其二：不朽诗篇不朽人， 骊歌高唱见忠魂。③
勤研中外文明史；④ 勇破古来生死关。⑤
先觉先知谋战略；⑥ 忧民忧国复年阗。
丰功直属成辛亥， 始有人民换纪元。⑦

〔注〕①“湖北党务，得余、刘和衷共济；加之党人多自田间来，喜与总部通。其每步之连，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转引自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 P. 26—28）

②见张难先先生：《湖北革命知之录·余诚传》

③遗诗系1906年诚公第二次出国时所作。其中有“漫唱骊歌辞故里”之句。

④指在东京从事革命活动时，精心研究中外哲学史。

⑤见诚公《丙午日记》（1906. 6. 22所记）

⑥指武昌、东京之革命活动，在武昌发展同盟会会员，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在东京为《民报》撰稿，并主编《河南》杂志，与保皇派论战，章太炎先生称之为“神州奇才”。

⑦见李书诚先生《辛亥革命活动为什么在武昌爆发》（载1961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余品礼诗并注）



林则徐与麻城学书袁铎

——最新发现的一则重要史料

刘 宏

林则徐是清末禁烟运动、反抗外国侵略的英雄。他还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最近，我在读《麻城县志》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篇林则徐撰写的《四书题解序》。

《四书题解》，清袁铎著。袁铎，字金溪，湖北麻城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与林则徐同科进士，嘉庆十九年（1814年）与林则徐同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南、云南道监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他“侃直端要，风骨峻整”，“遇事敢言，尤以天下大计为己任”（《麻城县志》）。后来，“以言事去官”，主讲江汉书院，曾书一联于院门：“不勘破义利关，何须讲学？要识得忠孝字，才是读书”。成为学院名言。袁铎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进行教学改革的实验，使三楚“士风翕然一变，宏才硕彦，多出其门”（同上）。当时名贤，也常叩门问道。1830年8月林则徐接旨放湖北布政使，“公暇尝就君谈艺”，所谈应是改良教育的问题，因为他此次“官楚”前，曾借在京“侨居静俟”之机，与龚自珍、魏源等切磋“经世致用”之学，况且袁铎在教育教学改革上又卓有成效。《四书题解序》写

于一八三八年。那是林则徐第二次来楚，任湖广总督。这时，袁铤已谢世，林则徐“悲叹不自胜”，于是，将自己的感慨与主张写进了《序》。文字虽不多，却集中反响了袁、林的教学思想，也表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二月十五日，袁铤上奏《请剔除考试积弊疏》。他指出：“臣闻近日各省风气，应试士子有探听调廉官员，迎于中途而拜为师者；有交通官谒于省寓而拜为师者。其贽仪，或数十金百金不等，以求荐定。议定中后谢费千金不等。在外招摇如此，入闱后彼此关通，甚至隐匿卷，转取平常之卷与有关节者并呈，谓之“衬荐”……袁铤弹劾各省主考、学政诸多的贪赃枉法的赃官，其见识与胆略为当时所少见。林则徐在这篇序文里赞道：“疏陈时事，皆切于民生吏治，弹劾不避权贵。”

林则徐向来对违犯“科规”者深恶痛绝。就在好友袁铤上疏的这年九月，他奉命出京赴滇，任正考官。他不徇私情，严肃处理抄袭作弊，选拔“文理忧长”的“真才”。云南士子因而“感悦奋发”，称赞“自庄峿启城，汉武置郡以来，未有今日之盛也”（林则徐《云左山房文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袁、林间的相互影响和兴利除弊、改良教育的决心与信心。

从这篇《四书题解序》我们可以看出，林则徐的教育思想与麻城袁金溪颇一致，相知很深。这篇《序》着重介绍评论袁金溪成功的教学实践。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林则徐的教育思想。其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联系。林则徐对袁金溪的教学“有关事道”、“于君国伦常之所系”很欣赏。因

为，这与他和龚自珍反对空疏无用的教学，倡导“经世致用”的教学思想相同。在当时，各级各类学校都成了科学的附庸，学生为了应试都不得不苦钻“义理”、“考据”、“词章”三派的既“无用”又“无实”的所执学问，将学生变成远离现实、整日埋头于古书堆里的学究。而袁金溪的教学却为书院引进了一股活水。林则徐以改革家敏锐的眼光发现它，肯定它，这无疑是对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教育思想的否定。这与他关切民生、忧国图强的情怀是紧密相联的。

第二，学生的学习要做到“身体力行”，在实践中领悟“圣贤之言”。“必于圣贤之言实能身体力行，而后宣诸口者无肤浅语。”林则徐在《序》中特别记述这句话，充分反映出他们在教学思想上的完全契合。当时的书院，普遍存在死读书的恶劣学风。林则徐主张求知要“身体力行”，以行求知，摆正了“知”“行”的关系。其次，他不仅是在倡导与“俗学”相悖的教学思想，而是在探究如何为社会养培有用之才的问题。因为死啃书本，就不能切于时务，所学于己于国何用？如果我们对林则徐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作全面地分析，就会发现，他称道的“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与他联系实际、改良当时社会政治的愿望是分不开的。

第三，教人以根本，授人以法则。“大匠海人必以规矩”一句既是肯定袁金溪成功的教学实践，又表明了林则徐所倡导的教学原则，即教人以根本，授人以法则。袁金溪教导学生要“身体力行”，则自己先“身体力行”之，以身示范，用自己治学的方法和态度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此

则教学之轨范也”这句话既是林则徐对袁金溪教学方法的充分肯定，也反响出他不满意当时单调乏味、“儒腐无用”的教法，倡导教学互补、师生交流的新思想。

今天，我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林则徐在当时提出的改革教学的主张，今天读来，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明末文学家刘侗

江 乐 山

刘侗是明末著名作家，文笔精炼，不同凡响，属竞陵派中的骨干。著有《龙井崖传》、《雉草》、《名物考》十卷。特别是他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课》，流传于世，影响较大，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当代出版的古代散文选集，大都选用了他的散文。但是，对于他的生平及著作，至今还未引起应有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刘侗是湖北麻城人，生于万历甲午（1594年）九月初六，卒于崇祯丁丑（1637年）闰四月初一。字同人，号格庵。据1990年4月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第95期载，刘侗之母“生来有异相奇丑，怀其夫遗腹子十一月，始堕地无哭声。传说，降生时突闻一股浓烈桐油味，充满产房，乃启名‘桐人’。不三日眼开，眼瞳闪闪发亮，故又名‘瞳仁’。他幼从学叔祖（刘秀才）启蒙塾。塾后院乃为葡萄园，故他从小特别喜爱画葡萄，不师自通也。他的聪明才智来自天赋。从幼年到成长，言谈举止均异于常人。无论史经书典，不经塾师讲解，皆能背诵，出口成章。”另据刘侗墓志铭所

撰，侗为正德嘉庆间兵部尚书刘天和之四世孙，好学善思，不苟同俗见。“性孝第，笃友谊，在丑夷独异为人，一事类乎凡，则耻终身。为文，择一语犹人者，作数日，嫌，焚而后已也。”因见解相投，与竟陵谭元春（友夏）结为友。他们同时被钱塘督学葛寅亮取为生员。因试卷上的文章奇奥，故有人以葛寅亮为楚人而“失鉴”，向上入奏，遂将刘侗、谭元春等予以“降等”。这样一来，社会影响更大，他们的文章得到更多人的称赞。特别是竟陵（湖北天门）一带，习此文者益众，致为竟陵派。侗又携友至吴、越读书，广交有才之士。后至北京游历，又与当地入于奕正友善，故合撰《帝京景物略》。崇禎癸酉（1633年）入太学登燕榜贤书，次年为进士。然而未被选用。接着，纵游江淮、秣陵名胜。又三年，即崇禎丁丑（1637年）才被选授苏州府吴县令。在赴任的舟上离世，时年44岁。

二

刘侗善独立思考，对人对事，必冥讨幽测，寻根究底，不苟同于世。这种敢于探索和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文人中，实属难能可贵，为了文学上创新，执着追求，拜师结友，游山访胜，志在四方，常常“无还楚顾家人儿女意”。他写一诗亦可为证：

出门未属秋仍滞，十度曾登送别舟。
久客畏闻家有信，逢人但道邑无收。
衣粮不耻因良友，僮仆多言怨漫游。
夜夜酒同乡梦醒，舍边鸡与渚边鸥。

此诗题为《久游复至鄂得家信将别黄宗之》，载朱竹垞

《明诗综》。诗中道出了多次离家“漫游”，从春至秋，思乡之苦。同时，也可窥见其与“良友”的情深谊笃。同乡友人周世遴的诗《送刘同人》（见《伯誉诗文集》）也表现了他们友谊的真挚：

前日十里外，访君寒雨时。
堂上花为茵，门外藿为篱。
温然谢揖拜，但问寒与饥。
未饮已先醉，十觴犹不辞。
此意何足道，至今萦我思。

刘侗对友人也总是待之以诚，尽力相助。所以，他的朋友赞扬他“自内外戚至交游，苟有急期，救之无毛发不致。”也因如此，才有与朋友的合著传世。

刘侗在文学创作上，虽然主张“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要求“真有性灵之言”。但是，他对现实生活，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表现对劳动人民的切切同情。他写的《赛社祠》即为例证：

春社典春衣，秋社饗梁肉，
妇子且莫喜，场熟廩不熟。
辽阳方告警，农助官家谷。
辽租十增三，官租三增十。
里胥登门催，斛半量一斛。
益以鼠雀耗，完数恒不足。
赛社报年丰，社神听我祝。
但愿边患平，强于仓储蓄。
神保太息言，辽平尔何福？
粮随辽饷加，不随辽饷复。

播州几月兵，至今农叟粥。

如杜甫、白居易对农民的悯怀，刘侗的诗亦有反响。即使在“序致冷隽”，“幽深孤峭”的《帝京景物略》中，也不完全只是表现作者孤僻的情怀和对现实的淡漠，在对景物的客观描述中，仍流露出对农事的关切之情。兹录《三圣庵》如次：

“德胜东，水田数百亩，沟洫浚川上，堤柳种植，与畦中秧稻分露同烟。春绿到夏，夏黄至秋。都人生有时，望绿浅深，为春事浅深。望黄浅深，又为秋事浅深。望际，闻歌有时；春插秧歌，声疾以欲，夏桔槔水歌，声哀以喟，秋合脯赛社之乐歌，声哗以嘻；然不有秋也，岁不辄闻也。

“有台而亭之，以极望，以迟所闻者，三圣庵，背水田庵焉。门前古木四，为近水也，柯如青铜，亭亭。台，庵之西。台下亩，方广如庵。豆有棚，瓜有架，绿且黄也，外与稻杨同候。台上亭，曰观稻，观不直稻也，畦陇之方方，林木之行行，梵宇之厂厂，雉堞之凸凸，皆观之。”

此文既没赞颂“三圣”，也没描绘庙宇，着重写了农田林木，春种秋收，豆棚瓜架之类，充分体现了刘侗对农事的关心。特别是对“不有秋也，岁不辄闻也”的情形，其风情与感慨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刘侗虽出书香门第，但未作官；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对其为人，我们当有正确分析。

三

刘侗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肃，特别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为可贵。仅从风行于世的《帝京景物课》的撰成，便可见一

班。方逢年为该书所作序，云：“周谔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经年而成。”为写此书，刘侗在当地（燕），采访达五年之久，撰写一年。刘侗在“自序”中，也有较详尽的记述：

“侗北学而燕游者五年。侗之友于奕正，燕人也，二十年燕。山水间多不敢私所，见闻彰厥高深，用告同轨。奕正职搜讨，侗职摛辞。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敢辄许也。所未经过者，分往而实之。出门各向，归相报也。所采古今诗歌，自雅以南以頌，舍是无取焉。侗之友周损职之。三人挥汗虞州研冰而成书。”

于奕正是顺天府人，好游燕京名胜，了解甚多。尽管如此，刘侗还不轻易下笔，凡“不经不典”的“侗不敢笔”，且“分往而实之”，非亲自去察看或查实不可。这一点，连于奕正也佩服。他说：“成斯书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春；事一未详，发篋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捉问；字一未详，动色执争。历春徂冬，铄铄两两而帙成。”撰书取材时，对于有疑问的材料，则一点也不让露掉。真所谓“疑者罔溢，信者罔遗”（于奕正语）。刘侗的文辞，“怪匪撰空，夸匪溢实”（于奕正语，同上均见《麻城县志》卷32）词句虽然奇奥，但并非言过其实。能做到这一点，一丝不苟，确实不易。

《帝京景物课》分八卷，据《四库全书提要》载：此书详载北京景物，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以京师东西南北，各分城内城外，而西山及畿辅并载焉。所列目，凡一百二十有九。每篇之末，各系以诗，采摭颇疏。”此书，既是一本很有文学价值的散文作品，也是一部极有资料价值的

好书。故许多燕京人说：“燕难为书，燕不可无书也。”由是观之，此书填补了“燕书”的空白。

至于书名中之“略”，方逢年是这样解释的：

“崆峒之上，广成子之石室存焉；西山之大小翻，王次仲之所落翼也；息垠之涌金马门；张世杰之生花阳村；谢枋得之饿悯忠寺……兴会所不至，斯不及焉，曰‘略’也。谅哉！”

正因有此，所以，那种对该书未记载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双塔的指责，就未免失当，也无视“略”字的含义了。吹毛求疵地苛求前人，不足取。

四

《帝京景物略》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特色的散文著作。既有竟陵派“侧调么弦”的特点，异于常规的遣词造句，不能一目了然，也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地方。此书的《序》，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其言文。其皆隐。其取类广以僻。其篇幅无苟畔。其刻画也，景若里之新车，鸡犬可识也，物若偃师之偶，歌舞谈笑，人可与娱可与怒也。粤古作者未有是矣。”

《帝京景物略》中的文章，篇幅都短，文字极其简炼，如《报国寺》中的几句：“僧视客颜定，导之上毗卢阁，望三殿日光、四坛雨色，意气始得扬。每日霁树开，风定尘短，指芦沟舆骑载负者井井。”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即是：

“和尚看到游客的脸色平静下来，便引导他登上毗卢阁。在那里望见三座宝殿映照着阳光，四面法坛笼罩在雾气蒙蒙的景色里，游客的神气才开朗起来。每当雨过天晴，树林雾

散，风停了下来，尘土飞扬得极低，指点着芦沟桥那边，推车的、骑马的、装货的、背东西的，看来井井有条。”这段话，写了导游的和尚的心理和行动，也写了游客的心理和活动，特别是远近的自然景色及人物活动，写得更为细致。没有造诣很深的文字功夫，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刘侗描写的笔划是很细腻的，往往给人以身临其境或如见其人的感觉。仍以《报国寺》为例。此篇中对观音菩萨的描写，真可谓栩栩如生：

象可尺，宝冠绿帔，瞑而右倚。偃左膝，膝承左手，手梵字轮；植右膝，膝植右肘，左腕支颐焉。右倚不端坐者，宴坐也。右肘微宏者，肘屈植也。准、颊微偏右者，支颐也。”

虽然观音的塑像只一尺来高，但是，其神态、眼睛、鼻子、手足等等，都写得细致入微，连右手肘因为弯着而显得稍稍有点粗壮，连鼻梁和面庞因为腮帮子撑托着显得有点偏右，都刻划出来了。没有实地观察和善于描写的笔力，是难达到这种艺术效果的。至于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有声有色，更是整部书中，几乎篇篇皆是。其描绘的技巧，值得借鉴。

辞句不易读懂，反复是此书受到一些人批评的重要因素。但是，当人们反复阅读时，就会慢慢体会到别有滋味，作者对所描述的事物也并非是无感情的“冷漠”态度。仅以《定国公园》为例，即可窥一斑。

文章一开就肯定“定国公园”是北湖边上最早最雅致的花园。然而，现在的景象却给人以凄凉之感：“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匾，柱无联，壁无诗片”。“又一堂临湖，芦苇侵庭除……荒荒如山斋”。

这些描写都饱含了作者对世事沧桑的感叹。特别是对西北部的景物描写，运用对比的手法，给人印象更深：“垂柳高槐，树不数枚，以岁久繁柯，阴遂满院。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涧边，不记在人家圃”。文章的最后一段，又与开头相照映：“园左右多新亭馆。对湖乃寺，万历中，有筑于园侧者，掘得元寺额，曰‘石湖寺’焉”这几句话耐人寻味，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大概就是“其皆隐”吧！

在对园林寺观、陵墓祠宇、名胜古迹、岁时习俗的描述中，作者也有表现欢快情绪的。《水尽头》就是一例。开头一段写竹，就表现了作者的欢欣之情。“燕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这一议论句，就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喜悦。在第二段中，写泉写花写竹，也令人神往。特别是溪流及小鱼，更为可爱：“石罅乱流，众声渐渐，人踏石过，水珠渐衣。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蛩音则伏于苴于沙。”这种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描写，正是作者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证明。

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的象导游解说，把读者带去游览；有的是游记，写出游览时的所见所闻；有的是客观描述，夹一二句议论；有的是讲故事式的写来，如《万松老人塔》曲折起伏，颇有趣味。

《帝京景物略》无论从资料价值还是文学价值来评论，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是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张献忠兵部尚书周文江

段 美 均

周文江，原名维江，字贞卿，顺河集人。生于明代末叶。少读书，中秀才，改名文江。崇祯十六年（1643）春，张献忠率部来麻城，随即东去。县中里民明承祖及奴仆洪楼先等结成“里仁”、“直道”二会，响应张献忠起义。知县陆晋锡调集各乡亲义勇围攻。“里仁”会首汤志至潜山县求助于张献忠。时值张献忠与李自成之战大败，其步卒多降于李自成，只剩步卒七千。张献忠见麻城使至，甚喜，即亲率大军来麻城。汤至派周文江与之策应。四月六日，张献忠部攻破麻城，杀死县丞李体明，教谕肖颂圣。知县陆晋锡逃入朱山寨。张献忠得降兵五万七千，别立一新营，改麻城为长顺州，命周文江为知州。五月五日，张献忠部从团风渡江，进攻武昌。武昌被克，张献忠据楚王府，铸西王之宝，改武昌为天授府，封周文江为兵部尚书。

后来，张献忠见楚师渐集，遂留张其在，谢风洲等守城，其养子四虎驻金沙洲。亲率大营西渡四川。分兵三路：一为白罗山，二为白石矶，三为蒿洲屯。张献忠左营诸将：毛显文、常国安、郎隆贵、于自成、段风翔、秦天禄等连营进发，直抵阳逻堡。官兵吴敏师以所部联络蕲黄四十八寨义

兵数万余人迎战。结果，汉阳城失守，左营大败于鲟鱼套。

其时，驻寿州的凤督马士英，派露山总兵黄鼎来麻城。主事刘侨、县诸生田生兰、周崇极等商议，说周文江以反正。并擒“里仁”擒首汤志以献。数其罪，立斩。黄鼎将汤志首籍着人带往寿州请功。马士英见此，即委黄鼎为麻城知县。同时，周文江亦以厚礼贿马士英，被授招讨使之职，仍归东山义兵。

甲辰乙辨（1644—1645）间，周文江去黄蘗山，仍延用张献忠旗号反清。明隆武二年（1646）五月，周与副将梅增，率部进攻麻城。于塔子山战，战败被俘处死。



古时才女亦多情

江 乐 山

《明诗综》中，选了麻城毛钰龙、董少玉、梅生等女子的诗作。那些诗清新秀丽，表达了纯贞的情思。今天读来，仍不失为难得的佳作。如董少玉的《忆别》云：

忆别河桥柳，青青送马蹄。
妾心与羌笛，无日不辽西。
驿路花将发，离亭柳漫垂。
凭栏无一曲，日日数归期。

少玉是明万历间户部主事周弘祹的妻子。周因上疏指斥朝贵，被谪代州评官，再迁南京，兵部主事。周在外奔波，妻子思念，遂写下此诗。她的诗文亦多，深受王世贞的赞赏。

著名文学家袁宗道对麻城女诗人推崇倍至，为毛钰龙的《毛文贞集》撰写序言。他说：“夫诗不易工，女子工诗尤难。我楚女子工诗，尤难之难者也。”赞扬麻城毛文贞的诗，“鲜秀奇警”“意爽神畅”“绣口锦心”。在此，仅举一诗《镜》为例，即可见一斑：

样出秦宫制，团团宝月回。
虚空开物象，心迹远尘埃。

影覆香罗帕，光生碧玉台。

绣囊鸳鸟并，珍重嫁时裁。

在这种情深意笃的清丽词句面前，袁宗道说：“余楚国男子，且须眉，且官词林，诗文其本业，竟不能工，真可愧也夫！真可愧也夫！”

闰秀梅生的诗，亦明白地写出闺情。如《寄外》云：

落叶满庭阶，秋风吹复起。

遥忆别离人，寂寞何堪此。

还是袁宗道说得好：“绮词藻句多出艳妇之手，如清照漱玉之篇，漱真飞雪之句。”而麻城女之子诗，“犹之艳李不挺苍干，古柏不吐芳萼”，这是另一种风格的佳作。诸如其人，古时山乡才女更多情意。



苏轼与麻城

刘宏

一谈起苏轼漫长的贬谪生涯，湖北人会自然联想到黄州，联想到东坡赤壁，却很少人能想到麻城。其实，苏轼与麻城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乌台诗案”后的元丰三年（1080）五月，苏轼顶着风雪被贬赴黄州。一路上，心情十分沉重。当他途经麻城春风岭时，见岭上簇簇梅花傲寒吐妍，他那颗冰雪盖着的心，忽然感受到了一丝春天的信息，从而受到某种力量的支持和鼓舞，欣然写下了《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灼烁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诗中所写到的“关山”即是麻城通往黄州的虎头、黄土、木陵、白沙、大城五关。苏轼在他一生中写过许多咏梅诗，而这是他在贬谪中咏梅的第一组诗。他本长于以人喻物，这两首诗将自己的精神面貌和遭遇注给麻城春风岭上的梅花，诗人和梅花就合而为一了。

苏轼这次谪赴黄州，在麻城古镇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

苏轼在《歧亭五首引》中回忆说：“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歧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季常也。为留五日……”陈季常与苏轼年龄相仿，思想性格也很相似，是当时隐居黄州的一名隐士，当苏轼谈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陈季常竟“俯而不语，仰而笑。”这表明陈季常对于人生真谛，对于浮生处世的一种大彻大悟。面对陈季常这种傲然自乐，超然飘遥的境界，苏轼感到惭愧，他虽然自幼好老庄，可是他以前却从来没有这样彻悟过。这次当他一头从琼楼玉宇跌到社会下层时，他才仿佛忽然看到了这急流津上的觉迷渡口愧悔自己的冥顽不灵，而发自内心地敬佩陈季常的先知先觉。这次与陈季常在歧亭的巧遇，可以说，对苏轼的人生哲学转向老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他后来写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麻城，歧亭古镇边有当年陈季常与苏轼相送惜别的“东坡桥”；“杏花村”里有苏轼写的《歧亭五首》，还有清代建立的“宋贤祠”及其碑刻。在“杏花村”的古柏森森的林子里，两座坟墓前立着两块石碑：一块为“宋贤陈季常之墓”，一块为“宋贤苏轼之墓”。自然，苏墓为衣冢，它却表现了麻城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文学家的敬意和怀念。



梅之焕与“宝树”的传说

汪海藩

被林业专家认为湖北之最的“麻城柳杉”，当地人过去一直称其为“宝树”。它生长在麻城市木子店镇撞林坳村的辖区之内，实属平斗山乡平斗山村熊家垅组。树高26米，胸径114厘米。在科学不发达的旧社会，人们不知道它的学名，加之麻城大地仅此一棵（很可能鄂东大地解放前也仅此一棵）。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因此人称之为“宝树”。树旁有一座大庙，亦称之为“宝树庙”。

传说“宝树庙”系明代梅之焕所建，“宝树”亦为梅之焕从“外国”引来，亲手栽在这里。不仅如此，梅之焕还在其它各地共建庙宇三百六十座，其用意是，他子孙后代穷了，一个庙上住一天，就可度过一年。一九八〇年春天，笔者在张广河高中任教时，率领学生到河南省商城县的黄柏山去春游。黄柏山有老庙、新庙各一座，至今尚存。解放前有和尚近百人。老庙后有一和尚墓。墓前有一石塔，名“息影塔”，其整体规模之大，工艺之美，我地罕见。当地一位老农向我们介绍说：“此庙为梅之焕所建，‘息影塔’三字亦为梅之焕所题。”据此，梅之焕在各地建庙，可能是真。

“宝树庙”清代已不存在，到民国时，有好事者熊远征

又在原址修一小庙，解放初尚存。现在亦已倒掉。据当地农民说，庙前水田中，尚埋有一口大生铁钟，但未经挖掘，尚不能证实。

按《麻城县志》记载：“梅之焕字彬文，梅国桢（明朝进士，做过兵部右侍郎官，与李贽友好——笔者）的从子。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授内科给事中，历任广东副使，山东学政、太常少卿、甘肃巡府，有‘荆楚英豪’之称”。另据《辞海》（民国二年版）注释，柳杉主要产在四川和鄂西。但麻城这棵柳杉梅之焕究竟从何处引来，尚不可考。不过可以断定，当在1604年以后。他未中进士以前是不会栽此树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姓熊财主曾要砍掉此树，为他母亲做棺木，因遭到当地群众的极力反对，这棵生长和平斗山南麓深谷中、历经近四百个春秋的“宝树”才幸存下来。

一九五八年麻城县人民政府进行文物普查时，对该树发了“保护执照”，此“执照”现存于熊家垅熊心厚之家，自此列为文物保护之内。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五日《黄冈报》以“麻城柳杉”为题登载了此树。报称“……树高26米，胸径114厘米，最近经林业专家鉴定被列为湖北之最”。至此，名不见经传的“宝将”已扬名于世。现在它仍拔地参天，葱葱郁郁，人称为“麻城柳杉”。



峡谷明珠

——三河口水库、电站简介及修建侧记

阳绍江

一、简介

三河口水库，始建于1958年8月。因当时对水情缺乏科学分析，基础处理不牢，1959年2月一场洪水，将大坝全部冲毁。同年11月5日重建大坝，至60年8月14日建成，历时9个月又12天。共完成土方278.3万立方，石方98.8万立方，混凝土2.5万立方。

大坝为粘土心墙代料组合坝型，高55.3米，长261米，集雨面积167.5平方公里。水库正常水位149米；设计500年一遇洪水重现期入库洪峰流量2971秒/立方米，洪水水位154.5米，最大下泄流量1275秒/立方米；校核（非常任用）洪水重现期二千年入库洪峰流量3466秒/立方米，最高洪水水位185.3米，下泄流量1574秒/立方米。总库容1.626亿立方米，属国家大“二型”水库。

隧洞：坝东高水头隧洞，全长145.34米，高水头输出发电。

溢洪道：坝左炸开坚硬岩石，开出弧型堰，堰顶弧长56

米，设挑流鼻坝，渐高到30米，共长283.6米。

干渠：主干渠流经三河、阎河、城关三镇，全长50.35公里，其中石渠18.065公里。在渠道的中段建有二座电站。现有灌溉面积396万亩。受益范围二镇、一办32村。

水产业：库养成鱼面积四千五百亩，鱼苗繁殖场一座，鱼苗池八十亩，自库建成之日起至91年，浮化鱼苗7.3亿尾，最高年达一亿尾，鲜鱼总产量500万斤，每年平均18至20万斤，最高年达28万斤。

水库设有卫生所。管理处共有职工96人。

水电站：建坝后式电站一座，装机 2×1560 千瓦的水轮机组，安装调速调压自动设备，设4000千伏安的主变压器一台，将发出的6300伏电升压到35千伏，送麻城入中南电网，另架一条6300伏电线供近区。设与发电机水管平行的泄洪支管，安装泄洪闸，在洪期可泄洪50秒立方米。电站年发电量按设计721万千瓦/小时，从66年6月20日至91年共发电18980万千瓦小时。创社会效益6.6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33倍。最高年达1140万千瓦/小时，目前在麻城市属最大的电站。

两台机组11个流量的发电尾水进入干渠，在6.7公里处碧绿河电站发电尾水又汇集如此。1975年4月至80年10月在干渠马王河建成二级电站，装机 2×800 千瓦，年发电量458万千瓦小时。1978年2月至82年，又在干渠黄土咀建成三级电站，装机 2×500 千瓦，年发电量264万千瓦小时，形成三河水系，一水多用。

电站现有职工48人。

三河口水库是防洪、发电、灌溉、养鱼、航运、旅游等

综合效益工程，是变水患为水利的幸福库。巍峨大坝选在悬钟岩峡谷。古老的悬钟岩一山飞峙，横锁三条河口，东与花石岩相连，形成百丈峡谷。北面三条河流汇集，有一宽敞平原，周围三十五个村庄，历史上的三河口集镇就在平原之中，是勾通鄂、豫、皖山货集销、生活必需品供应的繁荣要地，是三省通道，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岩峰奇特，陡削高悬，怪石嶙峋，翘首望天，人称“笑天狮”。往昔，峰顶古刹，有僧道十余人，暮鼓晨钟，香烟缭绕，游人络绎不绝，曾吸引着墨客文人观奇吟咏。峡口的西北至东南诸峰林立，从西北的西凤山珠连陈家山、高头山、九歇山、狮子峰、黄柏山、康王康（麻城最高峰）、隘门关、天台山、八成山、银孔山等十大主峰，形成大圆形，是大别山南麓江、淮流域的分水岭。水入东北为淮河流域，水流西南注举水入长江。又是鄂、豫、皖三省的分界线。诸峰西南重峦叠障，沟壑纵横，溪流密布，方圆一百六十余公里，水的自然流向，西凤山至九歇山的西面汇于石门河，九歇山的东面至狮子峰汇流石桥河，黄柏山、隘门关、天台山南汇流于张广河。三条河最长的张广河，从峡口至隘门关的清漪河尾，长达50华里，最短的石桥河，从峡口至仙人洞长达15华里，山高坡陡，水急浪凶，汇入峡口汹涌澎湃，一泄千里，沿河两岸民房、田地遭受严重灾害。据当地老年人记述：“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一场大雨毁坏沿河两岸许多村庄，上万亩田地，有的居民流离失所。一九五四年大雨以后，原三河集镇（区公所所在地）被淹，洪水威胁麻城两岸八个重镇直至新洲县城。水患无情成为人民的灾难。晴上几天又变成干旱。

二、修建经过

1958年麻城县委和政府，为了早日实现麻城“四化”（水利自流灌溉化、机械化、电气化、肥料化学化），决定修建三河口水库和电站，变水患为水利。这一造福于麻城人民的决定得到了全县七十万人民的欢迎拥护。

水库由湖北省水利厅勘测，厅属工程二团设计，坝址选在悬钟岩峡口建造，设坝后式高水头发电站。

河床海拔高程101米（黄海基面，下同）心墙基坑岩面高程93米。河床底宽60米，两侧岩石具属石英岩和花岗片麻岩，坚硬陡削，岩基裸露，石质较好。坝址东有山咀突出河中，厚度为150米，引河道向左弯转，在岩基坚硬岩石中穿隧洞，适宜建高水头发电站，又便于开挖敞式溢洪道。

1958年8月，县里抽调六个区的部分劳力计一万二千人，组建六个兵团，兴工峡谷，大坝破土施工。到59年3月坝埂高出河床三米，但因经验不足，河床基础处理不彻底，对山高水恶的冬季雨量分析不够，确保大坝安全的引河只一米多宽的小沟。2月1日至16日接连降雨138.8毫米，洪水猛涨，人工抢修迎水坡虽达11米高，但因坝长面窄，防不胜防，仅五分钟时间就溃口冲毁，还冲走小船一艘，木材五十立方，被迫停工。

县委当即总结了垮坝教训，查明失败的原因，提高依科学建库的认识，按自然规律重新勘探，将原设计材料移交黄冈地区水利局并会同麻城县水利局，查阅大量水文资料。据记载三河地区多年的年平均降雨量为1400毫米，多集中于五

至八月，特殊年冬季有中等降雨量。于是联系实际修改施工方案，定出主体工程“断面尺寸”。主体工程中2.8米直径圆形隧洞，设在海拔124米处，过水能力56.22秒立方米，进口16米处设圆形调压井一个，检修、工作两道四扇钢板平面闸门控制，四台二十五吨螺旋启闭机为闸门的启闭操作。县委广泛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论证，集技求精华，定施工良策：筑坝、开溢洪道、凿隧洞三项同步进行。大坝主体工程分为五个“战役”，即心墙抽槽，局部回填，截流合拢，大面积回填，扫尾工程。并把开挖溢洪道、凿穿输水隧洞的导流工程，优先作为重点来抓。

1958年11月5日，工程经省、地委批准开工。组建新指挥部，成立中共三河口电站委员会。由麻城县县长陈化民兼任党委书记、指挥长，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长邱慧轩任副书记、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工程科、财器科、调度科。党委会下设：政工科、保卫科、福利科、宣教科，并成立共青团工地委员会。从县直有关单位抽调得力干部任科长、副科长及科、室工作人员。民工由原六个区增调中驿、宋埠、白果、龟山等四个区的劳力。民工组建以区编团、乡为营，生产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班。木子店、张家畈两区人数较少编为独立营。总劳力由原一万二千人增到二万人。团、营、连、排长由指挥部任命注册。11月5日民工到达工地，沉睡的峡谷，到处工棚林立，灯火辉煌，炊烟袅袅，人声沸腾，二万劳动大军为建幸福库在此安营扎寨。6日晚副指挥长邱慧轩召开连以上干部三百二十人的动员大会，指明修库建电站有“蓄洪、防旱、养鱼、发电、航运”等五大好处。将来的发电量可供全县十七万户，每户两盏电灯，蓄洪

可减少举水河洪水威胁的五分之一，库、站造成功在国家，利在人民，千秋大业，惠及子孙后代。他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有力的动员，鼓舞了数百名干部、两万民工，实干、苦干的劳动热情。“向大自然宣战”、“振臂一呼钢铁志，同心拼搏锁狂龙”等表决心、抒壮志的巨幅标语竖立在工地上。中共三河电站委员会、三河电站指挥部编印的简报《三河电站》创刊号登诗一首，题为“锁龙”，诗云：“三河电站建成功，一把锁住三条龙，天干引出龙行水，天雨将龙锁笼中，高唱一支锁龙曲，举水两岸年永丰”。

三年自然灾害，麻城遭受夏末秋初的大旱，田禾枯萎，农业减产，人民食不饱腹，同时苏联当时又背信弃义，在如此艰难岁月，要完成如此浩大工程，对当时的领导和人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然而，共产党人是中流砥柱，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指挥长到每个干部都与民工同住工棚，吃食堂饭，以身作责，带领二万民工艰苦奋斗，按时完成各项施工任务。大坝核心墙抽槽，是全部工程第一战役，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基础工程。在海拔101米河床中抽下六米深。因河沙淤积，底水渗透量大，要抽下六十一米宽，六十米长，任务艰巨。按计算在11月9日至12月9日必须完成，仅30天的时间，要从河床底捞起8800多立方沙土。架设九台抽水机，排出渍水，每坏一台，水渍腰深，人多用不上，就组织突击队轮班施工。开工第一天就天不作美，北风凛烈，地结坚冰、雪雨不停。但“天虽冷人心热如火，地结冰意志坚如钢”，施工不停。陈化民、邱慧轩、李宗孝等领导日日夜夜坚持在抽槽工地施工。据《三河电站》简报载：“邱慧

轩浑身是泥，像个泥人”。11月9日深夜11点钟，风寒刺骨，地结薄冰，抽水机坏了两台，基坑溃水深四尺，在此危急时刻，保卫科长带领政工干部不畏艰险跳下水中，排除了故障，三河民工团一百多突击队员深受感动，一齐跳入水中，邱慧轩带领的施工技术员一同跳入水中作业，起岸时双腿冻裂流血，他们回答：“只要心是热的，冰山也要把它溶化”。施工的艰难，得到上级的关怀，11月14日省水利厅副厅长漆少川、县委书记吴德简亲临工地检查，察看了抽槽行动和隧洞、引河的开凿，提出了处理方案。11月27日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秘书长白林由吴德简陪同到工地检查抽槽质量，并同民工一起推车运土劳动，每车都在三百斤以上。领导带头干，民工劲更足，民工们作歌以颂云：“首长劳动在工地，浑身干劲加十倍，三步把做两步走，两车合做一车推”。姜一书记对关心群众生活、工具改革、减轻民工负担等方面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2月4日是抽槽的关键时刻，能否保证全部工程顺利进行，完成抽槽任务是第一关。气候酷冷，民工情绪有些低落，吴德简、陈化民带领工地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三尺多深冷水中劳动，一干就是五个多小时，白果兵团一百多名突击队员整上午不换班，领导催促换班，仍然坚持大干。千余名抽槽勇士与领导同心协力，顶风雪，下深水，战严寒，创造了惊人的工效，提前三天完成了抽槽任务，见到了河底十一级花岗岩，人人心花怒放，创造了水利工程少有的记录。

心墙回填，第二战役擂响战鼓，农历年前大坝要完成15米高的任务，一切要跑在洪水前面。身患严重感冒的指挥长和副指挥长，带领干部坚持劳动，心墙由他倒下第一车土，

随着万军齐发，竞赛热潮席卷工地。12月22日麻城县委、人委慰问团带领县剧团和慰问品，来工地慰问。来后先劳动三天，然后深入各工棚联欢。他们新编了《游三河》等十多个新节目在工地演出。60年元月18日麻城汉剧团来工地慰问演出。60年4月初，降雨一百多公厘，河水猛涨，工地进入战洪抢险保大坝的紧张阶段。重要时刻中共黄冈地委派副专员蔡璋到工地协助指挥。蔡于4月13日召开工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连以上干部共八百多人的骨干会议，动员拚搏苦战、改革工具，提高工效，战胜洪峰，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援。5月12日大坝已高出水面8米。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关心水库安危，由省长张体学率领黄冈地委书记处书记廉希圣，专员田裕如，秘书长刘天明，在麻城县委书记赵金良陪同下，于5月13日11时到达工地视察，认真检查了工程各施工部位，关心询问有什么困难。对于运土车子化，上坝牵引化，大坝进度高程，各枢纽工程部位设置非常满意。但见从十公里处运粘土，靠人力车有困难，民工体力消耗大，时间长受不了等情况，提出要想办法解决机动车。当天到悬钟岩下，田专员问张省长：“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张省长微笑地回答：“记得，这是我过去打游的地方吗。”望了望悬钟岩，对大家说：“我过去打游击从岩下过，抬头望上面的石头象要滚下来似的，不少同志害怕石头滚下来打着头，现在的悬钟岩也不悬了。”田专员回答：“这是人民的力量，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人作了大自然的主人。”张省长问一名突击队员：“你修水库有这么大的干劲？”突击队员回答：“用我们勤劳勇敢的手来打扮祖国的河山。”张省长乐的大笑，“干得好！”当天午饭未吃

回到麻城打电话，从省直四队、丹江口调二十辆汽车支援工地。田专员将行署四十一人的文工团，由梅水先带队调工地慰问演出、劳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支援，促进了“红五月”的工程胜利，5月30日大坝心墙高程达35米，逆水坡高达36米，背水坡高达34米。完成了70多万土方，战胜了洪水。8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团一行五人，由湖北省水利厅机械工程局局长刘秉瑞陪同到工地检查安全生产和大坝质量。他们深入到三河民工团各工棚、食堂调查访问，到工地医院看望因工受伤的病人。

灾年粮缺，关心群众生活是指挥者的头等大事，由一名副指挥长专管生活。各团、营组织管生活的班子。59年11月7日，指挥长深入各工棚检查，对工棚的防寒防雨，通风透光、清洁卫生作具体安排。总结推广福田河指挥所的工棚标准和食堂种菜189厢（合四亩），养肥猪三头，保证每人每天三斤鲜菜的经验，保民工吃好、住好、劳动好。

1960年元旦，麻城县委、人委调鲜鱼一万斤，通知各人民公社送来大量食品慰问民工。60年2月12日工地雨雪纷飞，气温下降零度以下，陈化民、邱慧轩、文教部长阎垣才，副指挥长李宗孝等带领指挥部组织、保卫干部，深入各工棚查看民工生活，对条件不好的，生活差的问题，就地解决。在困难的情况下，从县调来80万斤大米，2万元钱，解善民工生活。规定每百人的食堂，抽一至二人种菜，百人一亩菜，确保鲜菜供应。组织有猎捕能力的民工上山打猎，下河捞鱼解善生活。组织以生活福利团长为主的营连会计、医生、保健员、卫生员、洗衣员共五百人的生活服务队伍，确保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为办好工地医院，从县卫生部门抽调

40名有实践经验的医生和一批医务人员，坚持工地防病治病工作，对工伤事故伤残手术就地解决。59年12月中旬，工地普遍患流行性感胃和因流感引起的肺炎，指挥长日夜巡视在工棚，加固工棚防冻，垫高床铺防潮，群防群治，迅速制止了病情发展。60年2月中旬，工地民工发生干瘦病，浮肿病达847人，陈县长从县调芝麻4000斤，蜂蜜1500斤，黄胆3700斤，红糖3000斤，做药饼46500个，分发民工食用。经数天后除46人入院治疗外，其余逐渐康复。为了防寒，县调棉衣500套，卫生衣裤1300件发给衣被单薄的民工。工伤事故一直受到上级重视，保卫措施得力，伤亡较小。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劳动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当时的水库工地，三里工区，两万大军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感召下，立下志愿，“不怕困难大，不修好水库不回家！”豪情满怀，劳动竞赛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为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的明天，争时间，争速度，争质量，争第一。劳动者作歌抒情说：“祖国像东方巨龙，飞跃在万里长空，毛主席像金色太阳，照亮了祖国锦绣前程，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领袖毛泽东。”（《三河电站》25期）“五更起半夜眠，不辞苦不偷闲，鼓干劲冒风寒，个人问题靠一边，为了电站早修好，学习红军过雪山。”（《电站之音》）劳动竞赛贯彻始终。从集体到个人展开对手赛，以古今英雄命名的突击队，遍布工地。竞赛推动工程进度日新月异，出现了“十八岁姑娘赛健男”，“娃娃赛过成年人”，“兄妹对手赛”，“姑娘赛情人”，“三女大战引河口”等许多动人事迹。工程自始至终贯穿技术革新，实现运土车子化。第一阶段是59年11月13日，推广宋埠营人人学木匠，组

织二十多个木工组，十多天完成独轮车千辆的经验。第二阶段推广木质双轮大板车，第三阶段是1960年4月上旬推广胶轮板车。改革标兵闵泽全自己出钱出木材十天完成700部，除自用外还支援其他单位。在革新运动中培养了五百名干部，2280名民工能装修板车。通过改革，实现了运土车子化，取土爆破化，上坝牵引化，夯实碾压化。奋战九个多月大坝按设计完成，隧洞、溢洪道亦相继完成。共完成土、石方82万余立方。在民工评比中，评出男、女标兵151人，劳动模范1219人，先进单位88个，有251人光荣加入了共产党，412名优秀青年加入了共青团，还有9人为建电站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宣传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走进峡谷工区，广播声、歌声在山谷回荡，到处悬挂着“奔向社会主义、建设锦绣河山！”、“不怕困难大，不修好三河电站不回家！”的大幅横幅。举持日常宣传工作的梅基葵（现湖北省剧协成员、麻城市政协委员）、余敏文（现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周光森（现市工会主席）、陈道信（农民诗人）等主办《三河电站》双日刊小报、工地广播站，编写了《英雄传》介绍十位英雄的事迹；《三河电站之音》（诗刊本）、《工地歌声》（演唱本）图文并茂。大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党群关系，国际时事，民工的英模事迹。发动群众创作诗168首，歌76曲，鼓词27篇，画52幅。字里行间刻画着劳动者的光辉形象，领导者的韬略运筹，干群的鱼水关系，工程的日新月异，鼓舞着建库者们的顽强拼搏意志。

三河口电站，受到国家重视，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来麻城视察，亲笔书写“麻城县三河口电站”八个大字，悬挂在厂房楼顶。大坝竣工后，电站继续施工。

1962年9月14日成立中国共产党麻城县三河口电站总支委员会，三河口电站管理处。由邱慧轩任总支书记兼处长，负责电站建设，渠道开挖以及煞尾工程。66年8月20日安装完成，开机发电。到现在形成一水三级发电，包括碧绿河电站，整个三河水系四个发电站，总装机十台，发电七千千瓦小时，成为麻城目前最大的发电系统，通过26.5公里的高压线路，输送到麻城各地。

水库主渠道于1960年11月开挖，于66年10月竣工，全渠50余公里，工程复杂。从三河口电站尾水流经三河口镇董家河，穿万寿集，过马王河、刘家河，下黄土咀入阎河镇鸟雀林，进古楼办事处的乌泥墩，下七里岗入红石咀通举水。灌溉二镇一办三十二个村的农田，使396万亩田地，旱涝保收。沿渠建筑渡槽六座，长642米，最长的刘家河渡槽达342米。隧洞4个，总长1029.6米，最长的万寿集隧洞达724米。为开通万寿集隧洞，调解放军8191部队一个排支援三个月。涵洞16个，人行桥98座，排水闸11个。

三、现状

三十年来在水库、电站管理处的领导下，带领一百多名职工，顶风沐日完成各项煞尾工程，建设管理处楼房数座，蓄林美化河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水库管理处的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对大坝心墙探测灌浆加固，背水坡披上茸茸绿草，坡面修建了261米长，0.4米高，0.6米宽的截流沟三条，总长近八百米。扩建溢洪道，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灌铺底，加固安全系数。1991年6月30日20时至7月11日时，

连降大雨计4037.6公厘，这次降雨过程，暴雨强度属二百年一遇。十天库中来水总量达13866万立方米，比建库30年中的25年各年来水总量多0.1%至483%，7月9日12时溢洪道堰顶过水堰3.96米，下泄流量高达824秒立方米。6月30日20时至最大洪峰入库历时7月9日8时，共拦截洪量10084万立方米，同时下泄水量仅5852万立方米，省入库水量的53%，水库调蓄了47%的洪水量4682万立方米，其中吞洪222万立方米，滞洪1800万立方米，削减洪峰36%，控洪六天，显示了水库的防洪能力，减轻了下游的水涝灾害。水库的美化工程日臻完善，大坝左右两边各设花岗岩条石梯形踏步各三百余级，供行人踏步止至坝顶，左端建有美观清爽的防汛楼，右端建有高耸雅丽的三层大楼一栋，供存鲜鱼库。坝的右端悬钟岩下，随着梯形踏步依岩建设“妙哉”洞，特有的碧水“石泉井”，“小憩亭”，“蘑菇亭”供人游览小憩。

管理处钢筋混凝土楼房林立，河旁清水涟漪，多年来引入栽植的迎春花、腊梅、丹桂、广玉兰、红玉兰、枇杷果、罗汉果四季香花簇簇，清香扑鼻，沁人心肺。遍植垂柳、香樟、水杉、落叶杉、大榆树，柳丝摇曳，绿树荫浓，春秋景色迷人。后山建造桃园、柑桔园、梨园、翠竹坡，情趣盎然。昔日阴森峡谷，今为明媚百花园。在生产建设上，近年不断创新，除鱼苗繁殖、精养鱼苗外，还试养桂鱼、大蟹。还因地制宜建有菌类生产场，种植香菇、猴头菇、金针菇、黑白木耳。办起了鱼类加工厂，不断提高以库养库的经济收入。

今日的悬钟岩，奇峰挺拔，碧波拥抱，风景更加秀丽，与它比邻的狮子岩（又名鹰嘴岩）相争媲美。鳞鬣石咀伸向

河畔，瞰视波涛鱼跃，登悬钟岩峰顶，极目所望，诸峰竞秀，山色苍茫，渔舟飞渡，货运帆樯如梭，锦鳞翔集，推波逐浪，劳动人民推进的历史，高峡出平湖。光辉的电站，银线绕山峦，串串明珠缀峡谷，巍巍大坝锁狂龙。山中松、栎、红枫复盖，绿装重裹。库区两岸栽培松、杉、茶、竹成林映染碧波粼粼，春至山花烂漫，水透桃红。夏来云雾缭绕，水天连络，辉映长虹。秋临气爽清和，满山红叶，层林尽染，“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寒冬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托今思昔，河山巨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劳动大军挥洒汗水浇成，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谱写的壮丽凯歌。

四、附录

因为三河水库和电站的修建，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党和政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现选录民主人士、原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吴伯厚先生的歌颂这一壮举的诗二首以作纪念，以期尽可能地让人们窥见当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建设成果。

一、颂三河电站工程

麻城人民威风抖，	劈山炸石空运土。
移山塞住三河口，	工程浩大不辞劳，
党委挂帅亲指挥，	雨雪风霜不摆手。
万众一心跟党走，	干劲冲天金石开，
决心要把地球修，	龙王驯服河俯首。
造海并非夸海口，	顿教深谷变潮海，

筑库英雄红又专，
河流斩断山削平，
山头机船来往走，
大坝高接悬钟岩，
耸入云端墙样陡，
发电抗旱兼防洪，
件件它将显身手，
生产发展生活高，
以后年年称富有，
共产主义幸福多，

千年恶水成乌有。
英雄事迹说不完，
英雄人物不胜数。
有了党和毛主席，
空前奇迹才能有。
库深不及党恩深，
恩情常在三河口。
三河电站建成功，
七十万人民齐握手。
伟大功勋垂永久。

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

二、颂三河电站横河大坝

大坝好，大坝高，大坝顶上红旗飘。
大坝身体多魁伟，大坝气势赛英豪。
它吃掉了几座山，它斩断了三河腰。
它造成了巨大的潮海，
它拉住了三河的浪潮。
它要把自然征服，
它要叫天空听调，
它要变害水为良田，
它要把地球修补得更好。
它要建起伟大的三河电站，
它要发电抗旱防涝。
它要和四海龙王比武，

它要和悬钟岩比高。
 它要为发展生产服务，
 它要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效劳。
 它是四化的尖兵，
 它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桥。
 通过它锻炼出许多英雄和好汉，
 通过它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英豪。
 它是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的产物，
 它是党不断壮大和提高，
 它永远保持党的光荣，
 它永远听党的话立下不朽的功劳。

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

1992年10月6日，市政协文史委负责人来水库定稿。翌日，笔者同他登上悬钟岩顶，俯瞰库区全景。因笔者是三河口水库修建时的参与者，如今仍在三河镇工作。面对锦绣河山，面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抚今忆昔，感慨万千，即在岩顶口占七律一首。笔者不避“蛇足”之嫌，录于文尾，以示文之始终，亦示做人的始终。

悬钟岩即景 七律

1992年10月7日晨同范志斌同志登悬钟岩顶峰即兴

雾绕悬钟紫气浓，	云横东岭映长虹。
平湖浪拍溶岩暖，	舟揖扬帆借好风。
千载洪灾今已灭，	万民筑坝锁狂龙。
山川粉黛妖娆美，	人世沧桑话楚雄。

在龟山区斗争的岁月

贾本德 何 钧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一、二、三、六纵队12万兵力挺进大别山，8月28日进入麻城境内，10月中旬，麻东、麻西县政府和龟山区政府相继成立。

是时国共两党在大别山区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本文略述麻东龟山区斗争情况。

榔 树 山 事 变

1947年11月发生“麻东暴乱”。事件发生的次日上午，国民党方面由鲍义甫纠集一个保长和部分兵力把中共龟山区委书记高平带领的一个工作组诱入榔树山乘机包围，工作组和敌方激战到天黑才冲出重围。同时敌方官家甄的官老八绑架一个解放军干部送国民党麻城县政府邀功，切断我方的联络。为了聚蓄力量，我方张剑石县长把全区干部集中，连夜撤退到麻东县委驻地，才免遭更大的损失。榔树山事变中我方有解放军战士裴成太、肖峰二人负伤，高飞、刘绍华二人被俘。宋埠解放后刘绍华被营救归队。

望 家 龙 惨 案

民国36年腊月23日（公元1947年2月2日）解放军工作

队在杨家铺对面一个小村——望家垄召开贫农团干部会议，研究群众过春节的各项安排，消息不密，被敌方侦知。吃午饭时山顶上枪声大作，对面山上也响枪了，工作队被包围，情况突变，形势危急。李凤翔区长沉着地动员组织群众撤退，群众未经历战斗，一听枪响大都慌了，二、三十人一时无主见。贫农团长何明台对工作队的同志们说：“你们是北方人快先撤，我们老百姓不怕，不要管我们”。

工作队秘书贾本德说：“不，你们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是贫农团的干部，是地主老财的死对头，你们被捉去一样要杀头的。”

不管怎么劝，他们还是坚持要同工作队一起突围。工作队只有三、四条长枪，两条短枪，李区长冲在前面，通讯员高兴正紧跟，李国华第三，贾本德断后。四条枪轮流掩护群众，边打边撤，突出重围。贫农团副团长何明阁当场牺牲，何明台等二、三十个贫农干部被捕入狱，受到严刑拷打。后经多方营救，交款后大部释放，只有正副团长两名主要骨干不放，被敌带走。后来团长何明台、副团长何佑齐均死于敌湖南耒阳狱中。

洗劫李家楼

望家楼惨案的次日，工作队贾本德、刘绍华二人到声家河村去慰问贫农团干部家属。刚走到李家楼，村长抱柴生火为他们取暖。山上一老人喊声：“来了！”贾、刘二人外撤，刚到门口就见到百步外有几个敌人。他们机警地躲过枪弹冲到屋后，跃过小溪，向山上撤退，居高临下抵抗敌人。

原来在后面山上喊“来了”的老人是为贾、刘放哨的。见贾、刘进村后就上山侦察为工作队放哨，被敌人发觉，不顾个人安危，来不及回村报告就大喊：“来了！”这才救了二人的性命。敌人没有捉到工作队就拿乡亲出气，李家楼遭到洗劫。群众财物被劫洗一空，杀猪二头，牵走耕牛二头，农家床上的被褥衣物凡能抢走的均被抢劫而去。

除掉“家神”

俗话说“没有家神，不能引外鬼”。龟山区斗争激烈的原因就是政权尚不巩固，反动势力没有肃清，国民党的保长便是这种反动势力的代表。原二保保长熊××便是一个最坏的“家神”。当刘邓大军南下工作队刚进山后，他伪装积极出面联系维持秩序，榔树山事变后他就撕掉伪装面具，利用居住山下的有利条件，侦察我军情报向敌方通风报信，是我军开展工作的一大障碍。

熊保长还有一个弟弟在国民党自卫队当班长，敌军每次进山，都是他兄弟俩配合，为虎作伥，行踪诡密，一时很难摸清他的行动规律。很伤脑筋。

一天上午卢家河村贫农团报告熊保长从麻城回来了，可能就躲在家中。当时区干部都到县委那儿去整风，只留下一人坚持斗争。如派区队干部去捉容易打草惊蛇，而派个别战士去捉又因无经验不能完成任务，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就更难捉了。

贾本德勒上腰围，戴顶破草帽，直奔游荡山脚下。熊保长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贾本德化装成农民模样，走到跟前时

熊保长才看清面目，明白贾是前来捉拿他的，二话未说，老实跟他上路了。刚走到西南边的冲口碰见一个诡密的陌生大汉从冲里出来，这时贾本德也很紧张，怕落入敌人的埋伏，命陌生人同去。陌生人见贾的手枪对准熊保长的后心，也很听话，一直低头向铺头坳走。将二人押至铺头坳后才知道陌生人是熊保长的一个弟弟，也是给敌人刺探情报的。当夜即将他兄弟二人枪毙。

两天后胡家山村干部深夜来报告，胡××从白果回来刺探情报。天刚亮就派人去捉拿归案，就地处决。

除掉了一些“家神”，去了敌人耳目，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一时敌人的骚乱有所收敛。

周家岗镇反

1947年冬我军攻克宋埠镇，麻城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南下工作队借此有利时机开展大清剿，在龟山区捉到了几十个行踪诡密的人。县委任爱生在麻东反革命事变后提左的口号：“敌人杀我一个，我杀他十个”。龟山区干部主张多杀以雪心头之恨。张剑石县长是一个水平较高的稳健老干部，力排众议，主张群众要杀的30人由县长审查批准，最后只杀5人。后来县委书记追查责任，撤了张剑石县长职务，降职为普通工作队员。后来的实践证明在县委左的思想指导下，错开杀戒，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给我党坚持长期斗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吃了不少苦头。

桐子园突围

1948年3月麻城之敌又开始向龟山区扫荡，敌人进到周

家岗后，南下工作队才从铺头坳上胡家山，打算转移到四望山去活动。县委提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要求就地坚持斗争的策略，到胡家山后听说卢家河也发现了敌情，又考虑到四望山是敌鲍仕群的老巢，没有群众基础，到那儿去是一种冒险行为，故从胡家山搬到桐子园，搬到东河区的羊角埫去侦察敌情并再作详谈。工作队到桐子园还没有10分钟就发现两个化装挑柴的侦探，经过审讯，一人为广西佬，一人为东八查的逃亡地主。从他口中得悉国民党一个正规营驻南太村，从麻城出发经曲集进山。情况紧急，吴家岗必须立即撤出桐子园。

区委书记立即烧文件，区长和老和尚谈话，了解突围的路线。贾本德和老战士商量处理敌两个侦探的办法。老和尚带路于入夜后摸黑从山后羊肠小道经过三小时后终于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安全到达羊角埫。至于那两个侦探，在出桐子园时先杀东八查的那个逃亡地主，第二天在羊角埫杀死那个广西侦探。敌人捉住我工作队员卢仕平的母亲胡成荣，被敌龟山区长胡武枪杀。胡成荣送子参军，她以讨米身份经常搜集敌方情报，是南下工作队最敏感的耳目。她的死是工作队的一大损失。

周家岗遇敌

1948年春，一日上午南下工作队外出活动，至吴家岗山上，区长李凤翔说：“今天很平静，三分钟内不会有战斗”。话很幽默。话音刚落，在前面放哨的朱班长跑来报告：“山下发现敌人”。区长和几位干部到前面一看，果然见敌人象

一条长蛇一样就地休息，蛇头在山脚下，蛇尾在官家塄下边。看样子是一支自卫中队来打南下工作队的。敌人骄傲麻痹，休息又不择地形，战斗力是不会强的。工作队如埋伏在敌人前进的山腰，集中火力可以狠狠地揍他一顿，由于工作队指挥失误，失去战机，让其跑掉了。

李家河遭遇战

1948年春工作队在段家畷吃完中饭往李家河方向前进，在一个塔形山脚下，刚走完四分之一向左转时与敌人遭遇。敌人估计工作队在段家畷休息而未上路，他们找上来打仗但也无战斗准备。“狭路相逢勇者胜”，工作队发现敌人就高喊：“打敌人，打！”。前面的机枪手把机枪一架就打。敌人慌了，转头就跑，工作队急忙上山，朝下看，敌人离我们很近，只几步远，因为是自卫队，战斗力很差，几颗手榴弹就把他们打散了，后又纠集争夺山头。同时周家岗那边枪声大作，正和工作队争夺山头的敌人一听那边打响立即撤退，工作队也撤退了，双方情况不明。

工作队撤到段家畷往铺头坳去的路上。周家岗方面的枪声也停止了。工作队准备进龟山，铺头坳来说解放军主力部队来了。

敌人是麻城自卫队到麻东掩护地主搬家的，转到官家塄听说工作队在段家畷活动，就想以众击寡进行围歼。工作队和他们打响后恰好解放军一支主力部队从白果方向赶到敌人背后。这是一次奇遇战，若不是恰巧碰上解放军主力，工作队一定要遭受损失。解放军主力给工作队解了围，还把敌人

从山里搬来的东西全部缴获。战斗中工作队牺牲了一位战士，李家河人，原是理发的，可惜姓名忘记了。

× × ×

1948年下半年大别山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龟山区南下工作队和全县地方干部编成大工作队随军区和军分区主力军在鄂东各县开展工作。

刘邓大军南下工作在龟山区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斗争，把血汗洒在龟山土地上，为全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本文由贾本德供稿，何钧整理，编者作了文字修饰)



我在麻城“县委高产办公室”

工作期间的见闻

缪 洁

《麻城文史资料》第三集，发表了《天下第一田与亩产三万六》的文章，阅后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事物变化过程都有因果关系，现将我在麻城“县委高产办公室”工作期间的一些见闻，回忆整理于后，作为对上文的补充，对“存史借鉴”大概不无裨益。

1958年麻城县委临时成立了一个“县委高产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副书记赵金良兼任。抽调柳蔚、熊德卿、姜文芳和我为办公室工作人员。此后的一段时间，使我与“高产”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7年，麻城的工作的确取得很大成绩，全县皮棉亩产过百斤，成为全国棉花生产的先进典型。是年秋《人民日报》除在头版头条发表消息外，还发表了《向麻城人民学习，向麻城人民看齐》的专题社论，从此，麻城扬名了，全国各地来麻城参观、学习的代表团络绎不绝。

1958年5月初，党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正确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经国

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随后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58年5月下旬，湖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出现了襄阳小麦亩产五千多斤，谷城油菜亩产一千多斤的两颗高额丰产卫星。这两颗卫星一出台，给麻城的压力很大。当时参加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麻城县委副书记赵金良，虽然狠着心上报麻城小麦亩产五百斤的成绩（实际全县小麦亩产不到二百七十斤），但得不到省、地两级领导的赞扬，个别领导还批评麻城“背着先进包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会议结束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和黄冈地委书记，分别找赵金良说：“全国学麻城，麻城怎么办？这是省、地委给你们出的一个题目，回去后，你们县委要认真讨论一下，麻城究竟怎样跟上目前的大跃进形势？”省委一位秘书长还补充说：“你们麻城县委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只有敢字当头，敢想、敢说、敢干的人，才能不断革命，继续前进。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嘛！”

赵金良同志回县后，为了落实省、地委指示精神，经县委集体研究，决定成立“中共麻城县委高产办公室”，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抽调到办公室来的。办公室一成立，赵金良就给我们传达了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地委对麻城工作的上述指示。同时，赵书记还给我们传达了麻城县委对高产办公室成立后的工作意见，还具体地对我们说：“在夏收的高产上，只能尽量去发现，不要多花精力，你们工作的着重点要放在水稻上，力争早稻的第一颗高产卫星从麻城升起。”

六月中旬的一天，城关区委书记（当时城关指导组长，

后称五四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何志善对我说：“昨天我陪同赵书记一路到闵集六大队青年试验组找组长邹公发座谈，发现他们试验组2.1亩油菜高产试验，亩产达到1123.12斤，超过了谷城的高产卫星，你们办公室的同志赶快去总结一下。”接着，赵金良同志找我，要我写邹公发油菜卫星的消息送湖北日报。

当天夜晚，我们办公室的同志找到邹公发，请他详细介绍了油菜高产的“经验”。从邹公发的介绍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这是个假典型。材料怎么写呢？按假的“经验”写吗？是自欺欺人，其心不忍；按真实情况写吗？领导不会答应，还会扣上个右倾保守的帽子。办公室的同志通过认真商讨后决定：“用文学形式写好，因小说可以塑造，适用于这个真真假假的典型。所谓真的，人物是真的；所谓假的，产量是假的。”最后，大家决定这个材料由我执笔，题目是“一场生动的对台戏”。后来，这篇小说形式的材料，刊登在当年《长江文艺》上。

六月底，赵金良召集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开会，商讨两个问题：一是调查摸底早稻高产典型，作好发射早稻高产卫星的准备；二是破除迷信，用敢字当头的革命精神，提早第二季稻插秧期，确保第二季稻高产。会议结束后，办公室的同志一方面分途与各督导组联系、调查了解早稻高产卫星，并通知各督导组党委，一经发现高产卫星，要即时向县委报喜。另一方面，由姜文芳同志领头，考虑如何提早第二季稻插秧期，确保第二季稻高产（因姜文芳同志是从农业局抽到高产办公室来的农业技术干部）。

直到七月中旬，全县各督导组还没有报来一个早稻高产

卫星，县委副书记赵金良急得睡不着觉，批评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不负责任”、“工作飘浮”等等。正当赵书记心急火燎的时候，麻城县妇联主任甘智明来办公室找赵书记报喜，她说：闵集六大队五小队妇女队长吴立荣0.54亩早稻试验田，通过测算，亩产可以达到六千多斤，并要求县委派员前去验收。赵书记听了甘智明的喜报，如获至宝，即时组织县委书记吴德简，副书记李克成、侯尚武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前去验收。于是在《湖北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就出现了一个醒目的套红标题“第一颗早稻卫星上天”。这颗早稻高产卫星的出现，算了却了县委要使第一颗早稻卫星从麻城升起夙愿。

第一颗早稻卫星上天了，县委领导和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算是松了一口气，谁知没过几天，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发出的水稻高产卫星比我们的又大又高，他们的一块水稻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麻城县委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几位书记的笑脸顿时消失了，人人的额顶上又增添了几道皱纹。

究竟如何提早第二季稻的插秧期？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要提早第二季稻的插秧时间，必须首先提早早稻的收获时间，不然的话，早稻田退不出来，第二季稻当然插不下去。从六月底至七月上旬，近十来天，难住了被人们称为水稻专家的姜文芳同志，老姜几乎每天要受到赵金良书记的批评。一天，赵书记同办公室的同志一块在田间劳动时，发现社员在快要成熟的早稻田里起沟晒田，受到启发，他提出将王家垅至查家院子路两旁的两个四斗丘的早稻用起沟撮秧的方法，合并到一个四斗丘去，以提早另一个四斗丘第二季稻的插秧

期，要办公室的同志讨论决定。姜文芳同志认为早稻已开始抹黄籽，快要成熟，掇来的谷稞，只要不堵塞大行的通风透光，可以试试，不过掇一个四斗丘谷稞，又要认认真真地排在另一个四斗丘谷稞的小行里栽种着，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劳力在一、两天内能够完成的。为了抢住时间，县委决定调用县一中两百多名学生协助劳动。于七月十日左右，仅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上述任务。

七月下旬初，正当早稻进入全面收获的时候，县委在掇秧现场召开了全县各指导组分管农业的组长会议。这时，那个合二而一的早稻田，黄澄澄的谷穗，一派高产丰收景象，另一块早稻掇走插上二季秧的四斗丘，秧苗油绿，已经开始分孽封行。有位省委副书记带着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忙着在现场拍制新闻纪录片，那位省委副书记的手扬得特别高，嘴里不断地夸讲道：“掇秧的办法好、掇秧的办法好！”

县召开的指导组农业副组长会结束后。白果指导组副组长王乾成独出心裁，在建国一社的河北垵，将已经可以收获的十多亩早稻，仿效掇秧的办法全部搬到一块1.016亩的田里紧紧地堆放着，上报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就是后来震撼中外的所谓“天下第一田”。

《人民日报》于58年8月13日，在头版头条报导了“三万六”。从此，浮夸风在麻城越吹越大，诸如明山乡妇女主任姜延怀田产稻谷十多万斤！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游弟波在黄市伙同当地干部办的棉花试验，亩产皮棉一千多斤！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李书庆在三星乡与当地干部办的芝麻试验，亩产芝麻一万多斤！……等等。

六十年来麻城县教育史简略纪要

(1903——1963)

吴伯厚

(一) 解放前:

① 满清皇朝统治时期:

麻城县自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起，将城南亭州试院（考棚）改建，兴办了麻城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堂长屈开诞、字子厚，宋埠人。系清末廪生，是追随康梁一派的人物。另外还有监学二人，教职员若干人。监学和教员俱系当时县里有几步科甲功名的人士。如翰林、进士、举人、秀才、优贡、拔贡、廪生之类。（注一）还有些是在日本留学回来的新型人物。大胆的他们，开始剪去了辫子，还宣传放足。听说董老必武曾在这里任过一个时期的教员。后因他另有高就，便离开了麻城。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屈开诞调至宋埠高等小学，堂长便由周维楨、闵豸、王昌祺等人相继充任。

学生名额规定为一百人，四年毕业。第一届毕业后，再招第二届。没有女生，也没有女教员，学生年龄大多数在二十岁左右，甚至有很多人是结了婚、做了父亲的。他们来自

麻城县的东南西北中五方面地区。大部分出身于官绅、地富、资本家的家庭。贫寒子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是在官墙外望的。学生们进到学堂，就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唯有读书高的气焰，便赫赫一时。他们脱去旧的兰衫，穿着金边袖口，盘着如意勾的操衣，足登黑色马靴，头带东洋帽子，俨然是一个读洋书，住洋学堂的洋学生，洋秀才了。他们走到街上，路人都是侧目而视，不敢触犯他们。他们在操场上唱着：“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和什么“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学堂无地方。”等等的歌子。雄纠纠地自命为将是一个劳心者治人的角色。

他们上堂是没有固定课本的。一般都是携着定制的笔记本在堂上抄写教员各自编写的教材。学习的科目是：经学、史学、地理、论理、算术、英文、理化、图画、音乐、体操等。内中以经、史、文、算为主要，地、论、英、化为次要，体、音、画又其次也。学堂里面是没有图书仪器室和阅览室等一类活动场所的，下了课堂就到自习室自习。自习室和寝室都是以地区关系或亲好关系自由结合住在一室的。乡界关系甚严，往往因利害冲突，互争雄长而相互斗殴的。甚至某同乡的教员也卷入旋涡，成为学生集团的靠山。

当时学生都是吃包饭，厨工多少，由厨司定，计饭价，不计人数，民国以后才改为按人按餐或按月计算。

自县城开办官立的高等小学堂以后，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县城又成立初等小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又成立东西南北四所乡高等小学。1910年（宣统二年）又把四乡高等小学合并。仅办县城考棚的高等小学一所。学生仍为一百人，同时在县城又成立了女子初级小学，还一度开办师范

传习所。此外在四乡还有些私立初级小学、旋办旋停，每校三、五十人不等。其余还有宣讲和简易识字学塾等也可谓盛极一时。

清政府的统治者和一般士大夫阶级认为这样改变学制，开办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是他们的忠实服务者。从而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皇帝的政权，因为自鸦片战争以后，夜郎自大的满清政府已感到西洋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太大。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又感到东洋崛起的日本咄咄逼人。他们认为日本的兴起，是明治维新的缘故。古老的中国，长期顽固守旧，闭关自守，是行不通的。于是便废科举，办学堂，并大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希望这些人学到一套新的本领，回来开花结果，大办学堂，教授生徒，来为“圣天子，图自强”服务。为满清皇朝统治中国人民的铁桶江山服务。谁知事与愿为，仍然抗不住辛亥革命的洪流，挽救不了拱手逊位的命运。麻城县办的官立高等小学堂，也不例外地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

清光绪二十七年就废了科举、停了书院，二十九年正式兴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三十二年设劝学所于旧日的万松书院（古楼侧），将原有学田，书院田产，及宾兴费（注二）卷费（注三）均拨作兴学之用，全由劝学所经营支配。开办学校，劝学所设正付学董，自开办至宣统三年历任学董为屈开诞、曹步云、罗良弼、程仲麟等。由县人公举呈报主管上官立案。其时邦办学为毛声远（举人），外设视学员，劝学员数人。民国四年设教育公所，六年仍称劝学所，民国十三年奉令改为教育局，二十三年又改局为科，（属县政府）局长或科长外，设县视学员一人，十七年后改称督学员，简称县

督学。还有会计、收租员和其它职员共数人，负责处理全县学校教育一切事宜。

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民国以后（1912年）中国成立了一个北洋军阀统治和各地地方军阀割据称雄的局面。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也都想在中国染一染指，伸展他们的势力，进行政治经济的侵略，首先是文化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校教育便出现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局面。各地方的军阀、官绅、恶霸、商人和外国洋人、传教士，都办起学校来了。他们的企图是培养为他们各自的利益服务的忠实奴才。另外还有人借办学作为走向政治舞台的阶梯和武断乡里的资本。私立学校还可以借收学杂费而大发横财。在这种潮流下，麻城县也难例外。因此，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便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如：乙种农业学校，先后校长有金立勋、袁瀛、颜行义、屈开坊等人。乙种商业学校，校长陶炯。乙种蚕业学校，校长李经华、汪纬冰等。模范国民学校，校长余弼、熊天叙、李清如等。女子初级小学校，教员丁德英、余淑华、颜少仪、张青云、傅祝华、曾焱仪等。这时四乡高等小学又恢复起来了。还有基督教福音堂瑞典洋人办的辅德小学等，民初全县共有县立初级小学三十四所。

这个时期的学校，大体是三种形式：一种是公立，一种是私立，另一种是私立公助。如：高等小学校，乙种农业学校、模范国民学校、女子小学校、四乡初级小学校等为公立，经费完全由县担任。乙种商业学校和乙种蚕业学校则系私立公助。乙种商业学校由县商会筹集经费，乙种蚕业则由东八区地方自筹经费，县里各补助一部分，各校学生五十人左

右。

查县教育经费除学田收入外，还有五项收入：一、地丁附加捐，二、税契附加捐，三、屠税附加捐，四、短期牙贴附加捐（注四）五、学款存息，以上各款从前每年收支尚可相抵。后来受着军阀混战的影响，官绅挪用教育经费的关系，加之人民生活日益下降，学生来源逐渐减少。于是在1915年（民国四年）又将四乡高等小学合并为麻城县立高等小学校一所。校址仍在县城南门考棚旧址。先后校长为王昌祺（举人）何士钦（秀才留日）汪龙蟠（秀才）余晋芳（翰林）、李延真（进士）郑康时（廪生）、余泽（举人）等。这一段时期，先后教员的姓名大多记不清楚。唯记得前前后后出现过很多“课外”搞“付业”的教员。如：沈芝台做状词，又会堪舆和算命。刘又贤、涂坦阶都会这一套。袁香波、李伯华会行医，胡序臣会看相。余晋芳、冯仁寿、余泽、沈心耕、郑康时都会写字，经常为有钱有势的人写作寿序、对联、挂幅等，经常有人请他们吃酒、吃肉、吃鸦片烟，或者送礼送节。其余李杜斋、刘香池、何士叙、余晴圃等则酷爱打麻将。刘香池还制订出很多麻将公式。他们的行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全县教员都受到这种影响，几乎成了一时的风尚。学生就更闹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学生除赌博打牌以外，还嫖妓女，如1920年时有学生占剑峰、钟韶就是为和缉私营的军官吃醋，缉私营打到学校，惊动了校长李延真而被开除出校的。可是他们后来竟做了国民党的县长。

民十四年县立高等小学校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校。将模范小学合并，劝学所长余晋芳兼任校长。民十五年九月北伐军兴，北洋军队袁英部乘机鼠据麻城，盘据学校。学校房屋，

校具捣毁一空。师生心散，学校停办，全县所有学校都因此关上了大门。农业、商业、蚕业都停办了，劝学所全体人员也跑得不知去向。这学期几个月教员的欠薪也就一笔勾销了。

1927年（民国十六年）元月，匪军调走，派来了县党部，他们领导人民赶走了勾结匪军的伪县长吴庄、刘芳等。纷纷组织起了农民协会、教职员工会、学生会等，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当时党的领导人大多是从武汉住学回来的青年学生，如蔡济璜、刘象明、王宏文、桂步蟾、王树声、刘文蔚等，他们都是县立高小的毕业生，都是中国共产党员，他们怀着雄心大志，干起革命事业，一致主张要恢复麻城的学校，教育好新的一代，于是在民十六年的三月委王宏文为教育局长，吴德忠为麻城县第一小学校长。由于考棚旧址被匪军捣毁，乃迁至县衙左侧模范小学和育婴堂旧屋合并扩建，招生开学。学生近二百人。

这段时期，革命气氛充满了学校，麻城教育的面貌已焕然一新矣。当时学生所唱的歌子是“打倒列强”、“打倒蒋介石新军阀”和“国际歌”等。可惜为时不久，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蒋介石叛变。麻城的土豪劣绅，重整旗鼓，勾结国民党匪军任应歧、张英方，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把当时县党部的改组委员会委员李培文、屈祖培、王宏文和孙某都逮捕了。后来，李、屈、孙都释放了。王宏文被害，吴德忠也被迫离职。校长由何士钦、彭宗蕃相继充任。教育局长颜行义。至民国二十年便改名为中心小学。校长先后有吴德忠、郑水心、李杜斋、王洪范、郑重、屈祖培等。至二十七年学校被日寇飞机炸毁，学校遂停办。

据民国二十年的记载，这时全县只有县立中心小学（完小）一所，学生二百四十余人，计高级二班，初级四班。县立女子小学一百二十人，高小一班，初小二班。其余小学有宋埠二小、黄市三小、中驿四小、张店五小、阎河六小，这些学校只宋埠二小有高级学生，其余都是名为完小，实际只有初级学生。此外，加上白果第二初小，夫子河第三初小，歧亭第四初小，黄土岗第五初小，总共学生全县不到一千人。常年经费总共为9840元。另外，一些旋办旋停的私立初小及半日学堂，私塾改良等，都是经费自筹，教师自聘。每年由县督学视察考核后，分别给以奖励金。至于外国人办的辅德小学校，他们怎样办，教些什么东西，就根本不管。

在民国十八年的时候，湖北省在麻城开办了省立第一初级小学，教员胡嗣清、王振寿和省立第二初级小学，教员郑达文、郭润元，还在中驿地方办了一个特种教育初级小学，教员王流光。每校四、五十个学生，这些学校教员的薪资较县立小学高出两倍以上，其办学宗旨，殊不可解，省里这几个学校，在民国二十年就停办了。

这个时期学校教授的科目是：国文、算术、英文、历史、地理、自然、修身（后来改称公民）、体操、音乐、手工、国画等。有全国统一的教材书（多数是商务印书馆出版或中华书局或开明书局出版）。

从民元至抗战前夕，尽管学校更名，校长教员易人，旧生毕业，新生入校，一年复一年，一届又复一届。然而整个学校生活状态，据我看来，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它，那就是一个“混”字。

政府办学校是装饰门面，点缀风景，蒙混人民的耳目。

校长、教员是混饭吃，学生是混文凭（现在叫毕业证书），上下交相混。各有各的打算。每日打钟上堂、下堂、吃饭、睡觉、玩耍。一批一批的毕业，一月一月的拿薪，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生长在农村，而又看不起农村的人。把城市挤得满满的。乌烟瘴气，无孔不入。实际上反动政府的用人，是凭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姓、同党、同派和贿赂等等的关系，不完全凭学历和经历，当然更不是凭什么是才和德了。

高小毕业的学生，很多人都没有通过中学，甚至连小学都没住，便钻进了大学或专科的。如在武汉读法政专科的潘式一、潘龙光、鲍一芳、彭宗英、冯振之、王兆燕、丁辅民、丁若、龚楚仙、周子樵、汪藻衡等和在中华大学的雷振华、唐份明等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子弟，由于封建社会的钱可通神，他们利用这种魔力，可以弄到假文凭，或利用所谓学历的掩护越级升学。不仅如此，他们中有些人虽然名住大学，实际上还可以长年，甚至终毕业之日没有到过学校，没有上过课，只是每学期托人代缴学费，代缴讲义费（每学期总是五、六十元），代领讲义、代考期考和毕业考试，毕业后，就代领文凭。坐在家里就取得了大学毕业的资格。从而赖以飞黄腾达。在郑重、余晋芳的主编的麻城县志里记下了一笔的。属于这一类的人物要占绝大多数。象潘龙光、王兆燕之流，后来还当上了县长。其余的不是当法官就是当律师，或者当绅士，粉墨登场，成了一时的风流人物。藉此，可以横霸一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恶。不仅他一家人耀武扬威，连他们的亲戚六眷，也好象成了皇亲国戚一样，真是“一人成佛，鸡狗登仙”。左邻右舍

的贫苦劳动人民，都变成了他们脚底下的泥巴了。怪不得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愿隔壁养黄牯，不愿隔壁出知府”。

等而下之，有些比较贫寒的学生，他们在学校死搬硬套，以为用功课成绩来战胜富豪子弟，谁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由于没有金钱势力为后盾，结果还是升不上大学。最多，竭尽力量，考上省立中学或师范，要想进大学，那就比登天还难。但尽管如此，他们总是不肯放下“读书高”的臭架子，总是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甘愿挨饿也不想到农村。因此，这批人的出路多半是当一个小学教员、或私塾农师，能当上高等小学的教员，那就很不错了，他们守着穷教员、教书匠的头衔，死也不放。当时阎河小学有一个年近七旬的教师张叔远，他由于患高血压长期得不到治疗和休养，竟一天死在讲堂上课的时候。旧社会穷教员的下场，大抵类此，不过，也有一部分把当教员作为跳板而爬上绅士的地位，买田置地，发财致富的。如汤致聘、雷松涛、李夷寿、屈祖培这些人物，另外由于旧社会黑暗阴影反映到麻城学校教育方面，激怒了一批爱国的青年，他们一出小学就受到当时武汉中学董必武校长的教导，从而投笔从戎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乘着大革命的浪潮回到了麻城。很想把麻城的教育好好整改一番，可惜为时不久，随着大革命的挫折而未及时实现。这些进步青年是：蔡济璜、刘象明、王宏文、王树声、桂步蟾、刘文蔚等，他们都是麻城县立高等小学的毕业生，也是麻城学校历史上最杰出的学生。

在大革命失败后，蔡济璜、刘象明、王宏文、刘文蔚、桂步蟾和很多优秀共产党员都牺牲了。王树声领导着一批进

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在乘马岗、顺河集两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反动派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培养革命后代——接班人的重要性，于1928年在苏区各地方普遍兴起列宁小学校，每村都有列宁学小一所，每校三十至五十名学生，丁家畝、花石河各设乡苏列宁完小一所，乘马区的乘马岗和顺河区的林店高家畝各有县苏模范小学一所。每校一百余名学生，学生毕业后可以参加工作，也可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另外，各地还办有民众夜校、扫盲班。省苏在新集还办有军事大学。县苏设有文化科，负责编印教材和一切文化宣传品。在苏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唱革命歌子。文化生活非常活跃，革命潮流无比高涨，可恨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一再疯狂的进攻之后，苏区学校和文化机构都受到巨大摧残和破坏。

③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麻城县的开办中学，盖自一九四〇年起，先是：从“九一八”一直到芦沟桥事变，麻城和全国一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学校师生抗战情绪比较高涨。不料敌人未来，国民党反动派的校长余澄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下令封闭了全县的学校。赶走了所有的师生，伙同大权在握的教育科长袁瀛（香波）和县立中心小学校长屈祖培，把学款完全藏进了腰包，准备跑反，置全县教育和学校、以及广大师生的生死于不顾。（当时如能作有计划的迁移可以保存很大一部分学校的公共财物。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想。）

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这天的上午九时许，麻城县城便遭到日寇飞机惨无人道的疯狂轰炸。顷刻间，麻城最高学

府的县立中心小学便埋葬在烟雾之中。整个学校霎时间，便变成了一片瓦砾的废墟，整个麻城教育在这个时候已被余澄、袁瀛、屈祖培等断送干净了。

这以后，大部分失业而又要逃难的穷教员生活就非常困难了，当时避难至龟峰山一带的麻城人民，绝大多数染上了严重的恶性痢疾，同时药品奇缺，医药难求。虽然国民党反动县政府以救济为名用公款买来一批治痢疾的奎宁丸，掌握在伪县长余澄的舅子手里，但是他们把奎宁丸锁在自己的箱子里，不漏出一颗。这时，中心小学的失业教员吴德忠，因为母亲和一个三岁的小孩都身染恶性痢疾，已濒于危险的境地。天真地希望在这位舅老爷手里买到几颗奎宁丸去替母亲和孩子诊病，谁知得到的是“没有”两个字。这样，只有睁着眼睛，让母亲和孩子活活病死，后来听说这位舅老爷在这批奎宁丸上发了一笔大财。除了他们的亲戚、朋友能买到或送给一些以外，其余都是大资本家用特殊高价买去了。贫穷人是无法问津的，教书匠的生活处境到这时已是山穷水尽了。

一九三九年的春季，日寇虽仍占据着麻城县城和宋埠，但它的主力已转向其它的战场。麻城县的一些山区和丘陵地带得以苟且偷安。这个时候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商人、汉奸、大资本家趁机发了国难财。他们的子女，都想读书了，想做反动统治者的接班人了。同时，这些权贵们，认为兴办学校可以借名筹款，借故发财，如果“官运亨通”，当上一名校长，那就更“实玉各归”了。因此，他们都认为学校是奇货可居，但是，也还有个别的人是为了办学校而办学校的。当时在东乡汪子弼办起了黄市完小，南乡雷松涛办起

了雷氏祠完小，西乡陈适有办起了万义完小，北乡屈祖培办起了福田河完小。一般落魄的穷教员又纷纷成了雇佣式的教书匠了。一些贫寒子弟也沾光得到读书的机会了。

一九四〇年春，汪子弼便在黄市又开办了龙潭中学两个班，共一百名学生。雷松涛不甘落后，也在雷氏祠开办了初中两班，也是一百人，一九四〇年秋奉鄂东专署的命令，合并到龟头河程氏祠改名为鄂东联合中学麻城分部，将原有学生进行甄别考试，留下一百人，分成两个班，汪子弼为分部主任。一九四一年秋，便又改为麻城初级中学，聘李柱中当校长，屈祖培为教务主任，雷松涛为训育主任。汪子弼调鄂东中学高中部国文教员。

李柱中系日本士官学生出身，曾任夏斗寅部旅长和范石生参谋长，这时在家赋闲。当时县长钟韶是李的旧部下，李柱中接任校长后招收了两班学生计一百四十余人，加上原有的一百人，小小的龟头河程氏祠就显然放不下了，于是，以程氏祠为校本部，另在附近的东岳庙和周楼河坑，借用一些民房作为教员的宿舍。第二年又招收两班学生计一百余人，学校规模要扩大了。于是派李经华（夷寿）为事务主任，在程氏祠的北面山凹里兴建一座新屋，可容两个班学生，李经华为了卖弄才华把它命名为“廊房福地”。用意殊不可解，大概是表示一下他们办学校是为了赚钱的目的和他们自己的苟安心理吧，当时有人送了李夷寿这样一首诗：脸厚头尖鼻子勾，经营奔走到龟头，祖坟早被鸡爬发，主任而今楼上楼。

这时龟头河是很热闹的，上有县政府和一些县属机关，下有中学，俨然成了麻城政治文化的中心。李柱中好象也想

干番事业。以他当时在麻城的声望，却也很象将有一番作为的。如：有一次，国民党第五战区付司令长官李品仙和某师长刘和鼎到龟头河拜访李校长，他当着李品仙的面对刘和鼎说“麻城百姓说，你们的军队危害地方，搜刮民财，简直是‘一扫光’。这样的军队要严加整顿”。在房的新任县长李培文吓得伸舌头，不料刘和鼎倒唯唯称是。李柱中经常集合师生训话，连最傲慢的袁香波也收起了一尺多长的旱烟袋，翘着短短的胡子，穿着长袍和所有师生长长地站在一列了。李柱中也讲些抗日的道理，和一些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礼义廉耻等这一类的东西。

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床，将起床的时候，全体学生要高喊“兴起、兴起”、“早起是黄金，晚起是狗屎”。起床后，接着就早操或爬山，回来再洗脸。六点到七点读书，七点早餐，八点上课，语文要背诵，其他功课也要经常测验，学生寝室的被子，天天要叠得整整齐齐的。这时学校教员、学生、寝室、教室都很分散，如从校本部到东岳庙就有一里多上山路，从鲍家坑或楼河坑教员宿舍到校本部都有一里多路还隔一道河。由校本部到草棚里的学生寝教室也都得翻山越岭。遇着雨天，草棚里的学生由于屋漏睡不得觉，就要撑着雨伞坐到天明。吃饭是八个人围着盛有炒豆的小木盆，坐在地上吃，吃完后自己洗净自备的碗筷，然后由值日生把饭桶、菜盆送到厨房，尽管这样，读书的空气倒还是很浓厚的。

在占据县城的日军退至宋埠以后，学校于一九四三年七月迁至阎河区的凤陂畈，校本部设张氏祠，在附近的阮家坳，钓鱼台，七王庙，分设一些教室、寝室，这时李经华因贪已

污撤职，事务主任由陈直接任，负责迁建工作，一九四四年秋又在离校本部七、八里外的横山冲、丁家堂增设简易师范班，聘胡竟存为主任，这时共有中学七班、简师一班，学生合计500人，教职员工共三十余人，一九四五年六月李柱申在家自杀，原因不详。张书环继任校长，一九四六年春张书环辞职，屈祖培接任。

屈祖培接任县中学校长以后，学校情况就江河日下。屈祖培经常和一些有麻将癖的教员在女教师杨伯华家里打牌。有些学生也在钓鱼台、阮家坳、七王庙这些地方赌起博来。输赢动至数十元之巨。有一次，阮家坳的学生不知为什么和他们的级主任老师林安琪冲突起来，要动武了。走投无路的林安琪求得到他福田河同乡学生的保护，躲进床底下，始得幸免。另外，训育主任戴伯威其人者，更不符人望，当时也被学生打倒桃树林里去避乱。事后有人送了他一首十六字的诗。诗曰：“黑细牛的‘大’，主任当不下，回家卖‘骚’酒罢！”（戴是夫子河人，读烧字作骚音）又（麻城小孩叫母亲为大）

一九四六年春天，简师单独设校，胡竟存任校长，汤致聘为主任，将简师迁至县城东门外东竺巷，新建楼房两座，上下共教室四间，学生约200人。

一九四六年秋，中学全部由凤陂畈迁至县城考棚旧址，新建寝教室十六间，办公室一间，厨房一间，教职员工宿舍共二十余间。

一九四七年春，县中学生和简师学生打了一架之后，接着县中学又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转业军官在街上打了起来，国民党反动派的转业军官拿着手枪追，还掷了一个手榴弹，然

后用电刀杀伤了一名学生。于是学生抱着头跑，跑到伪县长占建峰公馆里，向正在和县长大人打麻将的屈祖培校长求救，慌得正在床上烧鸦片烟的某太太把烟灯吹熄了，大骂学生不该往这里跑。

当时学生中最出风头的有所谓五虎上将，他们是占泽明（占剑峰的大少爷）、严方城（镇长严方中弟）、李成学（屈祖培的同乡、大地主）、唐茂明（国民党反动派唐英贤的弟弟）、梅光弟（大商人的子弟），地方上的人把国民党匪军叫丘八，把这些学生称为丘九。学风之坏在屈祖培和汤致聘当权时已达到了极点。

自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四六年宋埠办起了第二示范中心小学，郝济民为校长，同时在麻城县城有第一示范中心小学，白果有第三示范，阎河有第四示范，福田河有第五示范。秋天，又在宋埠办起了私立新陵中学，张书环为校长，学生148人，教职员17人，同时省立第二高级中学也在宋埠设立了。校长刘天霞，主任龚文鉴，学生225人，职员20人。

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南下，吓慌了反动派，学校员生纷纷离校。张书环来到汉口。屈祖培也跑到武昌跟着大地主、大反动头子潘作之当了私立启黄中学事务主任，胡竟存跑回宋埠，取得了私立新陵中学校长的位置，县中简师停顿。

从一九四八年春季起，麻城县中和简师合并并在考棚新建中学校址开学，这时有初中六班，简师二班，共学生四百七十九人，教职员三十二人，汤致聘为校长，占晖岳为教务主任，陈明宰为训育主任，在宋埠有私立新陵中学五班，学生一百四十八人，教职员十七人，乡中心小学十六所（私立两

所)共一百三十八班,学生男四千一百六十八人,女三百零六人。还有些私塾没有统计,另外省立麻二高一所,学生二百二十五人,教职员工二十人。统计全县公立中学八百五十二人,小学四千四百七十四人,共五千三百二十六人。

由于解放战争日期激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方,震动很大。一些资产阶级、地富阶级的教员和学生都纷纷跑到武汉进了临时中学,麻城县的中、小学生就相应地减少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麻城解放的前夕,全县计有省立麻高一处(附新陵中学二班)共七班,学生男一百五十六人,女二十二人。县中一处(附简师一班)共四班,学生男一百零八人,女三人。小学17所,计七十三班,共学生二千二百零六人。统计全县中、小学生共二千四百九十五人(中:289人,小:2206人)。

解放前的旧社会,无论在封建王朝、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那一个时期,教育总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也是为个人服务的。绝大部分人是抱着“混”的宗旨。他们办学、读书,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升官和发财、混饭吃。但是,学校内面也很明显地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分歧。表现在县立中学汤致聘当校长的时候,就更为突出。

汤致聘是麻城地区国民党员又是青年党的骨干。是麻城东门外望城岗上的一个地主恶霸。他是李家坝大地主李俊臣的女婿,身材矮小,头尖脸厚,鬼板眼多。他是一位大少爷到能继承父志。听说在鄂东联合中学读书时,偷人家的东西,被开除了,他的父母就不多谈了。现在谈下他当校长时的“德政”。

他当校长时，教务主任占晖岳，是占剑峰的堂兄。训育主任陈明宰是青年党的健将，会计汤致殊是汤致聘的弟弟，曾充伪乡长，是吃人不留骨的一头野兽。教员中还有替他通风报信的杜竹均。还有一个从青年党省委派来的王姓教员，山东人，教英文。此外连厨工都是汤致聘的心腹，家兵家将。因此，凡是和他臭味不同的教员就要受到排挤和仇视。

他对教员和学生剥削和手段是非常狡猾和毒辣的。每个月学校全部经费一领到手就送到他岳父在麻城北门外开设的一个商店去存放生息。然后把息金零星地作为学校开支和发放职员工薪之用，经常几个月欠薪不发。办公费除了万不得已买点灯油、纸张、粉笔之外，大部分汤致聘装入私囊。教员参考书一本没有，如当时教员吴德中教地理，托会计汤致殊买来两本地图，也要在月薪里扣除。至若教理化的教员，那就自己私人买不起仪器了，只好照本宣科。

教员无论有什么困难是莫想得到校方丝毫照顾的，那时候就根本想不到，谈不上什么福利照顾和公费医疗了。有一次，教员吴德忠家中断炊，而且本人身患疾病。在十月份的时候，要求会计汤致殊支给八月份的工薪和食米的一部，竟遭到汤致殊的无理拒绝，小狗仗着大狗的势力，是不可以理喻的。与此同时，教员姜壁楨，因为留客吃饭，想支一元伪法币买点肉和面，也遭到汤致殊的拒绝，口里还不干净，教员袁香波没有“金堂烟叶”也难借到分文。

他们剥削学生，更是花样百出。入学之初，学生首先要缴清学杂费之外，还要缴食米和劈柴，每学期均以五个月计算一次交清。劈柴一项如不能一次交清时，就要先缴银洋二元，叫做保证金，坚决不要金元券（当时金元券两元抵银洋

一元)。俟五个月的劈柴五百斤凑齐后，再将保证金退还。这是汤氏弟兄自订的“法律”，可是，在学生交清了劈柴以后，他们还一再支吾、拖延，不退保证金。经过学生再三催促，他们才拿出金元券作抵，这时金元券已经要二十多元，或者更多一点才能抵上一块银元。且还有下跌之势。而他们还是用两元金元券当一块银洋退还给学生，这样，学生们就群情愤慨，怒不可遏了，学生们说，我们不要钱，打一打人算了。结果，把汤致聘的大少爷和汤致殊很打了一顿。（因为汤致聘装病躲到家里去了）还是反动派的县长占剑峰派教育科长李谪辉来做“和事佬”才结束了这场把戏。

还有，学生交来的米和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的亲信厨工悄悄地一挑一挑往汤致聘和汤致殊家里送。有一次，被学生发现了，人赃俱获。把这厨工捆了起来。经过多人的劝解，学生们也就一笑而散。谁知事过不久，这个学生的父亲到学校来了。同学们用纸烟招待他，这位家长正在高兴地吸烟的时候，校长老爷汤致聘拄着拐杖，摇摇摆摆地走来了，开口便问道：“我们学校不准吸烟，你是何人敢在这里吸烟？坏了我校的规矩”。这位家长还笑着说：“校长啊！要是你到我家，我将还不只招待你一根烟，或者还要杀只鸡呢”。出人意料的是：回答这位家长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当头一棒，打得这位家长顿时血流满面。一群学生都赫得噤若寒蝉、面面相觑了。因为，校长这根“哭丧棒”大家是早已领教过的，他打了你，有占剑峰作后台，又谁敢把他怎样？只有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而已，横蛮兽性的汤致聘就是这样的作风。

可以说：汤致聘是旧社会麻城学校教育中最突出的代表

人物。

由于汤致聘的贪污无度，作恶多端，遭到绝大多数师生的反对。占剑峰和他们的一些狐群狗党也就爱莫能助了，于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间派袁瀛（香波）接任校长。当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开学的时候，袁香波、汤致聘、吴德忠为教务主任，占晖岳为训育主任，陈明宰为事务主任。未及一月，师生还未到齐，麻城县便解放了。从此，麻城的学校便归到了人民的怀抱，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展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辉煌灿烂，红光焕发。

（二）解放后

①恢复和发展时期：

解放伊始，袁香波托病回家。久不到职，于是由麻城县人民政府县长梁百朴兼任校长，吴伯厚（吴德中字）为主任，召集原有师生，即日开学上课。同时，对想乘机钻进中学的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加以拒绝和清洗，这时只到学生约二十人，教职员二、三人。

一九四九年七月省派郑铃峰为校长，邹立景为主任，这时学生已有两个班，约五、六十人，教职员五、六人。

一九五〇年春，郑铃峰调宋埠省立麻高校长，龚文剑接任县中校长，喻献华为教务主任，屈祖培为事务主任，学生还是两班。

一九五二年二月，黄冈专署派吴伯厚为校长，喻献华、余朴为付校长，吴宏忠为教务主任、陈明宰为事务主任，学生增至四班，约二百人，教职员十七人，改为湖北省麻城县

第一初级中学，这时宋埠高中在五〇年秋就停办了，将新陵中学合并，改名为湖北省麻城县第二初级中学，学生一百五十人，校长郑铃峰，主任邹立景。

全县初中二所，学生共三百五十四人，五三年就发展到二十三班，九百八十七人，内一中有简师一班，五十名学生，五三年十月陈正言调一中第二校长。丁吉斋调第二初级中学校长，郑铃峰为付校长。五四年元月吴伯厚调县人委会副县长，陈正言接任一中校长，余朴为副校长。秋，郑铃峰调新州县中学教员，丁吉斋仍任校长，两个中学，共学生二十三班，一千〇五十七人，教职员共八十二人。

一九五六年，一中增设高中三班，学生一百五十四人，教员十二人，五七年又增一班，共学生一百九十五人。教员二十七人，一九五八年，二中也增加高中二班，学生一百余人。

在一九五二年时，曾在五脑山和南门外忠烈祠办有小学师资训练班两班，办了两届，每届一百二十人左右，一年毕业，主任程修顺，至五六年，便在牛坡山建师范学校一所，（师资训练班撤销）校长万书城。是年丁吉斋调县政协秘书长，由原任宋埠镇镇长鲁建平继任一中校长，五七年鲁建平调省麻城中级师范校长（原师范学校改称），二中校长由陈正言接任，一中校长由张薪樵接任，次年陈正言调河南，二中校长由张敬士接任。

在一九五六年麻城中学发展至六所，增加了白果三中，校长姜光永；石墩坳四中，校长涂坦；黄土岗五中，校长孙净；林店六中，校长程国华。总共学生四十六班，二千二百六十人，教职员一百二十六人，至一九五八年又发展到十五

所中学，一百〇五班，学生五千五百三十人。一九五八年将原有师范学校改为中级师范，招收新、红、麻三县学生，计初级六班，二百八十六人，教员二十五人，增招中师四班，约两百人，校长鲁建平。

一九五九年，县一中和师范，互换校址。

一九五九年，中学发展至十五所，是：一中牛坡山，校长张薪桥；二中宋埠，校长陈正言；三中白果，校长姜光泳；四中石墩坳，校长祁建国；五中黄土岗，校长孙净；六中林店，校长陈国华；七中中一，主任余天民；八中铁门，校长余真钦；九中夫子河，校长程时祥；十中龟山，校长田晋申；十一中张家畷，校长汪宗鲁；十二中阎河，校长汤治；十三中三河口，校长蔡文培；十四中福田河，校长王颜开；十五中乘马岗，主任宋士竹。其中除一、二中外，大都是完小戴帽子，仅白果三中和林店六中曾一度戴帽子办高中各二班，旋于六一年把白果高中部合并至麻一中，林店高中部合并至宋埠二中。

六一年又增加浮桥河中学，校长周济衷；闵集中学，校长王光文；东河中学，校长曾明恕；工电中学，主任冯克绳；蚕业中学（附四中）；林业中学（五脑山）校长董传芳、姜文芳；卫生中学（附师范）；农业中学（垸店）主任占秀登。

这时全县小学有227所，1244班，学生51361人，教职员1444人，还有民办小学254所，422班，16450人，教职员425人，城关镇有民办中学二班，校长尚凤翔、余家兴。

②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

一九六二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

下，我县学校普遍进行了精简整顿，至现在全县共有公立中学十三所，城关中学（牛坡山）校长张薪樵，宋埠中学，校长张进士、钱大成，白果中学校长姜光永、涂桥辉，石墩坳中学校长涂坦、史东阳，黄土岗中学校长王颜开、董传芳，林店中学校长陈文春，中一中中学校长程时祥，铁门中学校长罗学坤，龟山中中学校长刘志仁，张家畈中学校长何钧，阎河中学校长祁建国，三河中学校长蔡文培，乘马中学校长丁良弼，共计初中77班，高中12班，共学生3792人，小学公立的有198所，976班，学生共计37871人，教职员工中学324人，小学1400人。

民办，有麻城城关镇民办中学一所和六二年宋埠镇开办的民办中学一所，共二所。此外还有民办小学共七百零四所，九百七十六班，学生二万九千零七十七人。教师九百八十一人，总共全县教师队伍为二千七百零五人。

另外，还有干部业余学校，教职员五人，学员占干部总人数40%以上，教师函授学校，教职员 人，学员 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江声涛，教职员五人，学员约一百人，中医训练班，教员三人，学生约五十人。

所有公立中学都有很完备的图书、仪器和体育用具，一中和二中更为完备，其它宋埠、城关这些重点小学也有一定的图书、仪器和体育设备。

总之，麻城的学校教育事业，解放后在党的教育方针英明正确的指导下，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麻城教育历史上的最高峰。

麻城县中、小学的毕业生，不仅学得一些政治、生产和科学的知识，还在学校养成了热爱劳动的高贵品质。毕业

后，有的考入全国各大专学校，继续深造，有的参加了祖国的各项工作，还有大批的走上农业第一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如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谢慕安，他认为种田是根本，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他忠诚地听党的话，在参加劳动生产中，积极和坏人、坏事、坏思想作斗争。在技术革新上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如对二季稻的栽培技术上，他刻苦钻研，亲自试验，终于获得了增产的成绩，他的试验田二亩零一厘，实打谷1600斤零8两，平均亩产800斤，在他的影响下，到一九五六年全社达到亩产820斤产量，另外，他在防洪抢险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实在称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实在称得上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有文化的新式农民。现在全县各公社正在继续出现谢慕安式的新型人物。

一九五七年秋，还曾有大批建苏学生，如56名城镇中、小学毕业生，与苏区农民实行了两拜师。互相学习生产和文化，进步很快。有刘炳先等在半年学会了五十多种农活，做了一千一百多工分。他还表示要在苏区生根、开花、结果。在劳动中，所有学生都对农村这一广阔的天地，发生了无限的热爱。

他们在发展农业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和劳心劳力的差别，在我们的时代，将要彻底摧毁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夫子式的人物，将不再见于今日了。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广大师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通过工作中的锻炼，又红又专的教师也不断地出现和增多，他们的思想进步、成绩突出，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的优秀人民教师者，颇不乏人。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教育事业，逐步做到向工、农兵开门，如小学教育，在一九五〇年学生23532人中工农子女有20850人，占学生总数89%，一九五八年学生51361人中工农子女有51244人，占学生总数99.23%，中学教育，一九五三年学生1091人中工农子女1060人，占学生总97%，一九五七年学生共2455人(初中、高中)，其中工农子女2434人，占学生总数99%。

现在全县中、小学生总人数为70935人，较解放前最多时5326人约14倍，较民国二十年全县不满一千人时约70倍。

关于学校校舍的修建和设备，在解放十四年来，更是惊人。统计中学新建房子不下数百间，小学百数十间，改建尚不在内。各种教学仪器有三十余套，体育设备校校都有。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全县中小学先后拨款两百万元以上，就麻一中校舍来说，以前是一片荒山，现在建成二、三十栋的新式房屋。学校有成套的图书、仪器、体育设备，有电灯，有机器抽水井，绿荫满布，桃李争艳，弦歌之声不绝于耳。白果三中，黄土岗五中，林店六中，中一七中，三河十三中，铁门八中，龟山十中，张家畷十一中，过去也都是一块块的荒山荒地，今天都变成了一进数重，大数十余间的新式的美丽校舍，其余的中、小学的校舍，校校都添建和改建了大部份的新屋，都是焕然一新，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加强了党的领导。

中共麻城县委领导是坚强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对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视的；对教职员工的政治上、教学上、生活上的不断提高是无限关怀的。

在一九五八年派涂坦同志为师范党支部书记，派陈致中同志为麻一中支部书记，何志勇同志为麻二中支部书记，一九五九年派姜光永同志为麻三中支部书记兼校长，其余绝大部分中、小学都是党支部书记兼教长，一九六〇年秋，坦涂同志和陈致中同志互调工作。各学校的党、团员逐渐增多，几乎全部都是工会会员。

从一九五一年起，所有学校都有教工会，一九五二年起都有共青团，党、团员在工作中起了巨大的骨干带头作用。

基于以上情况，学校党组织领导的力量加强，所以学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体反映在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

在政治上加强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所有中、小学教师都参加了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和反右斗争与反对修正主义的各项中心运动，还在寒暑假期间，一九五八年以来组织了庞大的教师队伍，参加了三治、五改和修建三河、浮桥河等水库以及支援农业生产，帮助铁门区抗旱、插秧等富有革命历史意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义务劳动。在这些义务劳动中，所有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是全部参加的。由于他们的觉悟提高，干劲更大。因此，在广大师生中涌现出大批的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模范英勇人物。解放以来，广大教师队伍，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都得到了提高，如石陵中心小学教师毛文甫，连小学都没住过，现在能教一至六年级的课，由于他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于58年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象他这样的教师有七十八人。我们体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使教师、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均衡的发

展。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教育质量。

在教学上进行了教学改革，批判了旧的教学方法，通过大胆尝试和工作实践，各校在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启发学生积极性方面，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首先进行了教育战线上的大革命……在这个基础上，各校加强了教学研究活动，各科设有教研组，在这种组织活动下，突破了重点内容。从一、二、三中综合情况看：第一，研究如何挖掘教学的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第二，研究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各科目的任务。第三，研究如何培养提高学生的基础知识。第四，研究如何根据各科教学特点紧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五，研究如何通过课堂各科教学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绝大部分教师基本做到了从整体到部份，从单元到课时，充分做好课前的一切准备，深入钻研教材，为课堂教好课打下基础。

其次，在全县中、小学校中把互相听课，当成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互相促进的一个重要手段。把公开教学当成创造经验，推广经验的一项有效措施，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消化知识，如设立“词字检查岗”开办教学课外补习班等等。与此同时对学生作业认真批改，做到全收全改，有错就改，细心指导。从每个环节中真正体现了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不断上升。

总的来说，教学改革的效果，把整个教学质量，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生活上，党对学校师生的健康，是无限关怀的，除多方设法改善师生日常一般生活之外，教师有公费医疗待遇，

学生有人民助学金待遇，解除了师生们贫和病的严重威胁。

自从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来，教师生活更不断改善，师生间的团结友谊更不断加强。

中一公社一般小学教师（女）方宗友因轧米受伤，机器揭去了她头上的整个头发，赶快送至麻城人民医院治疗，全愈，花去公费医疗六百元，其丈夫金修学也是小学教师，患肺病六年未做工作，仍领工资。四中教师王步云，身患严重疾病，当地医生检查不出原因，由学校送至木子店卫生院，又转至县人民医院，最后送至武汉第二附属医院，长期治疗，共花去公费医疗费九百六十多元。又三河小学胡辉先长期肺病，三年没工作，工资照领，自己要求回家休养，政府还给他币四百元，宋埠小学李云阶老师六十二岁了，他退休后，仍住在学校，享受退休待遇，不担任功课，安度他晚年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在学生中，很多贫下中农学生和贫苦无靠的学生，甚至是孤儿，都受到人民助学金的照顾而得以安心学习，在全县许多孤儿院中很多很多的孤儿不仅保全了生命，还学到了知识，一批一批地走进了学校，得到了深造。

总之，在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们开始体会到新社会的温暖。

再没有教师象过去阎河教员张叔远那样死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了。

再没有象失业教员吴德忠，向政府连一颗奎宁丸都买不到的世界了。

再没有教员不务正业，学生嫖妓女，校长对教学不负责任的学校了。

再没有体罚学生，甚至把学生家长打得头破血流的校长了。

再没有连参考书都没有的徒手教员了。

再没有劳动人民的子女站在学校的官墙外望，想读书而不可得的时候了。

再没有不爱学生的老师，也没有不尊敬老师的学生了。

再没有坐在家里，平白混到毕业证书的公子哥儿了。

再没有教员偷学生的柴米了。

再没有撑着雨伞，在床上坐到天明的学生了。

再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夫子式的劳心者治人的角色了。

总的说来，旧东西将都没有了，新东西将不断繁殖起来，新人新事也将不断出现，人民幸福的生活将越过越甜，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也将空前提高，旧中国的阴影将不再见于今日了。

※ ※ ※

麻城县从一九〇三年废科举、兴学校起，到今年已整整经过了六十个寒暑，学校的变迁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解放十四年来，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旧社会的学校，是为封建王朝服务，为军阀、官僚、绅士地富、资本家服务，总的说来就是为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服务，是反动的、反人民的教育。今天新社会的学校，则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旧社会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劳心者治人的角色，是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角色，也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统治人民的角色，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角色。实际上，人民不需要这种角色，而且痛恨这种角色。

今日新社会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是革命的人才，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集体利益的人才，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既劳心，又劳力，和劳动群众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人民需要这样的人才，热爱这样的人才。

今昔同叫学校，同叫教员，同叫学生，其本质就根本不同了。

现在整个世界观改观了，我们麻城的学校教育也出现了一副崭新的，欣欣向荣的面貌。

六十年前曾在麻城官立高等小学堂执过教鞭的董必武副主席，一九六二年五月到麻城视察时，曾有诗曰：“十年改革新气象，人物衣冠异昔时”。可为整个麻城县的教育写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麻城。当然，更没有今天的新型学校了。

幸福中的麻城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从而忠诚地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六十年来，麻城县的学校教育，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这篇东西，是根据很多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作今昔鲜明的对比。因此，也可说是六十年来麻城县学校教育的简略纪要。很大部份是本人耳闻目见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但因时间太久，仅凭回忆，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尤其是时间，

数字，容或未能十分准确。虽然是顺着时间由远及近地写来，也恐有记忆不清，前后错列的毛病。加上本人水平有限，写得更不系统。

总之，缺点很多，尚望阅读同志们，加以批评和指正，是为至幸。

1963. 12

注释：

(注一)翰林：清制，进士朝考得庶吉士则称翰林，科举最清贵之途也，第一名为状元。

进士：明清时，举人会试中试，殿试二甲以上，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皆曰进士。

举人：援取士先考试之法，皆令郡国守相荐举，故谓之举人。唐宋清之举进士，谓之举使贡进士科也，明始以乡试中式举人，清因之，盖自本人言之曰举进士，自朝廷言之曰举人，谓州县所举到之人也。

秀才：明清时，称入县学之生员为秀才。一般是在府、院考录取者。三年一期，各县有一定名额，麻城县在清末时，秀才名额为27名，后与黄安共增一名，共27名半，那就是，这期麻城多一名，下期黄安多一名。未考取秀才者，都称童生，秀才又称学内。

优贡：清制，每三年教官就在学生中选举优行者，由学政考定保送，大省六人，中省四人，小省二人，朝考后，一等任知县，二等任教职，三等

任训导，更下者罢归。

拔贡：清制，与优贡同，不过是没有定期的，一般是在虚大有殊大喜庆时，特开的一科，所以又叫恩贡。

庶吉士：官名，明太祖采用庶常吉士之义置庶吉士。六科及甲书该有之。永乐中始隶于翰林院，以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清因之，设庶常馆，使翰林官为教习，三年则试其优劣而授职，谓之散馆。

生：科举时代，劣生员给廩禄者称廩膳生员，亦简称廩生，明洪武二年，始定各府县学校生员之散，月廩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是生员皆有廩膳，其后添设增附，而廩生遂成专名。

（注二）宾兴：周时选举法，自乡小学举贤能而宾宾礼之，以升与国学也，科举时代士子将应乡试，地方官设宴以待之，亦曰宾兴。盖仿古乡饮酒之礼也，清初，每岁由各州县邻访士之年高德朝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仍将所举介宾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称为乡饮耆宾，倘乡饮后间有过犯，则详报革，存部除名，并将原举之官议处。

（注三）卷费：考试时，办理试卷等的经费。

（注四）牙帖：牙行所执之凭照也，牙行，是凡设行号，处于需用和供给之间，代客买卖货物，交互说合以抽取用费者，谓之牙行。业此者，必须先向官

领取牙帖，名曰牙帖每年缴纳牙帖税银，谓之牙税。

（编者注：作者系爱国民主人士、麻城县原副县长、政协副主席。他说，内容“是本人耳闻目见的”、“亲身经历的”、但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其议论或者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编者）。这是自谦，也是作文字工作者的诚实。虽为一家之言仍是一篇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作者手稿是老教师吴树威于“文革”末期在某处纸篓内偶得，于是珍藏之。十多年后荐给市政协文史委。经编者与市政协常委、市教委副主任屈锦涓，本委成员、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程敬顺联系后，由程敬顺提供了教委档案中的打印稿。两稿对照，内容完全一致。此文按打印稿排印的。）

杏花村在麻城

汪乐山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写的七绝《清明》，脍炙人口，历来受人称道。但诗中的“杏花村”却众说纷纭，或云在山西的汾阳，或云在安徽的贵池。其实，这“杏花村”却是在齐安（湖北黄州）的麻城县古镇歧亭之旁。

歧亭处于洛阳至黄州的要道上，是南朝以来的古城，据光绪三年编辑的《麻城县志》载，这里于宋文帝元嘉中，置赤亭县，梁置歧亭县（为十八蛮县之一），“古赤亭后为歧亭，在光黄之交，为守淮重镇。”还载《唐书·地理志》云：“麻城属黄州齐安郡，本隋永安郡，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以县置亭州。”又《读史方輿纪要》云：“歧亭在县西七十里，齐梁间为歧亭县，亦为蛮县之一，今为歧亭镇。明嘉靖中初设郡丞于此。”《黄州府志》载：“武德三年，以县置亭州。又析置阳城县。八年州废，归阳城县。元和三年（按应是建中三年，即公元783年），归入黄冈。建中三年（按应是元和三年，即公元809年）复置。宋因之。元属黄州路。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折姜家畝地置黄安县治。”由此可见，古镇歧亭历来是政治、经济、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仍扼守汉麻公路，处于麻城、新洲

(原属黄冈)、黄陂、红安四县交界处。《黄州府志》还载：“杏花村在歧亭，有杏林、杏泉，陈季常隐居处。”杏花村在歧亭镇北五里处，因是交通要道，杜牧过此赋诗，是很自然的事情。

杜牧是否到过这里呢？有诗为证。请看《题木兰庙》：“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这是杜牧任黄州刺史时登木兰山（当时属齐安郡，今为武汉市黄陂县）为木兰庙所题的诗。杜牧从黄州到木兰山，或由洛阳至黄州，都必定经过歧亭，必定经过杏花村。杜牧清明雨遇雨，想借酒消忧解乏，正是这里。宋代苏轼请迁黄州，也曾路过这里，与隐居在杏花村的故友陈慥邂逅。

杏花村是有“酒家”的。这里流传的民谚云：“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头有美酒，店里有美人。”据《麻城县志前编》（卷之三）载，这里的酒是与众不同的“水酒”（又名“黄酒”）“纯以糯米酿者，其曲内无血肉品，故酒味最醇。漉净余滓，入瓷瓮固封贮之，经年色黄，味尤美。”这种酿酒方法流传至今，是麻城特有的美酒。还有民谚称赞：“伏汁酒（即黄酒）比木炭伙，过了黄帝便数我。”意思是冬日围炉饮黄酒，是仅次于皇帝享受的乐事。据《复斋漫录》记载，就在杜牧到杏花村之后的二百三十年左右，宋代词人谢无逸也路过这里，并于杏花村驿壁题《江城子》一首：“杏花村里酒旗风，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这与“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景色，是何其相似啊！

杏花村因有美酒，且风景幽美，山青水秀，故宋代“使

酒好剑”“喜蓄声伎的陈慥，“弃车马，毁冠服”，迢迢寻来，隐居至终。这正如苏轼在《方山子传》（见《古文观止》）中所反问的“独来穷山中，此岂不得而然哉！”陈慥选中此地，不是没有道理的。当苏轼在杏花村见到陈慥后，两人来往甚密。苏轼在不少诗词中描写了他们饮酒的情状。例如，“野店初尝竹叶酒，江云欲落豆蔻灰”（《歧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正月二十日往歧亭郡人潘哲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按：女王城在歧亭北六十里的浮桥河）；“谁是濮阳公子贤。饮酒食肉自得仙。……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风颠”（《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另《歧亭五首》中的其四云：“酸酒如齏汤，甜酒如密汁。”这“酸酒”、“甜酒”正是麻城特有的“黄酒”，若酿法不对，便有酸味，若仅小曲酿造，又不封贮，便是甜味。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就可想见，当时杏花村酒品种之多，其味之美。倒转二百三十余年的清明节，杜牧行路问酒，牧童必然会指告“杏花村”的。

至于“杏花村”是在山西汾阳之说，是不足为信的。虽然汾阳杏花村产名酒，但汾阳的清明日，气温尚低，不可能有青草放牛。而杜牧《清明》诗中有“牧童遥指”句，显然不是这里。处长江流域的齐安麻城，清明时正萌发青草，适于放牛。这里的民谚云：“清明放半饱，谷雨放圆膘。”正因为青草生长还是初期，牛只能吃半饱，所以在“雨纷纷”之中，也还有“牧童”放牛。当然，此时的安徽贵池也正是放牛季节，为何诗中的“杏花村”也不是指那里呢？这从诗的本身也可以分析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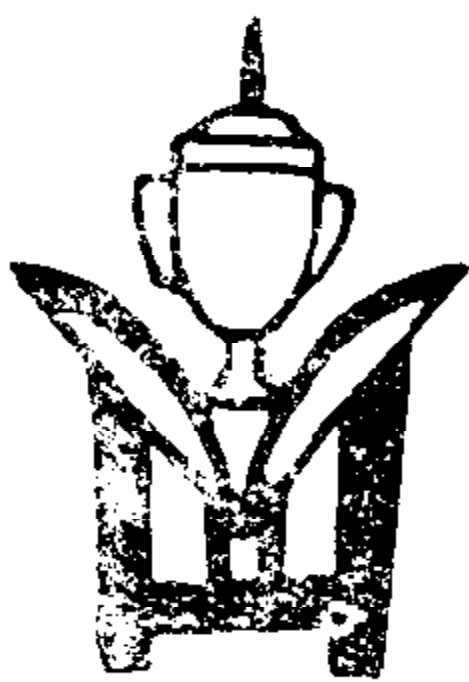
杜牧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因受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外放为黄州刺史。他渴望刷新朝政的宏图壮志无法施展了。由此而产生的苦闷、孤凄的心情,从《清明》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如果说这种情绪在他“平调”池州后仍未消除,那么,《清明》中所表现的长途赶路的疲惫感,则是过池州杏花村时所不曾有的。请看《唐诗鉴赏辞典》上周汝昌教授的分析吧:“‘断魂’,是竭力形容那种十分强烈、可是文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在古代风俗中,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而今行人孤身赶路,触景伤怀,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又平添了一层愁绪,因而诗人用了‘断魂’二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孤身赶路,长途跋涉,精神疲惫,在贵池仅只一次,即从黄州调往池州的那一次。可是,杜牧调池州是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的“穷秋”(深秋),而不在清明,这有他的诗《秋浦途中》为证:“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秋浦即贵池,这是他长途旅行至贵池的情形。到贵池后,即使于某清明节外游过杏花村,其路程很近,因杏花村就在贵池西郊一公里处,故不会产生“断魂”之感,也不会孤身冒雨赶路。杜牧无论是初调黄州,或从黄州去木兰山,都必须经过歧亭,且都是长途旅行,因歧亭距黄州一百七十余里,距光州就更远了。又在黄州与木兰山之间,距木兰山五十余里。长途赶路,孤身遇雨,必然劳累,“断魂”之感也就油然而生了。想借酒解乏,路问牧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据此分析,《清明》诗当作于

歧亭道上，诗中的“杏花村”，也就是指歧亭旁的“杏花村”，也因如此，引来后代帝王对歧亭的杏花村的关注。清代乾隆皇帝大下江南时，特别到此游览，并御赐“杏花古刹”巨匾于其庙，咸丰时，朝令再次修复杏花村，美化祠堂，扩建杏林。后来，多遭劫毁，碑石大部散佚。但是，那里风景依然秀丽，陈慥等人之墓尚存。仔细观察，当年盛况，依稀可辨。

（转载湖北大学《中学语文》八六年第8期）

《社会科学动态》90年第6期

附注：1991年4月19日文汇报和1992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均摘刊了此文主要论点，介绍了麻城杏花村。



麻城境内的史前文化遗存

江益林

麻城人民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在远古时期，这里的先民们就用他们的汗水浇灌了这片天地，为开创华夏文明贡献了一份力量。下面简略地介绍一下我市境内发现的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

一、地形特征和发现的主要遗址

麻城位于鄂东北，介于江、淮间，北依大别山，南眺长江水。总面积3747平方公里，年降水1500毫米以上，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适宜于人类生活和发展。地形为东北多崇山峻岭，西南多丘陵平川。主要河流是发源于黄蘗山、龟峰山的举水河，河水自北南流纵贯全境，经新洲县注入长江。在举水河及其支流两岸形成了宽阔的冲积带和二级台地，在这些依山傍水、避风向阳的二级台地上，便是古代先民们生活的乐园。因此，我市境内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举水河及其支流两岸的二级台地上。在东部的巴水上游也有一些发现。

1984年，我市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文化普查，收获巨大。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八十余处，尔后在田野调查中又有一些新

的发现。在发现的这些古文化遗址中，包含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古文化遗址不下五十余处。这些遗址的分布沿举水河从下游向上游发展，由主河道向支流延伸，几乎遍布我市全境。其中保存较好，内涵丰富或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歧亭镇的南门外遗址、谢家墩遗址及后岗遗址，宋埠镇的罗家墩遗址，中驿镇的红庙寨遗址，闵集乡的王扒墩遗址，南湖办事处的吊尖遗址，松鹤办事处的栗山岗遗址、余家寨遗址，古楼办事处的万人墩遗址，长岭岗乡的土城遗址，黄土岗镇的女儿墩遗址，西张店乡的土城寨遗址，王福店乡的墩子遗址以及木子店镇的丁家坳遗址等等。上述遗址除谢家墩后岗遗址、栗山岗遗址经正式发掘外，其余均为地面调查资料。1984年，谢家墩后岗遗址被良种场砖瓦厂取土破坏，湖北省博物馆和我市博物馆对其抢救发掘了140平方米。198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地、市博物馆一起对栗山岗遗址发掘了500平方米，获得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科学考古资料。

二、遗物特征和文化性质

通过考古发掘和地面调查，获得的一批考古资料，基本上反映了我市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特征和性质。

遗物标本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生产工具包括农业生产工具，狩猎、捕鱼工具，纺织工具，制陶工具以及磨制石器的工具等等。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器形主要有：斧、铲、锛、锄、镞、刀、凿、镰、锥、砺石、石球、网坠等，石器多经磨制或琢制，有的小件器物磨制十分精致。其

它质地的生产工具以陶制的纺轮、陶拍为多见，还有骨、蚌制的针、镰等。生活用具包括炊器、储藏器、装饰品和乐器、工艺装饰等等。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陶器早期多为手制或经慢轮修整，晚期多为轮制陶。炊器和盛食品主要器形有：鼎、鬻、甑、碗、钵、豆、盘、盆、杯、器盖、器座等。储藏器和盛水器主要器形有：瓮、缸、釜、壶、瓶、罐等。装饰品有陶制或石制的环、珠、球、簪管等。还发现了乐器陶埙和一些陶制动物模型装饰。

发现的遗迹有灰坑、灰沟，多数遗址有用于建筑的红烧土块，还发现有较完整的红烧土建筑居面，用红烧土堆筑的房屋散水等遗迹。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墓葬和动物骨骸。

从上述遗物遗迹的特征分析，我市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遗存，目前仅见于举水下游的歧亭南门外遗址，宋埠罗家墩遗址的早期遗存，其陶器特征以泥质红陶或橙黄陶为主，有的陶色为内灰外红，有的在器表饰红衣或紫红彩而不着其它花纹装饰。是本地区较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许多特征近似中原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这类遗存在黄冈、黄陂亦有发现，其分布和源流都还在研究探索之中。第二类遗存为屈家岭文化，见于歧亭南门外遗址、谢家墩及谢家墩后岗遗址、宋埠罗家墩遗址、中驿红庙寨遗址等，经发掘的谢家墩后岗遗址第三、四层为屈家岭文化层。栗山岗遗址中虽无确切的屈家岭文化地层，早期遗存中却有十分浓厚的屈家岭文化因素，说明这里已是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东部边缘地带。第三类遗存为湖北龙山文化（或称石家河文化），凡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含此类遗存，陶器以灰陶、灰黑陶最多，夹砂陶多于泥质陶，器表装饰以蓝纹、弦

纹、窝纹和镂孔为主。盛行一种侧装三角形足有的在足根饰按窝的罐形鼎。湖北龙山文化是继承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的，已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我市所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地层也都被湖北龙山文化地层所叠压。

这三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与江汉地区的同类遗存有着较多的同一性，说明这里的先民仍属江汉系统的民族部落群体——苗蛮集团。但是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因为在史前时期，大别山地区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的交汇地区，位于大别山南麓麻城境内的苗蛮先民，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华夏、东夷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中原的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以及薛家岗文化等诸考古学文化的某些特征，都或多或少地在这里反映出来。

三、社会发展阶段的初步分析

麻城目前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原始社会后期至末期的文化遗存。其时的社会经济形式已发展到以农业种植为主。生产工具大都经过磨制，有的器物磨制得十分精致，说明农业生产已相当成熟和具有一定规模。同时生活用具中，大量的饮酒器和储酒器的出现，说明饮酒之风已盛行，已有不少剩余的粮食用于造酒，也间接证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从出土的网坠和箭镞等工具证明捕鱼和狩猎仍然是原始农业的必要补充。家禽家畜的饲养也已经开始。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表现在纺织业和陶业的高速发展上。在陶制生产工具中以纺轮出土最多，其形式不

同，大小各异，有的装饰以精美的花纹图案，这些不同形制的纺轮应是由纺织过程中的工艺需要决定的，可能出现了粗纺和细纺，说明纺织手工业已有相当的专业化程度。陶器制造从手工模制、泥条盘筑发展到慢轮修整和快轮制陶，器物造型趋向规范化，大型器皿、瓮的制造和小巧精美的蛋壳彩陶磨光陶的烧造，都说明先进的陶制工具快轮制陶逐步应用于制陶生产，而且产生了技术高超的专业制陶工人。从发现的建筑遗迹和坟墓葬俗分析，已有了多间式的地面房屋建筑，出现了夫妻合墓和家族墓地。说明以父权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已经建立。这是原始社会晚期父系氏族繁荣阶段的社会状态。屈家岭文化中发现的陶祖，即是父系氏族社会男性崇拜的直接物证。这个时代就是古代中的传说时代，即炎、黄、尧、舜、禹的时代，已看得见文明时代到来的曙光了。

1991年4月



麻城建置沿革概述

市台垮事务办公室

麻城市位于湖北省东部，大别山中段南麓。地处鄂东、豫南、皖西交界处。南北最大距离82公里，东西最大距离76公里。北与河南省的新县、商城县以山脊为界，东北同安徽省的金寨县依界岭分水，东抵罗田，南邻黄冈、新洲，西连红安。全市版图面积为3747平方公里（合561万亩），约占湖北省总面积的2%。

麻城市地处南北公路交通要道。往北经河南省的潢川、信阳，可达郑州、北京市；往东经安徽省的六安，可到合肥、南京、上海市；西南至湖北省会武汉市130公里，南距黄冈地区行署所在地的黄州市127公里。

麻城市是连接鄂豫皖三省的要冲和纽带。其经济地理位置处在安徽省的合肥市、河南省的郑州市、湖北省的武汉市所组成的中原大三角经济区域的中心地带，又与河南省的信阳市、安徽省的六安市连接成小三角经济区域。既是湖北省武汉、黄石、鄂州等城市向大别山区辐射和吸引的窗口门户，又是三省交界地区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集散中心。

麻城市区分设鼓楼、龙池桥、南湖、松鹤四个街道办事处。人口为10万人，非农业人口占35%。全市行政区划辖12镇（中馆驿、浮桥河、宋埠、歧亭、白果、夫子河、阎家河、

张家畈、木子店、三河口、黄土岗、福田河)。21乡(闵家集、喻家河、冯家凉亭、铁门岗、麻溪河、牛占鼻、龟山、熊家铺、盐田河、蔡店河、木栖河、东古城、张广河、平斗山、长岭岗、两路口、王福店、乘马岗、顺河集、西张店、罗家铺)。还有三个国营农、茶场(宋埠良种繁育场、龟山茶场、林店茶场)。三个大型水库管理处(浮桥河、明山、三河口)。全市共有26万户,108万人,约占湖北省总人口2%,人口密度为297人/平方公里。

麻城之名始于东晋,因后赵石季龙派战将麻秋筑城而得名。此前数千年,麻城即已开发。据《禹贡》记载,麻城在夏商及西周时属荆州地域,春秋战国时为黄冈领地。后楚灭黄,遂属楚。秦设邾县,隶属南郡,汉置西陵县,属江夏郡。后屡经变革,至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始置麻城县,隶属永安郡,唐时改置亭州,又置阳城县,仙居县,后仍改为麻城县。五代和宋、元、明、清沿袭之。民国初,麻城县隶属鄂东道,旋改江汉道。民国21——38年(公元1932年——1949年),先后属湖北省第四行政监察区,鄂东行署,第二行政监察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麻城县隶属于湖北省黄冈地区。198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麻城县,建立麻城市,结束了1388年的县治历史。仍隶属湖北省黄冈地区行政公署。

麻城市峻岭环列,屏蔽江淮,古五关翳锁,为四固之区。旧志称“北控天中,东引吴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春秋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这里曾爆发过载诸史册的吴楚柏举之战。三国时,曹魏曾戎兵西阳(今麻城),以御孙吴。后吴大将陆逊率兵以西陵

(今麻城)为国之屏藩。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侵夺兼并,各创霸业,大战达十二次之多。南宋期间,金兵两度犯五关,拔麻城,后忽必烈渡淮南侵,经麻城进犯江南。历代农民起义也以麻城为依托,同官军抗衡。元末的朱元璋、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代太平天国首领陈玉成、李三王、陈得才和捻军将领赖文光、张宗禹、龚得树等,都在麻城留下了鏖兵的遗迹。

麻城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武装斗争从未间断。先后有13.7万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记载在册的革命烈士一万余人。抗日战争初期,麻城属第五战区,是武汉保卫战的前沿。李宗仁曾设司令部于宋埠镇,蒋介石先生亲临宋埠镇视察,郭沫若两度带队来宋埠宣传抗日主张、慰问前线战士。李宗仁指挥军队在麻城与河南接壤的小界岭青山沟阻击日军南下,同日军展开血战,终因日军绕道江西九江、溯江而上,武汉失守。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在麻城辗转战斗,留下许多光辉的业绩。在历次革命斗争中,麻城人民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振兴作了巨大的牺牲和可贵的贡献。

湖北省麻城市“八景”简介

范志斌

麻城市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中段南麓，地处鄂东、豫南、皖西交界处。全市版图面积3743平方公里，人口108万。麻城之名始于东晋，因后赵石季龙派战将麻秋筑城而得名。汉置西陵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始置麻城县。198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结束了1388年的县治历史。

麻城“八景”成名已久。据明代《黄州府志》和清末《麻城县志》记载，“八景”为：龟峰旭日、白泉飞泉、麻姑仙洞、万松古亭、桃林春色、柏子秋荫、凤岭朝云、龙池夜月。民间有八景诗流传云：

龟峰旭日报天明，道观烟霞万树倾。

定慧海棠香十里，龙池夜月照三更。

桃林春色风光好，柏子秋荫气味清。

瀑布流泉供远眺，麻姑仙洞唱幽情。

随着历史的变迁，“八景”中有存有废，有兴有衰。新的景观亦在天然与人工的巧妙结合中，逐渐形成，景点逐渐增添。下面就古时“八景”分景简介。

一、龟峰旭日

“龟峰旭日”因龟峰山而得名，系麻城八景之首。龟峰

山又简称龟山，位于市东30公里。此山高峰磅礴，最高峰海拔1250米。山南顶峰有一块突兀高耸的巨石，酷似龟头；中部的薄刀峰酷似龟背；北部的山峰翘起，直指云天，形同龟尾，故名。此山地貌奇特，景象万千。尤其是龟头，雄秀异险，古木葱笼，幽深宁静，悬岩峭壁，如削如劈，各具形态。最高峰的巨石，高耸挺拔，一峰独秀，恰如昂首向天的巨龟，相传系一神龟所变。

“龟峰旭日”是指每当秋高云淡，登龟峰顶望江汉如匹练，尤以凌晨观日出为奇。但见扶桑动摇，海水吞吐，金蛇万道，射目荡心；少顷，红日高悬龟头，继而徐徐上升，云蒸霞蔚，五彩缤纷，恰似泰山之观日出。古今游览者无不以登龟头为快。

龟峰山顶原有座“化主庙”，又名“能仁寺”，鄂东名刹，宋代建筑。其庙门柱上对联为：“名山名刹名僧，此日名传原是龟峰名胜境；古寺古人古圣，当时古迹俨然天竺古能仁。”相传为魏曹操撰写。现在此庙已毁，在原地修建了电视转播台。

对“龟峰旭日”景观，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瑰丽诗篇。仅录其一。昔邑人郭兆春诗云：

鞭策六鳌乘天风，来登龟山第一峰。
龟山老僧眠未醒，四更月挂楼前钟。
峰高月黑不可辨，俯视一气青蒙蒙。
天鸡一唱海水荡，红云莽莽扶桑东。
长鲸夜吼三千丈，龙清浴血摩苍穹。
玉皇大启黄金阙，百灵百怪相追从。
天吴海若夜甜战，火珠飞出蛟龙宫。

又如谷王斗侈靡，珊瑚万树何熊熊。
秦皇振鞭万山赭，一一开遍红芙蓉。
千年老鹤梦惊醒，万道烈火烧长松。
观音悬崖马迹石，烛照历历幽熊穷。
黑龙白龙井水碧，电射井水碧成红。
大瀛风回狂澜紫，赤霞高标千万重。
江朝江水助浣漾，潇湘仙子骑长虹。
泰山日观最奇绝，得此宝剑双成龙。
荡心骇目难久瞰，坐石小憩云蟠胸。
奇观既毕下山去，孤磬一声天地空。

二、白泉飞泉

市东25公里处，有座白鸭山（原名白泉山），海拔716米。古时，有白果、白泉、白棠三兄弟来此谋生，因老二白泉定居山上，故名白泉山。又因当地流传“白鸭金街”的故事，又名白鸭山。山东蒲城有长方形石台平坦如席，系明代禅师释道一传经处。每天早晚率徒念经，群雁纷纷落下集聚聆听，故称“雁台”，系麻城“三台”名胜之一。雁台下是绝壁，泉从罅出，稍下为石所截，激怒有声，喷玉溅珠，不可遏止，飞向半空，千丈一落，诚奇瀑也。昔人顾景星诗曰：

云破碧嶙峋，沿溪屡问津。
乱泉晴似日，白石远疑人。
康乐非无屐，华阳亦有巾。
平生乐山水，偏与困风尘。

邑人郭兆春诗曰：

匡庐奇峰惜未游，名山芳巖悬千秋。
松岩偃蹇倒挂壁，突突兀兀云翠虬。
仙踪道一杳何在，藓花埋塔空荒邱。
青天白云坐甫定，忽然风声雨声雷声飒飒争奔流。
初疑高僧施狡狴，玉龙戏舞青山头。
又疑仙人来接引，梯悬匹练长不收。
或如壮士吐奇气，白虹万丈贯斗牛。
或如侠客送神妙，倚天长剑斩白猴。
或倒珍珠簾，或射水晶球，
或蜿蜒而下折，或喷瀑而上浮。
巨灵仙掌擎寒华，掌上明珠无数投。
黄河落天走东海，大小虽殊气象侔。
倒倾巫峡泻不已，令人对此惊双眸。
枕石高眠幽兴足，夕阳钟打藏经楼。

三、麻姑仙洞

麻姑仙洞位于市西北6.5公里，五脑山（麻城名胜）主峰北山腰上。相传后赵将领麻秋奉命筑城，十分暴虐，迫使民工每天天亮开工，深夜鸡鸣收工，民工怨声载道。麻秋之女麻姑倍加同情，入夜不久即学鸡啼，引动全城群鸡应和，民工得以安息，日久被其父得知，欲严惩麻姑。麻姑闻讯，逃到此洞修道。后在城北石桥上飞升。后人将此桥取名为“望仙桥”，洞名“麻姑仙洞”。

麻姑仙洞洞口上伸出一巨石掩盖洞口，状和梯形，上宽

4米，高2.8米，深8米。洞口砌有长3.35米，宽1.3米，高2.25米石质供台，建有牌坊一座，以供奉麻姑，明人在上刻“麻姑仙洞”四字。供台后面，泉水清冽，终年不枯。洞口台上15米处有一平台，相传为麻姑梳妆台。洞周围松青竹翠，水抱山环，浓荫覆地，溪曲峰环，步步入胜，风景十分优美，每当春夏，游人络绎不绝。邑人蔡撝谦诗曰：

落落孤標皎皎姿，藐姑山畔恰相宜。
懶將娇艳投時好，郑重冰心向玉墀。
雪滿仙亭嶺寂候，月明古洞蘊含時。
淡中自有非常味，不到調羹未許知。

邑人余应云诗曰：

香云繚繞凤台巔，壺峽移从海国天。
出郭好寻仙掌路，沿溪采访惠山泉。
金支翠羽中閨夢，綉佛青灯石室禪。
此亦仙坛应有记，倩谁书壁字如椽。

四、万松古亭

亭在古县城西七里，昔宋邑令张公毅植松万株于西冈，立亭其间以观风，苏轼赴黄州时过此，有诗且以名其亭。因时代久远，陈迹湮没。苏轼诗曰：

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
县令若同仓廩氏，亭松应长子孙枝。
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那怜冰雪姿。
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起角弓诗。

五、桃林春色

桃林在市东十五里之桃林河，两岸多桃花，绵亘十余里，居民村巷，罗错其间，桃花盛开，红霞如锦，茅檐竹舍，掩映芳华，宛如武陵人之所适。诗人朱桂荣有诗云：

举水东来锦浪生，桃花夹岸映春晴。
青溪簇簇开无主，碧树年年赏更新。
十里仙源无树路，千寻潭影故人情。
风光不减河阳县，林际红霞照眼明。

六、柏子秋荫

此景在柏子塔，故名。柏子塔位于市东北十公里的九龙山上，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用为镇龙压邪而造（因其传奇政事太长，略）。塔高九丈九尺，其顶覆以铁镮，有柏树盘生于中，每于立秋日午时，塔四面无影。夙传中洲有塔，每日中无影，论者谓土圭正景之义，兹塔独于立秋日无影，实为异事。昔宋祖法有诗云：

群山气象新，表表立千寻。
不识亭松路，犹瞻剌柏松。
有心来日午，无影问秋荫。
石上徘徊久，飞花一寸深。

邑人郭兆春诗云：

孤塔势峻嶒，丹青插几层。
虬枝蟠老柏，鹤梦落清藤。

秋至日无影，石尖云起棱。
斜阳一寻眺，何处问高僧。

七、凤岭朝云

凤岭在市西北十余里，麻姑仙洞之侧。相传有凤聚此，朝曦未升，晨霞初启，晴丝云缕，若烟非烟，可与巫山神女峰比美。邑人朱桂荣留诗云：

何年威风舞祥晖，岭上云犹五色飞。
千仞日华赓纠缠，九苞霞彩览光辉。
桐花不隔丹青路，絮帽长留翠黛围。
化作甘霖供世用，漫随野鹤去忘归。

八、龙池夜月

龙池又名黑龙池，在老城三里许（现在新城区龙池桥办事处辖区内）。池水清澈如碧玉，每值夜水轮涌，皎洁异常，人立池旁，清鉴毛发，俨居玻璃世界。邑人朱桂荣有诗云：

静夜天心月到迟，蟾光皎皎映龙池。
澄波如镜方安卧，嘘气成云会有期。
皓魄无声频跃鲤，灵珠共证孰探骊。
盈盈三五饶青气，雷雨飞腾又一时。

（根据《黄州府志》、《麻城县志》、《麻城县简志》
综合整理）

五 脑 仙 山

李德望

出麻城市往西北行四公里便到了五脑山。相传帝主从龟峰山来到这里，遇一山主，想找一块山地落脚，山主问他要多大地盘，帝主脱下身上的道袍，说，就这道袍铺块地方就够了。山主满口应允。结果铺了五个山头，故名五脑山。五脑山总面积为8平方公里。主峰霸王寨位于山中心，海拔343米。漫山松杉遍野。浓荫遍地，是游览避暑的胜地。五脑山周围，纵横十余里群山起伏，犬牙交错，崎岖曲折，高矮得体。幽谷里的清泉淅沥，斜坡上的怪石嶙峋。翠影红霞，云悬雾壑；雉飞兔起，百鸟争鸣。四季花香令人陶醉。尤其千姿百态，妙趣横生，仙气十足的仙踪仙迹，如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有“磨钱石”、“系马桩”、“凤凰池”、“霸王寨”、“狗钻窠”、“梳妆台”、“白云台”、“丹凤岭”、“藏狮洞”、“笔儿尖”、“油穴”、“盐穴”以及麻城八景中的“凤岭朝云”和“麻姑仙洞”也环抱在内。最稀罕的古迹是东汉末年曹操亲笔为水军都督毛介题写的“万古高风”四字遗址，亦列于五脑山之颠。山麓，还有“蛇形地”、“龙困桥”、“白塔河”、“红石堰”、“九狐冲”、“鹿野庵”。诸如市区的“儒学”、“鼓楼”、“龙池”、“义井”、“考棚”、“七里桥”和

现代建筑烈士陵园、博物馆等，都与五脑山比邻。山中，时而烟迷霄汉，时而彩焕云衢，忽雨忽晴气候多变。游客站在山上，早晨向东远眺，可以瞭望龟峰旭日。夕阳西下，近可以观赏凤岭参云。大名鼎鼎的“桃林春色”、“柏子秋荫”和“瀑布流泉”亦遥遥相望，五脑山的雄貌，堆奇积异，天造地设，不假斧凿而妙自天成的洞天福地，令游客大开眼界，飘飘然恍若出世登仙。五脑山的各个仙境，都有神奇故事流传于世。

五脑山，还有南北对峙的古庙，北庙名曰近月寺，东晋时建造。南庙乃帝主宫殿，始建于北宋道教兴盛时期。

五脑山已被列为麻城市的游览区，正在开发建设中。

五 脑 山 帝 主 庙

五脑山南有一座帝王庙，又名天星观，历来是道教的活动场所。自北宋建庙以来，几经沧桑，屡废屡兴。现有庙观，系清嘉庆丙辰年（公元1796年）重修。庙群建筑分为一亭（静心亭）、二门（一天门、二天门）、三宫（紫微宫、玉清宫、威灵宫）、四殿（拜殿、帝主殿、祖师殿、娘娘殿）。另有斋观、凉亭、宿舍、厨房等。周围山环雾绕、气势磅礴、茂林修竹、环境清幽。

考五脑山庙史。始建于北宋道教兴盛时期，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县志载，历史上有两次大维修：一次在明嘉靖年间，一次在清嘉庆年间。单就后一次维修，捐资遍及南方各省，尤以四川、云南甚巨。五脑山庙鼎盛时期，有道徒四十多人，庙观住持刘崇涵，募化四方，维修了静心亭、一天门

和正殿，扩建了边楼、饭堂等，并在庙观四周栽花植树，使五脑山庙环境幽静、古雅，一时名噪湖北，与道教名山武当。木兰常有往来，颶风朝拜的香客，广及四川、云南、贵州、江西、湖南诸省，每日不下千人。并在汉口永清街募资购置了佑圣观，作为道友联络的据点。

五脑山庙所奉之神，为紫微侯张瑞。据传张瑞系三国时西蜀车骑将军张飞转世。旧志载：“神宋时降生西蜀壁山县张氏，行七，世称张七相公……年十七，历游至麻城，见民间多淫祠，尽毁之，祠主诉官，系狱三年。值邑中火灾，神自知厄满当出，使白邑令，以能禳解。释之，跨乌骓，执朱挺，指火火灭。遂西行至相公桥，人马飞升，见者见其止于五脑山，遂立庙山麓，以祀之。……宋封紫微侯，明封助国顺天王，嘉庆敕封灵感。”

五脑山地踞鄂豫皖三省要塞，为鄂北咽喉，东挹龟峰，接大别山之奇，南收江汉，挽四乡之秀。西北一带，雾锁群峰，空蒙浩荡，气合惊雷。加之庙观建筑雄伟，拔地凌空，峥嵘绚丽，彩焕云衢，确有威摄八方之势。至于风雅情趣，则有踞虎之雄，有登高之旷，有洞壑之幽，有清泉之脆，有出世人世之感，有沧桑之慨，景致递增，态势纷然。观乎五脑山，山高而不险，气湿而不潮，离闹市近而不烦躁，立于五脑山上，市区的山水风貌尽收眼底。晨观旭日，晚看斜辉，场地开阔，心旷神怡。附近道观，麻姑仙洞、近月寺、鹿野庵，衬托着帝主庙，显得格外壮丽雄伟。以至数百年来，清幽繁雅皆成，文武礼乐具备，文人墨客，豪商巨贾，纷至沓来，实为一方之福地也。

麻姑仙洞(近月寺)

麻姑仙洞位于市西北6.5公里，五旗山山腰的东北山腰上，相传后赵将领麻秋奉命筑城，十分暴虐，迫使民工每天天亮开工，深夜鸡鸣收工，民工怨声载道。麻秋之女麻姑见民工疲于奔命，倍加同情，入夜不久就学鸡啼，引动全城群鸡应和，民工得以安息。天长日久，其父得知此事，下令捉拿麻姑严惩，麻姑闻讯，逃到此山洞修道。后在城北石桥上飞升，后人将此桥取名为望仙桥，将麻姑修道的仙洞取名为麻姑仙洞。

麻姑仙洞洞口上伸出一块巨石掩盖洞口，状如梯形，上宽4米，高2.8米，深6米，洞口砌有长3.35米，宽1.3米，高2.25米的石质供台，建有牌坊一座，以供奉麻姑，明人在上刻有麻姑仙洞四字，供台后面，泉水清冽，终年不枯，洞口上15米处有一平台，相传为麻姑的梳妆台，周围松青竹翠，水抱山环，浓荫覆地，溪曲峰环，步步入胜。风景十分优美，每当春夏，游客络绎不绝。

麻姑仙洞下延，深邃的林荫之间，有座古庙，名曰近月寺，为东晋时建造。因寺旁有一井，每当月出，井中现出月影，故名。此庙栋宇古朴，地隔尘寰，梁柱飞丹，壁画精彩，与庙外苍松翠竹相映成趣，雅静清幽，历代墨客骚人吟诗赞叹不已。

玉阁钟神秀 庙宅气轩昂

刘昌珍

在宋埠北十公里，宋——龙公路东侧，有一座高山——玉阁山，海拔157米，东临浮桥河水库，西有尾斗山水库环绕，山势奇特，陡峭险峻，树木丛生，怪石林立。山巅有一座古庙，庙内长年香火不断，游山拜佛者络绎不绝。庙宇为块石结构，石条为柱，石块为墙，石板为瓦，呈双层宫殿式建筑。庙内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如八仙图、蛟龙图、骏马图、对奕图等，形象生动、逼真、传神，游人赞不绝口。每当万里晴空，天高气爽，登斯阁楼，极目远眺，几十里外的红安、中驿、宋埠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玉阁庙始建于唐，重修于清咸丰，每年正二月，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庙内建有一阁（玉皇阁）、二殿（大佛殿、娘娘殿）、三堂（百子堂、厅堂、饭堂）。传说在建庙之时，日砌夜塌，工匠不知其故，正在疑虑之际，忽有一白胡子老头飘然而至，工匠忙问其故，请求指点，白胡子老头笑道：“老朽年事已高，已是土没其颈之人。”说完，便挥袖隐身而去。后来，工匠得神仙指点，砌一层石，筑一层土相披，才得以建成，留于后世。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据说玉阁庙顶有一棵约2.5米高的铁树，古庙的太佛殿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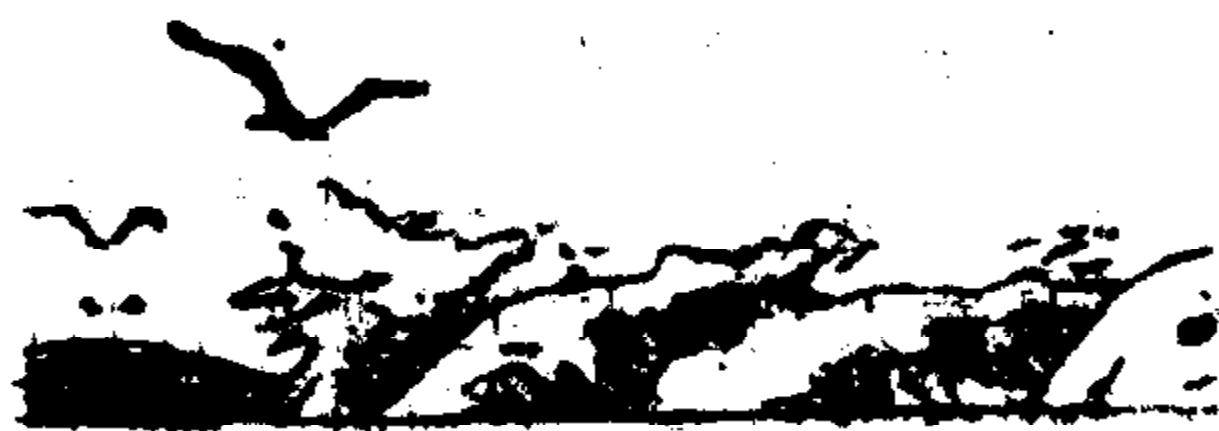
一口径约为70公分的水井，井内有三条龙。当地黎民百姓每年腊月三十日要去庙内井中取水，以治病除邪。由于井小龙多，三龙竞相要走，闹得玉帝五心不定，便许下诺言：铁树开花日，当为出井时。后来，清朝有一地方官，峨冠博带，在侍从的簇拥下前去求神拜佛，为烧香跪拜方便，脱帽挂于铁树叉上，顿时井水翻花，一龙竟出，官人大为惊异，不知所措，庙内和尚指帽道破机关，侍从便取下官帽，井水才得以平静。后来，铁树未开花，二龙便困于井中。娘娘殿更是善男信女跪拜的胜地，每年正月，远近很多许愿者前去娘娘殿中“摸鞋”许愿。传说，殿中有红绿两色鞋，许愿者许下愿后，便去“摸鞋”，以求生男生女。若是摸着红色鞋必定生女，若是摸着绿色鞋必定生男。待婴儿降生人世，便送同色鞋一双殿中，以报谢娘娘之赐。百子堂中有泥塑童孩百人，或卧或立，或行或止，或笑或哭，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游人赞叹不已。这些美好神奇的传说，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晶，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

玉阁山风景秀丽，景象万千，每到春暖花开之日，白雾缭绕，鸟语花香，是游人观山水的圣地。昔日板栗成林，竹子遍野，还有稀有的银杏树供游人观赏。如今，杉树林立，松树竞秀，四季青树常青，野花飘香四野，心旷神怡。猴洞（大圣洞）、大鹰洞、张口石、狮子头、百萝凹、大炮台等，更是充满了神奇的传说，千姿百态，令游人流连忘返。

玉阁山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清末黄品龙、李占槐为抵御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队，在玉阁依山势修筑了两道古城（外城长约2000米，内城长约800米），易守难攻，许多起义军壮死如此。大革命时期，1932年1月国民党十三

师一个团驻扎山上，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赵次吾率部围攻，由于泄密被偷袭，阵亡兵败，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

解放后，年久失修，加之人为的破坏，1952年彻底毁城，只剩下绝垣残壁，聊陈古迹，供人凭吊。



大别山里吊锅香

周书安

木子店位于大别山腹地，隶属革命苏区麻城。四面环山，山上是清一色木子，不生别树。春末夏初，木子花开遍山野，把整个山乡装点成一个银色世界，香飘十里，木子店因此而得名。

木子店冬季很冷，为取暖，家家户户都砌有火塘，火塘里日夜不息地烧着，天长日久，那带着泥土气息的轻烟把整个屋子熏得漆黑如墨。屋梁上垂下吊锅，就自塘火，一锅一绳一根，简单灵巧方便。在冬季，尤其是下雪的日子，坐在火塘边，烤着火，吃着吊锅，喝着地产老米酒，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涌上心头，那种温馨，那种宁静……

山里人实在。招待客人不用十菜八汤，而是将所有的菜肴一锅烧煮。萝卜白菜，猪肉豆腐，一层一层地埋在锅里，红绿相间，百味相杂，似火锅又不同于火锅，别有滋味。

吃吊锅还有讲究。一是讲究手功，右手执筷，左手同时拿酒杯和汤匙，做到酒不洒汤不滴才见功夫。二是讲究吃法，要由表及里一层一层地吃，不能在锅里乱翻。下筷时，要轻轻地夹住看准的食物，劲用大了吊锅左右摇摆，既夹不住食物，又不雅观。

(范志斌摘自1991年6月30日湖北日报)

麻城“五脑山”纪游

台湾 王忠顺

笔者，曾多次回乡探亲过，每次动身前，纪事本上总是列有游“五脑山”胜景。然而，回乡之后，我不知道那有那么多无事忙？远亲近邻前来恭喜、道贺不说，就是数十里远的，而不知其姓氏者，闻之，也赶来拜托回台找人。再不，就是今天街坊张家请，明日李家邀，当然，我只好一一依照家人的话和安排：“却之不恭”。如此一来，弄得我身体加重，血压升高不淡，再打开纪事本一看，快到原定回台日期，时间来不及了。我又只好放弃游“五脑山”梦想！安慰自己说：“再下一次吧！”幸而，这次回乡不久，承麻城李、邹两先生派车盛情之请，“五脑”之梦！总算偿我夙愿。

“五脑山”（下简称五脑），位于麻城略西北，距城约八华里，为大别山西段支脉“麒麟山”系，延伸到“乘马岗”再南下蜿蜒至“五脑”之尽断层地带。由北至南，其形势，好似一条“长龙”出海，又像一只“骆驼”打蹲！整个“五脑”，分为三个景区，纵长约三十三公里，横宽约十五公里。其山并不太高，海拔约七百公尺，面积约八、九九七公顷。各景区皆有其特异风格，却又和谐的构成一体，互相呼应彰里。山山有示刻，处处留有笔痕！宛如一幅泼墨图！其周围数十里群山簇拥，缘树深幽，奇花斗艳，百鸟争鸣，流水迂回，怪石岿嶙！俨如一石海。两旁绝壁处如削！中间

小路迂回曲折，逐步登山，山峦起伏，群峰突出，灵气处处，满山奇景，别有美态，蔚为大观！站在峰顶，遥望西南，视野广阔，一望无垠平原，尽收眼底。美景美不胜收，实无法以笔墨来形容其壮丽景观，诚是人杰地灵，钟毓景瑞之气集于一山，大自然的杰作，堪称为人间仙境！游览好乐园。

中国名山甚多，诸如“五岳”之奇！“桂林”、“庐山”之美，笔者敢言麻城“五脑”；乃为奇中之奇！美中之美也。惟昔“舜”封全国十二名山时，为何独少“五脑”？不得其解。或许是由于“五脑”太美了，而妒嫉它！要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古有明训，我实为“五脑”而抱屈！

“五脑”因何而得名？查遍麻城新旧县志（含通志），均毫无记载，询之民间，亦大多数人云亦云……不知其所以然，至今“五脑”由何而来？始终是个迷？是此，建议主办麻城县志先生们，应否寻根究底弄清楚，以补其遗。不过，

“五脑”山岭有大小五个山峰，若似人头，是否因此得名？除此外，笔者认为再无别的依据可考了。

由于“五脑”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特优，除山之奇美外，另有其三大特点：一是周围群山环抱，高矮得体，起伏得宜，并四周有大小不一之五十五个小岔洼和溪流，而且，洼洼有人家。再前面说过，“五脑”山势不高，当然水源很短，但不知何来的那么多水，绵绵不绝！就是岁逢大旱，仍流水潺潺，长年不断，尤其水质特佳，冬暖夏凉，香甜可食。二是山上怪石很多，罗布奇诡有序，差距均衡，很像一片石林，又酷似一盘棋。而且石石大小得当，形态各异！有如鬼斧神工雕琢！有的罗汉打坐、美女梳头，有的像蟒蛇吐

信！狮子戏球！天马腾空！和竹笋等等不一。置身石林，如入“八阵图”迷宫中！稍不留意，很容易迷失方向。三是山上入口处有口自然石井，人称之“天井”（意水自天上来）。井，圆形如棹，青石天成，水平井口碧绿，深不可测！而且水性特殊，夏天冰凉澈骨，冬天温暖适度，可以沐浴。最奇怪的是，井空常有像雾样的气体飘浮着，并隐隐闪现绿光！夜晚最明显。天之造物何太奇？此井因何而成？又是一个迷团？另外，山上茂林中，生产一种野生茶，邑人名之“毛尖”、“云雾”，合名之“绿茶”，与贵州“茅台”齐名。惜出产不多，获者如珍品！舀其井水，煮其茶，诚是人间一大享受。再有一种有如“韩国草”的紫黄带绿的植物，其物细长如韭菜，柔软如棉，夏天采做成席，非常舒爽，可以去热驱汗！孟冬时，采做垫被或鞋垫，却又保温御寒，真是一种宝物！相传，当年“帝主”（庙主神，俗名张昭行七，请阅后页下文），未成道前，采是物做“蒲团”坐玄！陡觉心如止水，万念俱空，玄机源源而来，进入浑然忘我境界，因而成道！故邑人称是物为“张七草”。人赞东北有三宝：“貂皮”、“人参”、“乌拉草”，我要强调麻城也有三宝那就是：“天水”、“绿茶”、“张七草”是也。

谈过山之后，不能说有山没有庙，千古以来，大凡中国有名的山（如三山，五岳等），都有庙建立的。当然，麻城“五脑山”也不例外！而且“五脑”庙之名气，远胜过“五脑”山之名也。说来，读者或怀疑笔者在谈玄！然而，要知道“五脑”山庙，完全是真实的，有历史可以做见证！考诸麻城新旧县志（含通志）及庙碑文，都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

昔时“五脑”南北有两大古庙对峙！北庙名曰：“静月寺”，亦名“仙姑洞”，又邑人称之为“麻仙姑洞”。传说为麻姑修真之处，也是麻城八景之一。寺左，有一亭，悬石支架，中空如屋，现改建为国营林场，山貌全新，古迹犹存。系建于东晋时期，历史悠久，显著的古迹，有东汉末年“曹操”亲笔题写的“万古高风”四字，其遗址尚存于“五脑”山之岭！南庙，乃为“帝主宫殿”，邑人亦称“五脑山庙”，或“五脑仙山”，简称之“五脑庙”。其庙乃依山之形势，借山布局，设计新颖独特，占地约三千余公顷。举目望去，好大一片黑压压地建筑群，不知有多少？……其建筑特点，前后宫殿首尾相联一体，殿殿有院落，屋屋有天窗、花坛。其建筑之宏伟、巍峨、瑰丽、雅典处，复又深幽静怡，古色盎然，掩映于青松、翠柏、古木石林中，把“五脑”点缀得分外清幽秀美。近看俨如一座“帝王城”，远望好似一矗“南天门”！这是座若大的建筑群。总之，综合了当年设计、制图、布局、采材、雕刻、色彩、艺术、兴工等之大成。同时，也蕴藏了诸匠心及技术和智慧等之结晶！可以说，它是中华文化的杰作，也可以说是代表了麻城历史文化起源点。世人仅知天台山“国清寺”泰山“灵岩寺”、江陵的“玉泉寺”，南京的“栖霞寺”，并称之为“四绝”笔者认为麻城的“五脑山庙”，实乃为绝中之又一绝，也不为过。

当笔者，踏上五脑庙前阶时，四弟告知，必须经过一亭，即“静心亭”，才能以窥其全貌（亭意，到此者静下心的意思）。此亭后，有一院，“道峰院”。二门，“一天门”、“二天门”。三宫，“紫微宫”、“威灵宫”、“玉

清官”。四楼，“钟楼”、“鼓楼”、“戏楼”、“聚峰楼”。五殿，“拜殿”、“帝主殿”、“娘娘殿”、“祖师殿”，及一“空殿”（殿扁被拆，未问何殿，亦空无一神）另加上两侧厢房，后进储藏库，右侧饭堂，道友杂役寝室等。总计，不下一百廿余间房屋，前后共有七重之多，而且重重相联，屋屋相接。惜大多破损，亟待修复。据老道告知，昔全盛时期，有一百多道友和杂役，始建于北宋年代，（通志）内有北宋“政和”六年“五脑山”壁题记载。

进入“静心亭”，放眼一扫！非昔日之亭也，仅亭柱及顶盖尚存，次登七十六级石阶，入“一天门”，举首“五脑仙山”四个大字，映入眼帘。门内原有“四大金刚”铜像，而今不复再见。再登石阶十六级，即“二天门”，门首，亦刻有“彩焕云衢”白石黑字，清楚可见。两门屋盖全毁！仅四壁仍屹立犹存，乃两旁石碑刻记昔日捐款芳名，亦仍砌在壁间。复登数步石阶，入四楼，即“钟楼、鼓楼、戏楼、聚峰楼”。四楼，因历史原因，破坏颇重，多半全毁或半毁！昔之楼阁巍峨，美仑美奂之景观，而今也全不存在。惟有昔日游客之诗句墨痕，涂满四壁，但大多模糊不清，无法识认。再数步，进入正殿，殿分两进，亦多破损，尤以“帝主殿”破坏较重！虽见维修，但很草率。前殿奉“菩提”，后殿祀“帝主”，左为财神“赵公明”，右为“灵官”及医圣“华陀”各神龛处，都有联对。“帝主”前上联是：“帝主显神威，当年助国救民，丰功伟绩传盛世”，下联：“春花争怒放，此日善男信女，虔诚礼拜视生辰”（笔力苍劲有力，联意切当，为前老道邱鹤鸣所题写）。“华陀”处上联：“华心行道，法通三界”，下联“轮转神威，德感九州”（未署名

不知谁题)。财神位上联：“勤劳便是摇钱树”，下联：“节俭如同聚宝盆”（话虽俗了点，但是实情）。前后殿壁间，也有不少游客题诗，其中有两则雅俗颇佳者，兹录后，以助读者雅兴。一是：“久慕芳名到处传，果然不亚合威贤。仙风道骨纯阳体，鹤发童颜太上丹。利物济人施妙药，清心寡欲坐参玄！松风绿水来相伴，化尽凡因结善缘”（即赞“华陀”之句，为毛锐如游客题咏）。二是：“相邀老友谒名山，造极登峰放眼观。河水西流通汉镇，烟云东去压龟山。万紫嫣红铺大地，花团锦簇遍人间。欣逢盛世人安乐，幸福生涯过晚年”。（此两题字极恭正有力，尤以后题对功切当，雅俗俱佳是佳作，为游客郭炳移所题咏）。正殿后，即三官，三官破坏情形与前两殿略同，四壁间，亦有不少游客留句，也未问所奉何神？走马看花，即匆匆转入又一宫殿：“娘娘殿”（送子、催子、护子三娘娘）。一入此殿，耳目一新，固此殿构造独特，别具一格，其用材，亦大相迥异！诸如，四柱横梁、桶子、门窗、神案等，全为榉木或樟木建造外，其墙壁均为百十多斤重青砖砌成，地铺大理石，特别是殿瓦，亦全为不锈钢所铺盖，每瓦重八十余斤，殿顶悬挂红色“八卦图”，仍保持原状。老道说：此殿为全庙群中仅是未遭破坏之一，也是“五脑”目前全靠此殿来维持香火！此殿后，为饭堂三进，再后，为道友及杂役寝房（未便进入观看）。再右转，即厢房两进，前后厢壁上均悬有吊屏各一幅。前厢上屏是：“教演名山，勤修妙道”，下屏：“经传盛世，乐享遐龄”。后厢上屏：“琴棋书画囊中客，下屏：“山水烟霞野外人”（均为前老道邱鹤鸣题句）。再后厢正面悬挂一幅。“五脑”视意图，为现老道丁嗣良所绘，

左右亦有挂联，左是：“善教门徒，诚必修道”，右是：“良方济世，妙手回春”，也是丁自联之句。足见丁诗学造诣不错，不失为是位读书人了。他说：“五脑”昔有道友百十人之多，而今仅有三老道，（即丁、黄、邱三道），厢后，即“祖师殿”（最后一殿）。举目殿首，左边是：“道养和平，新添岁月”，右边：“德怡幽静，欢度春秋”，上：“静养清幽”四字。入殿正中，即奉祀着一尊披发方面：“龙门正宗大罗天仙状元邱大真人神位”（即前庙之住持者）其左联是：“金炉不断千年火”，右联：“玉盏长明万岁灯”，祖师上：“道德常春”四字。殿两边壁上亦有吊屏，右边是：“林间暖酒烧红叶”，右边：“石上题诗扫绿苔”（殿内外各联句，均为邱鹤鸣题写）。再抬头四望，此殿显见稍加维修过。此足见他们仍不忘祖！诚属难能可贵，可嘉可许也。

再据县志及庙碑记载，“五脑”庙，历史上有过多次破坏和重加修复的。第一次，是明“嘉靖”年间，时值兵乱，庙全毁！后由邑民捐款共修的。第二次，是清“嘉庆”年间，庙复遭兵火！由邑人“胡宗第”带领头募化重建。第三次，为“咸丰”年间，庙复又遭贼毁！“同治”初，亦由邑人“王大坤、吴春山”等募化重建，恢复原来景观。单就后一次重建工程，耗资至巨！募化远及江南各省，尤以四川，云贵三省捐资最多。这足以证明“五脑”庙，非一省一县之力，而为各省所共建也。再文革十年，“五脑”复又横遭浩劫！神像尽毁！大凡庙之琉璃瓦、铜、铁所铸造的神像，樟木雕琢之阁楼等，全被拆完，昔日全盛时期，大小神像不下数百，现存者，不过数十而已，而且全为泥塑！其中所奉祀

之主神“帝主”亦然。

说起“帝主”，有三种不同说法，县志内亦有两种不同（旧志）说：“福主”（即帝主），降生于宋之“西蜀壁山，姓张，名昭，行七，世称张七相公。其父，官拜“大理”，母杨氏，敬“三宝”，喜施济。生后三月能言，七岁通诗，文尤好。时有神人曰“大理此子有夙因，应显法于楚。”年十七，历游至邑，见民间多淫祠，尽毁之！祠主诉于官，因是系狱三年。时值邑中火灾！自知厄当满出，释之，跨乌骓，执朱棒，指火火灭！旋人马飞升，望者见止于“五脑”遂立庙于山麓。”嗣后，凡邑岁苦旱，疾厄，灾难等，祷呼之“帝主”得解必吉……由是宋封为“紫微侯”。明封为“助国顺天王”。清加封为“灵感”二字。（新志）说：“相传化主，即宋之邑令“张毅公”，为民祛雨，无不应之也。常同幕客游龟峰（五脑主峰），爱其山幽峻，乃题名“勒石”，后得道成神！遂栖于是山，故民间有以“化主”称之。另有一民间传说：“帝主，不知何方人氏，远游至邑，见民间有淫祠尽毁，民缚之送官，遂系狱，后适邑火，释之跨鹤西飞，手执拂塵挥火止，旋止于“五脑”。向跪拜之官民曰：“吾只需一块山，拜者允之，见脱披袍向山一抛！整个五脑被覆盖。于是拜者呼之神！遂立庙祀之。”以上三种说法，虽各有不同之处，但都说“帝主”姓张则一，尤以第三种与第一种所说，非常接近。

看完“五脑”，出庙复沿庙环视一周。这时，本欲离去，但时值正午，承老道殷切挽留进庙午餐，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午餐，虽是面食（手赶家常面），但出自老道亲作，手艺不凡，面细如丝，再佐以香瓜、金针、木耳等材

料，另加上四碟小菜，一时香气四射，闻者垂涎欲滴！正合笔者口胃。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了再说。餐后，为了表示谢意，留下区区人民币百元下山。

回途中在想，如何促使“五脑”庙早日重建，恢复旧观？此非一人之力也。必须有人出来领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群策群力，全邑民共襄此伟大的善与才对。俗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又古谚云：昔之“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可为写照！为何先民能之，而我们不能耶？

是此，笔者想到个权宜办法是：建议麻城市方面领头，监督组织“五脑山庙重建委员会”（含马路）。其成员，由民间知名人士组成之，并订下时间表，暂定五年内完成。先期，一方面准许庙方酌收年轻力壮之门徒，志愿上山从事生产，另由市方面暂拨若干生产费用（后由生产盈余下归垫）开垦山坡地，广植果木、金针、白木耳、香瓜及高粱、花生杂粮等。这样，一则改善了目前老道生活，继则增加了庙之收入，充实库存（放银行生息，免缴税款）。二方面，默许民间善心人士募化，共襄善缘。按麻城现有人口百万，以每人五角或一元人民币论计，每户不过一二元，或三数元而已。衡量大多均可负荷得起，我想，无不乐观其成。后期，一面购置材料，开始动工兴建，并责令三年内完工（看情形酌可延长之）。二方面，重建完成后，由电视台及报纸刊物等，广为传播（义务性的）。这样，俾使“五脑”重见国人，至少重返江南。届时，闻者，必远来观光，近者必游人如鲫，善男信女必络绎于途！其香火必恢复到昔之全盛时期。

按中共政策，为保护历史文化古迹，早将“五脑”列为一级重点保护之一，并计划有重建之意（含马路）。然而，以麻城目前财力衡之，正从事多项建设，无暇自顾，遑论其他，只是望山兴叹而已。如由庙方自建，更远非三老道之力也。何年何月能完成之？如此这样，不如从权。最后呼吁！麻城同胞们，共为“五脑”重建而努力吧！勿让这一美好伟大的构想计划，胎死腹中。更勿让这一富有历史文化性的古迹从我们这一代手中而淹没！笔者走笔到此，我只能贡献个人这点小意见，实有愧对“五脑”，“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原载《湖北文献》第99期）



敦煌文书与王道士

江 益 林

清朝末年，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曾有轰动世界的三大发现：甲骨文、流沙坠简和敦煌文书。其中之一的敦煌文书之发现却与相距数千里之外的湖北麻城有关联。

敦煌文书即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古本写经，亦或称为敦煌石室遗书。一八九九年初夏，敦煌千佛洞的藏经洞被发现，洞内共藏有各种古本经卷二万余卷和大量画幡文物。经卷内容多为佛教经典和道教、景教、摩尼教经典以及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各种帐籍等等。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北宋初，以唐代为多。其中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本《金刚经》。它的发现为中国和西域中世纪史的研究增添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然而，敦煌文书的发现，招来了各帝国主义强盗的掠夺。首先来到敦煌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本为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籍）和法国人希伯和。一九〇七年，斯坦因以探险名义到达敦煌，从藏经洞中挑选了约九千件文物，装满五十箱，运往伦敦。次年，希伯和又窃取了五千余件，送往巴黎。尔后，日本、俄国等国接踵而至，使敦煌文书之珍品大量流落海外。很快在国际引起轰动，清政府才觉得弃之可惜，待到我国的学者们去收拾残卷，已经没有什么

珍贵的东西了。只由学部运回八千余件残卷，运输途中又遗失不少。至今，大量的敦煌文书分散在世界上的各个图书馆里。收藏最多的是英国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以及我国的北京图书馆。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质量就远不如英、法两国的了。

在文史学术界，人们一提到敦煌文书，无不谈论其发现者王道士，无不指责王道士对敦煌文书的流失负有直接的责任。王道士何许人也？他是如何发现敦煌文书又使其外流的呢？

王道士（？——1931）名园策（有的资料误为国策——笔者），乃湖北麻城人。敦煌文书的发现与麻城便有了如此之联系。王园策从小就风骨飘然，早有弃俗出家的念头。后因麻城遇上连年荒旱，民不聊生，他不得不外出逃荒。历尽魔劫，灰心名利，在甘肃酒泉出了家。从此稽首受戒，孳孳修炼，成了一名道教徒。迨后，王道士外出云游至敦煌，纵览名胜古迹，当他登上三危山，便发现了千佛洞此处被人们遗忘了多年的佛教胜地。王道士慨然惊叹：“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便在这里住了下来。他“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修建太清宫道观，以为栖鹤伏龙之所。”从此，这里成了道教场所，王道士便成了千佛洞的主持人。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899年7月2日）王道士用流水冲洗洞内的流沙，奇迹出现了。当三层流沙冲走后，洞壁上现出一孔，内仿佛有光。打破洞壁，出现小洞，洞内豁然开朗，堆积如山的宝物把王道士看得眼花缭乱。洞里面藏有“唐经万卷，古物极多。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敦煌文书就这样传奇般地被王道士发现了。

敦煌文书一经发现，便很快名扬中外。清朝政府无人问津，而外国的劫宝分子却纷至沓来。他们以欺骗的手段低价从王道士手中把经卷文书巧取一空，王道士则用得来的钱财大兴宗教建筑。他改建了三层楼、古汉桥、五层佛楼的修筑已初具规模，还修葺了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余万之募资。”使这处我国最大的石窟寺艺术宝库“佛像於焉灿烂。”他还对石窟内的大量壁画作了些适当的保护。一九三一年，王道士仙逝于太清宫，遗骨葬于千佛洞对面的鸣沙山上。地方县令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加以褒扬。王道士的徒子赵玉明、徒孙方至福于其仙逝百日之际造塔树碑，以永垂道范。

王道士虽然为千佛洞的保护作了些有益的事，然而他以卖文物而兴宗教的过失是后人不能原谅的。他卖掉的是不可再得的无价之宝，而兴建的是些无关紧要的宗教建筑，这就是不懂文物之珍贵而造成的千古遗恨，这是愚昧酿出的民族悲剧，也是难以洗雪的耻辱。当然王道士也有难言之苦，其时在茫茫戈壁上布道艰辛，募捐不易，生活清贫。一个迂阔的老道人，又如何能抵御一群凶恶的外国强盗呢？更何况这些外国人多持有清朝政府的公文。固然王道士对敦煌文物的流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清朝政府则是破坏祖国文化遗产的更严重的渎职犯罪。文书发现后，不少有识之士曾建议清政府运回这批珍贵文物，清政府却以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资金缺乏为由，根本不予重视。腐败的清政府把大片的国土和不少国家主权都割让给了外国，甚至连皇家园陵，宫廷文物都保不住，还顾得了远在西北边陲沙漠中的敦煌文书吗？总之，敦煌文书的劫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惨痛的文物

损失，王道士出卖国宝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深刻的。王道士是位功过参半的历史人物。敦煌文书的发现和散失弥漫着一层历史的迷雾。

（文中引文出自王氏墓志。该墓志由敦煌考古所张清涛同志提供，谨表致谢！）

一九九一年元月



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邹 功 勇

麻城迁民四川，正史虽少记载，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是持久而广泛的，特别是四川的许多地方，湖北麻城几乎是妇孺皆知的“祖籍”。据悉，在四川大学地方志干部培训班上，许多同志将这一问题提出讨论，并认为，其祖辈绝大多数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由湖广麻城孝感乡迁入的。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麻城有无孝感乡？其规模到底有多大？其迁民何以遍及四川各地？为弄清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修好新方志，笔者揣陈孔见，以求抛砖引玉。

造成麻城迁民四川深远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麻城早在明洪武年间就向四川大批移民。

明洪武初年，麻城版土总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分太平、亭川、仙居、孝感四乡。这里虽为鄂东边缘地带，当时却是人口稠密的“狭乡”。其中又以地处麻中南部平原的孝感乡为最，这是元明政权更迭时期，外籍移民客居麻城，躲避兵祸的缘故。我们从“元末邑人姜铭等创筑今治”并得以

保留的历史事实，即可推测当时麻城社会稳定的程度。到了明初，明统治者认识到：“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要发展农业，必须让农民归耕。太祖朱元璋还采纳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古狭乡之民，听迁之边乡，欲地无利，人无失业也”。麻城为“狭乡”，尤其是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的孝感乡，自然在迁民之列。由于移民能获得朝廷提供的牛种、车、粮和耕地，并享受“三年不征税”的优惠待遇，故洪武二年便有人向四川迁移。这在四川隆昌县《黄氏宗谱》中亦有记载：“明洪武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川者，皆麻城孝感乡也。”此说当然过于绝对、笼统，但明初麻城人民迁川的事实却是可信的。

洪武6年（1374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上书：“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太祖“从之”。据地方史料推测分析，尽管此前麻城已有人入川，但麻城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还是从此开始的。尽管自愿迁者不少，但官府仍然担心数量太少而明令，三户迁一，不愿迁者，令士兵“拥送”迁徙。以至于麻城在明初盛世的数十年里，人口呈负数发展。例如洪武24年（1392年），全县册定人口15809户，105112人；而18年后的永乐七年，人口仍为15810户，104180人，减少932人。可见迁出人数不少。有些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几乎是合族迁徙，如当时的孝感乡邓家塆（今浮桥河镇辖）即是如此。据该村道光年间的《邓氏宗谱》载：“我祖自前明寄籍迄今数百年矣，户口之蕃盛，如此其繁也，支庶之播迁，如此其散也。”而不知邓家塆始祖为谁，故世居该村这支邓姓的始祖“因先

有宗人在此，不敢臆断，列为第二世。”据当地口碑，其“宗人”之后代早已迁移四川数百年，仅留该村西北岗上一座高大的祖坟，当地称“邓家的老祖坟”。旧时邓姓只在祭大祖时才由族上公祭，代代相袭，已有数百年了。由此可见，今年8月7日《人民日报》张颂甲同志《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访邓小平同志故居》一文中，“据说邓姓是从麻城移来的客家人，几百年来，邓家一直是这里的旺族”这段文字是有根据的。

此外，在四川还流传着孝感乡人“善经商”的说法。这是因为明初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盐商可以在外地募人屯垦，就地交粮，向政府换“盐引”领盐贩卖。上述说法证明入川的移民中有商屯。

二

造成麻城迁民四川深远影响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麻乡约”的产生，明末清初战乱中麻城籍义军官兵入籍四川，以及“湖广填四川”时，麻城再次移民四川。

洪武27年，明政府诏令各地“额外垦荒，永不起科”。入川移民遂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围垦荒地，开亩凿池，因河为堰，筑园树桑；不几年，原来杳无人烟的荒蛮之地变成了“高廩相望，谷牧遍野”的富庶之区。随着岁月的流失，移民们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遂推举代表数人回麻探视，以至于年年如此，相约成习，后来竟发展成通信史上著名的“麻乡约”。这是人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自身信息交流的创举。它不仅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产生奠定了基

础，而且成了四川客家人寻根问祖的舆论源头。

明朝末年，张献忠所部麻城籍官兵，因兵败藏匿民间，有在四川成都周围的广大地区零散入籍的。崇祯16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进军麻城，招兵5万7千人，“别立‘新营’”。次年7月，改称“英勇营”，由洪正隆率领随张入蜀。洪部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尽管张献忠严禁部属娶四川本土妇女为妻，但麻城籍义军官兵与当地人民的骨肉亲情是不言而喻的。据此可以推断，张部兵败逃亡的麻城籍官兵是不难入籍并生存下来的。

至于清初因“湖广填四川”而入川的也有一定数量的麻城人，这在四川和麻城各地的族谱、碑文中均有记载。但此时的孝感乡已早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并入仙居乡而不复存在数百年了。故民间流传的“清代孝感乡”之说，既是明代麻城孝感乡迁民四川的影响，又是人们思乡之情的寄托。

参考文献：

光绪八年《麻城县志》卷二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

《明史》卷七十七

《梁氏宗谱》卷之一

《中国史纲要》下册，翦伯赞主编

孝感县龙店区《麻城过籍》专题资料

《麻城县邮电志》

《薪黄四十八寨》

原载《湖北方志》91年第一期

湖广填四川

入营占籍时期、祖籍、人数、分布、性质、繁衍初考

四川 张映斗

经过战争折腾，明末清初，四川尚处于“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严重局面。营山县志（同治版）载，明季人丁2273丁；清康熙61年，营山报部承粮花户143户，丁819丁，人口总数估计为3000来人。清廷为了恢复经济，巩固政权，于顺治六年（1649）颁布“垦荒令”。垦荒令执行二十余年，“官虽劝耕，而民终裹足不前”（《清文献通考》卷一）；于是有大规模移民之举。据营山旧志（同治版）载：“雍正初年，祖籍在两湖、两广、江西、陕西之民入营占户者，趾踵相接，内以两湖人最多。”当时朝廷给这些移民以特别优惠的政策，积积鼓励，规定凡愿来川开荒者：“量人多寡，分给荒地，给于牛、种、口粮，其所用各项费用银两，着落各府、州、县赔补”（《清文献通史》卷19）。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也曾以“招民垦荒功，升加兵部尚书。”但正如俗语所说：“金窝银窝离不得自己的狗窝”背井离乡，有悖人情。那时湖南、湖北的官吏在黎明前，趁老百姓睡得正香，便带着手执兵器的清兵把毗邻的几个村子团团围住，然后挨家挨户把所有的人从床上吆

起来，指定在一个院坝集中。由官吏在混乱的人群中巡视，对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者，便朝耳边或肩背一巴掌打去，并顺手拉出人群，另行集中。这人便算中选被“招”，要移籍四川了。若不顺从，则捆绑双手，押解而去。现在湖南宝庆及湖北孝感一带，每当小孩哭闹不止时，村妇哄吓娃娃都还说：“你再哭再闹，谨防歪人进来一耳光打到四川去！”

恐怕很多人都是被迫离开自己故乡的吧，在我县民间还有一种传说，从湖广来的人的祖先是被绑着双手押来的，他们要解大小便就得松绑。所以当今县民把解大小便叫“解手”，走路双手都爱后抄。这当然是附会，但地方官为了完成上级任务，邀功晋爵不择手段，暴虐百姓却也是当时实情。

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到雍正六年（1728），仅六年时间，全县报部承粮花户就上升到3897户，人丁22533丁。计增3754户，11714丁。这些几乎都是外籍来我县插占为业者。乾隆六十年（1795）县内增入楚民17户，人丁约一百丁。可见移民规模很大，远远超过土著。时间也多从康熙到乾隆百余年间。

县境内除灵鹭、老林、三合场等地较多散居土著人外，其余则为移民占籍。同籍人分别集资在县城建立会旅。川籍人建惠民宫，永州人建濂溪祠，两湖人建禹王宫，江西人建万寿宫，广东、福建人建广圣宫，陕西人建三元宫，衡州人建寿福宫。在语言上，有四里腔、永州腔，广东腔，安化腔。现在除永州腔、安化腔外，其余均同化为营山话了。至今茶盘、安化等地，老人们见到同籍，操土音问答，仍谓之乡谈。

从入籍至今，这些移民一般已繁衍了十五代左右，如灵

鹤鲜家坪鲜氏家谱记：雍正初年鲜大春从湖北携家入营，其字辈为：朝仲佳学仕，文元克绍廷，钟奇继先代，常怀尊国忠；树德昭丕绪，宣采应家声。而今，此姓已有“代”、“常”字辈的人了。

丰产张家坝张氏家谱记：张均由湖北麻城孝感入营，插占为业，世系定为：洪祥志吉，忠文乃一，大国居其，永映效之，光泽明远，隆天顺时，克朝建芳，同登祀宜。至今，此姓已有“之”字辈的人了。

从移民至今的二百六十余年里，主客籍团结互助，相友互婚，影响融合，生息劳动，为建设家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范志斌摘自四川省营山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关于《金瓶梅》最早收藏者的补证

刘 宏

为了揭开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作者与收藏者之谜，许多学者都注重研究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这就是明末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第二十五卷关于《金瓶梅》的一段纪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论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文中的“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一句提出异议。如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一文中说“麻城刘承禧家有此本，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则这个抄本与麻城不见得有关系……我以为麻城这个联念，本身也经不起剖析。”又如，张远芬同志在《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中说，徐文贞与刘承禧年龄悬殊，不可能成为刘承禧的岳父；徐、刘两家一属湖北麻城，一属上海松江，如此远结姻亲是不可思议的。从表面上看，柳存仁和张远芬二位

的看法似乎有点道理，但仅是推测，并无实据，难以服人。

近年来，我意外地从刘承禧后人那里得到《刘氏宗谱》数本。从中可证徐、刘两家确曾有过姻亲关系。

《刘氏宗谱》载：

刘承禧，守有长子，字延伯，武榜眼都督同知，葬县东四柱桥傅家楼辰山，戌向，娶徐氏，归母家。

《麻城县志》载：

刘承禧，守有子，字延伯，亦袭职，好古玩书画，弈叶丰华，人以为邑之王谢也。

关于刘承禧爱好收藏的情况，《元曲选·藏晋叔序》里有这样一段话：“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又据《三希堂法帖》第一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有“右军法书，吾家第一”和“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的字样。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刘承禧之妻确为徐氏，被誉为“邑之王谢”。

《刘氏宗谱》中关于刘承禧的曾祖父刘天和与祖父刘灏的记载：

刘天和，字养和，号松石，生于明成化十七年己亥六月十六日，宏治戊午举人，正德戊辰进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少保，谥庄襄，崇祀乡贤，殁于嘉靖廿四年乙巳十二月廿三日，寿六十有七。

《明史卷二百·传第八十八》对刘天和有与上相同的记载：

刘天和，字养和，麻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进兵部尚书……论功，加天和太子太保，荫一子锦

衣千户，前后赉银币十数。迁南京部尚书，召为兵部尚书督团营。

《刘氏宗谱》对刘濬的记载是：

刘濬，字汝静，号云菽，嘉靖壬午科举人，壬辰进士，授行人司刑部郎中，以子贵赠太子太傅左都督，崇祀乡贤。

由此看来，刘家算得上当时南京城里的名门贵族了。刘、徐两家共居一城，同为京官。

另一方面，刘天和的德才也多为同僚们称颂。南京兵部侍郎耿定向称赞刘天和道：

人言公凝眸转瞬，含吐风云；拂晒唯诺威有主谓，则谓公以智胜云……公平生智之所运，大为都世，兴事建业，乃其砥行砺节，抑又兢兢焉，似不特役役于事功间矣。（见《刘氏宗谱》中《刘庄襄公事略》）

刘天和的政治倾向与为人也体现在婚姻等问题上。《明史·刘天和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天和初举进士，刘瑾欲与叔宗姓，谢不往。晚年内召，陶仲文以刺迎，称戚属。天和返其刺曰：“误矣，吾中外姻连无是人。”

陶仲为严嵩奸党，徐阶与他们有很深的矛盾；而对刘天和父子“莅政严明，不悦权贵”的品质很佩服的。再说，徐阶从嘉靖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到登上首辅宝座这一期间，也正是刘家“人以为邑之王谢”的时期。因此，无论从政治倾向，还是从门第看，徐、刘两家十分相配。

最后，再请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十一中记载的一个事实：

徐太常（元春）以女于刘金吾（守有）之子，徐为华亭

相公家孙。

《刘氏宗谱》中对刘守有的记载是：

刘守有，字金吾，武进士、太子太傅，五都督府、崇祀乡贤……生二子：承禧、承佑。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刘徐两家联姻，无论是地域、年代、年龄、还是门第、政治观点都是循理成章的。

所以，徐、刘两家结为姻亲关系确属历史事实，而刘承禧是《金瓶梅》最早的全书收藏者是可以确认的。

沈德符指出，刘承禧家藏有《金瓶梅》全书，但是对刘承禧到底从哪儿抄得的并未作肯定的回答，只是说“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万历野获编》）。这表明沈氏并没排除刘承禧直接从作者那儿录得的可能性。

《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自明清以来，共有十一说：王世贞、李渔、卢楠、李开先、屠隆、薛应旗、李贽、徐渭、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其中，认定王世贞者为最多。王世贞是嘉靖年间的大名士，其父被奸相严嵩迫害致死，因而“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至于更多的理由，前人之述备矣，这里，我就不作赘述了。

《刘氏宗谱》提供了有关刘承禧家与王世贞的关系的一些资料。

《刘氏宗谱》录存了一幅王世贞赠给刘家的匾额“海内名师”，下题款识“赐进士嘉议大夫都御史王世贞拜撰”。根据签名中所任官职的分析，送匾之事应是发生在王世贞“父忬以滦河失事，嵩构之论死”之后，王世贞之所以赠匾额给刘家，这其中是有一定原因的。王世贞与徐阶是同乡，徐、刘两家又是姻亲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王、徐、刘三家

在政治上都痛恨严嵩奸党。严嵩父子将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害死于西市以后，身居要职的刘焘父子与大学士徐阶担着很大风险鼎力相助，才“复忬官”，其冤才得以昭雪。激烈的政治斗争加深了刘、徐、王三家的情谊。从此，王世贞与刘承禧家的交往也不同于一般了。而最能表现王世贞对刘天和的仰慕和与刘家亲密友情的，还体现在他撰写《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庄襄公刘天和墓志铭》这件事情上。现将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嘉靖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又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刘公卒，楚守君以讣闻，天子为震悼，辍视朝；太宰议赠，赠少保；大宗伯议祭，祭九；议谥，覆正志和，因事有功，为庄襄；大司空议葬，葬所需县官供给无乏。有子四，其三皆先卒，焘最贤而又继卒，诸孙幼，故公歿十六年而门人大司马刘公海始克具状。又十五年而孙守有辈以状来请志铭。呜呼！庄襄公固德靖间勋贤臣也，惟不佞尝记之矣，今何敢辞……

盖拊卷而三叹曰：呜呼，公真异人哉！当公治邑而称良，墨绶入台而称良，御史治郡俸束而称良，二千石，意以为精心勤恤之士耳。北治河，河工立就；西治屯，屯政肃；镇陕，陕之贪墨尽解去，大盗散徙，始稍露其不可测，以为世之得公者尚浅。然公南人耳，十万浴铁之骑，霆摧电掣于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挥而靡之，百步不留，坚至其所，飞捷明光，上下动色，谓三秦自弘永而后始快意于一胜者，终岂能测公哉！吾闻之廖堂氏之葬公也，校卒挟玺书，一旦以琅玕至豹虎交迹，即不道途死，且狱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桌，即就道，无惨容者，其定力有以胜死也，何必十万骑哉？今夫志大者不能无小出入，术胜者不能无巧进

退……呜呼！世安得以出入进退窥公哉？

万历丁丑端阳日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京大理太仆寺卿县郡王世贞撰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充分说明了王世贞对兵部尚书刘天和的敬仰之情；第二，表现了王世贞与刘家彼此间全面而深刻的了解；第三，王世贞与刘承禧的父亲刘守有间交谊很深。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这篇《墓志铭》写于万历五年，这里刘守有的官职为太子太傅的五军都督府。《刘氏宗谱》里有一幅万历四年丙子御赐守有公对联：“**摆**三千甲冑，斩将擒王；剿十万铁骑，摧枯拉朽。”由此可见刘家这时的权势仍然十分显赫。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的王世贞在政治上找上这样一个靠山对他不是没有意义的。另外，按吴晗先生和徐朔方先生的推算，万历五年前后正是王世贞的《金瓶梅》写作或完稿的时间。王世贞当然知道当时“奸焰熏灼，呼天莫诉”，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呕心沥血之作交给一个有恩于己、政治上可靠而又意趣相投的家族收藏，当然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此外《金瓶梅》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戏曲史料，这说明作者十分熟悉元明戏曲，作者的戏曲资料从何处借得呢？作为与刘家关系密切的王世贞很可能利用了刘承禧的大量藏书。刘承禧作为一个藏书家收藏王世贞力作《金瓶梅》也是极为可能的。因此，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一语可能属于一种推测，而刘家之书可能直接得自作者王世贞。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刊物《文学遗产》1989·3）

麻城蜂业溯源

范道熙

麻城养蜂实业有较好的基础，建国初期麻城养蜂者遍及城乡。

养蜂有利于经济发展，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五十年代初期麻城县创办国营养蜂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改革初期麻城养蜂场利用自己的优质产品——蜂蜜，并吸收现代科技，推出蜂蜜汽水新产品，受市场欢迎。国营蜂场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积累了资金，不断扩展壮大。八十年代中期又创办制药厂，推出人参蜂王浆、血宝等高级营养、滋补系列药品，逐步占领了市场，饮誉省内外。行销9省45县市，并出口荷兰。制药厂的建立是麻城养蜂实业发展的一个新标识。

位于麻城北环路的麻城制药厂是从麻城蜂场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厂。没有依赖政府投资，以养蜂场的积累和吸收银行贷款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创办起来的。它对蜂产品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其价值创造更多的财富。几年来工厂办成一个环境优美类似花园，技术进步蒸蒸日上的新型企业。

养蜂有利于农业，经过蜜蜂采过花粉后的作物能大大提高产量。蜜糖可以制药，可以加工食品，蜂蜡是一种工业原

料，蜂毒是一种药物，蜂王浆是高级滋补品，蜜蜂全身是宝。养蜂是一个有前途的实业。

麻城养蜂这个有发展前途的实业有将近8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它的引进与范懿斋有重大关系，它的发展与范志鹏分不开。追溯其源头，探索其发展过程中的艰辛曲折，其事其人有感人至深者。

范懿斋其人

晚清末年废除科举制度，邑人范懿斋到武昌投奔新军，在历史转折关头他走上了投笔从戎之路，弃文就武当了兵，荷枪实弹，他辛勤操练，颇得上司赏识。当时全国以孙文、黄兴为旗帜的反满革命运动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范懿斋所在的部队（当时基层组织“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地下领导机关联系和依靠的重点。孙、黄领导的革命运动已发动九次武装起义，均被满清残酷地镇压下去了。革命党人把希望寄托于武昌新军，在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准备积蓄力量举行武装起义。庚戌年（1910）10月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主要是孙文远在日本，黄兴远在湖南，组织者期望孙、黄到达后始揭义帜，但一个危险的信号发生了，新军的地下活动被上层反动分子发觉，当时剑拔弩张形势紧急令人窒息，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时，起义领导人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于10月9日子夜（即10月10日凌晨）由忠于革命的新军打响了第一枪，战斗异常悲壮，打乱了反动分子的手脚，第10次起义——武昌起义终于成功。范懿斋所在的“朋”参加了武昌首义，范懿斋战斗勇敢，他是下级军人被批准参加了武昌

首义同志会。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一页。作者童稚时听过他绘声绘色的叙述，其得意的劲儿是难以形容的。

引进良种意蜂

后来范懿斋在军界没有发展，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在旧中国读书做官当兵吃粮是一种出路。范懿斋既不能当官，又不愿久冒当兵打仗的风险，总要想找一个出路才好。他参加首义同志会后结识了一些洋人中的上层分子，有一个在武昌传洋教的瑞典神甫，他带了少量意大利改良种的蜜蜂，洋人不为谋生作为茶余饭后的一种生活消遣，给范懿斋莫大的启迪。你不用养蜜蜂来谋生，我可以用它来谋生。一日乘洋人高兴之际范懿斋提出卖蜜蜂的要求，洋人信口答复他一两黄金一皮蜂，洋人根本不相信这个下层憨厚的中国青年人真能以养蜜蜂为职业。范懿斋高兴极了，回来典当借贷果然筹凑了一两黄金，他恭恭敬敬地放在洋人的案上。洋人不在乎钱，对他的举动深感愕然，十分感动，不是给一皮而是给了一小箱（大约5皮）这是麻城引进意蜂之始，时在民国初年。

创业的艰难

为了本能的防卫，蜜蜂往往用尾部之刺诛人，分泌一种蜂毒，产生奇痛、红肿，俗称诛人，诛人后蜜蜂也就死了，蜂毒对人体健康无害，蜜蜂诛人也是义无反顾的悲壮行为。范懿斋怕蜜蜂诛人，饲养蜜蜂的重担自然落在其子范志鹏的

肩。范志鹏号继先。

范懿斋回麻城教一个“泥巴馆”——私塾。他学识不丰对五经四书无深刻的研究，但可以教一个“泥巴馆”。作者是他同宗的晚辈，有时到他塾中去玩，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象侃大山一样侃他参加武昌首义的历史。1948年春节我给他拜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拿出徐会之·夏斗寅的请柬给我看。首义同志会会员每逢双十节前夕，大抵都会接到来自武汉方面的军政要员邀请他们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的请柬。不过他只把这当作纪念光荣历史的陈列品，很少去赴会的。

范志鹏作为一个实业家他是极有毅力极有创造性的人，这一箱蜂是他的命。春夏之交蜜蜂忙于采花酿蜜，也是范志鹏收获的季节，他感到无穷的乐趣。蜜蜂越冬是一大难题。据说第一个冬天他的蜜蜂也遭到损失，幸好蜂王未死，还有少量工蜂幸存，真是欲哭无泪。从此开始了他的研究进程，建立档案，反复观察，对比分析，掌握蜜蜂生存活动规律，其态度严肃认真俨然一个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终于从他开始的养蜂实业稳步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使他的家庭也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

范志鹏准确地记录了每个蜂王每天产卵的数字，他悟出养蜂成败的关键是培育出优良高产卵的蜂王。他作人工培育试验，尝到失败痛苦，从失败中发现了奥秘所在。蜂王的幼虫和普通工蜂的幼虫完全一样，要制成此普通工蜂巢大的王台，大了小了都不行，他计算出准确的数据，制成木质模型蘸水后再蘸熔好的黄蜡，就是王台，今天看来一个极普通的工具却是范志鹏的一项研究成果。

第二个难题是蜂巢。他自制模型压出合格的蜂巢，但手工操作多有破损，他象绣花一样认真补呀，补出的蜂巢基本上未留痕迹。我家和范志鹏极熟，童年时常到他家去玩，看到他旁若无人的工作态度，其聚精会神的程度，使我感叹不已。我对范懿斋父子的感受是不同的，范懿斋这老头子和蔼可亲，教“泥巴馆”时往往读错了字，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里的“省”字应读作“醒”，他读成“损”音，混同省市的省，爱宣扬他的光荣历史，我觉得这老头子蛮好玩，而对范志鹏我却有一种敬畏之感，很少见他有笑的时候。1965年我浪迹江湖时回乡探亲，返湘时取道阳罗乘船至汉，有幸碰见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他就是范志鹏，我们认出来了。在惊喜之余互道家常，不胜慨叹。他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他定居青山，麻城无亲人，有生之年不回故乡了，死后把骨灰送到麻城，叶落归根嘛，也要化作故乡山脉中的一分。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晤。他的愿望实现了，1986年伍茂芳先生告诉我，范志鹏的儿子范成斌、成文、成武护送乃父的骨灰回麻城安葬。

争挤独木桥

抗日战争期间宋埠一位徐姓先生好不容易从范志鹏的小妾手中购得一箱蜜蜂，精心饲养，发展很快，成为仅次于范志鹏的第二养蜂大户。开始时范志鹏技术封锁，后来成为志同道合的友人，过从密切，常一起切磋养蜂的学问、技术。后来因为政局的动荡，徐氏养蜂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败落。——徐先生之子厚良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曾谈及此事的始

末，当时未来得及记录，现厚良先生携家远去辽宁，一时难以联系，纪此大略。

继徐氏养蜂之后，抗日战争时邑人颜白英也开始养蜂，但他的主要志趣是制造巢础和养蜂用工具。他是麻城从事养蜂实业的第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爆发全面大内战，民生凋弊，民不聊生，1946—1947年一批生活无着的公教人员相继在麻城城乡兴起养蜜蜂实业，后来成为养蜂大户。除范志鹏外，在城关区有颜伯英、范策先、颜伯明；在中驿区有陈先哲、叶道阳；在白果区有罗祥云、李俊阶；宋埠有王牧师；闵集、歧亭均有从业者，遍及城乡，形成一个大普及的浪潮。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范志鹏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养家糊口的可靠的经济来源，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是内战加速了一般知识分子贫困破产的进程，民以食为天，只好挤养蜂这根独木桥了。

脱颖而出的能人

颜伯英是一个有科技意识的人。他对麻城养蜂实业的贡献不在于他也养过蜂，而在于他精心研制巢础和各种养蜂用的工具，他打破了养蜂权威范志鹏的垄断，推动了麻城养蜂实业的发展。

颜伯英和范志鹏的区别在于一个的主要兴趣是把养蜜蜂的工具当成商品出售，一个的主要兴趣在于取蜜，把蜜糖当成商品出售。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颜伯英的思想更具有商品意识，范志鹏在对待养蜂生产资料的态度上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他们都未曾学过李嘉图，未曾学过亚当斯密，更未

曾学过马克思，没有研究过他们的经济著作。但颜伯英有市场经济意识，而范志鹏则奉行同行是冤家的封闭哲学，追求垄断。垄断是大生产和竞争的结果，从来没有小生产式的垄断，这是范志鹏的悲剧。

我最后一次见到颜伯英是1948年春天，后来我投笔从戎远去天涯浪迹三十多个春秋，1979年秋天我转业回乡时已是物换人非，颜伯英已经作古了。我从亲友的口中得知一些有关颜伯英的零星材料，据说颜伯英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有过多项发明，当过劳动模范，后在风云急变的政治浪潮中颜伯英锒铛入狱了。再后来自然平反，虽然那已不在他生前，这是历史，历史是一位公正的老人，他不会对一个有过作为的人让其永远含冤抱屈，我想颜伯英也会含笑于泉下的。

逼出来的一支从业军

范志鹏终于不能垄断一个县的养蜂实业，一支养蜂从业军在麻城城乡悄然兴起。其蜂种来源最初是从范志鹏那儿取得的，如宋埠的徐氏，麻城城关的颜伯英、范策先，再由他们扩散，逐渐普及。从范志鹏那儿购买蜂种是件难事，如徐厚良先生称其父亲是从范志鹏的亲手中购得的，先父范策先是以宗族之谊亲自向志鹏大爹恳求，先祖父范直存也上门求他转让少许，好不容易买到种蜂五个皮——半群，那是1946年秋天的事情了。先父范策先以教书为业，由于战事日繁，物价如脱缰之马飞涨不已，一个教师的薪水实在维持不了一个八口之家了。

我父亲办事认真，那年冬天冷得早，冷得邪乎，为了蜜

蜂安全越冬，他把蜂箱搬到卧室——我家住麻城县西后街抗日前是18号，胜利后改为53号。老屋被日寇炸光烧光，后来修了几间简陋的房子，即使卧室也四壁穿风，寒气逼人。父亲怕蜂子不胜寒，用棉絮将蜂箱包扎，只留一个通气的小孔。事与愿违，到春天打开一看，大部死了，不是冻死而是闷热致死的。父亲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根据西哲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蜜蜂作为一种昆虫，只有经得起无情自然法则的残酷考验才能子孙绵延不绝传至今日，过分溺爱适得其反。范志鹏也深表同情，他是过来人但不外传技艺，念在同族份上他表示支援两三皮蜂种。温房无劲草，雪地有梅花，我父亲不接受施舍，他对志鹏说：“大叔的情我领了，但不能接受无偿支援，我的蜂王还健在尚有少量工蜂幸存，春天来了，我一定要在有限的本钱上闯出一条生路来。”范志鹏这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这时也深受感动，连声说：“好样的，范氏子孙就应该有志气。”

父亲以教书育人的辛勤态度逐日记录下蜂子的动态，他十分得意，蜂王日产卵三千多，是个优良品种，范志鹏给了一个好王，蜂子发展有望，他不以邻为壑，虽然明知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可见范志鹏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在油菜和紫云英开花时，蜂子发展很快，满了群（10皮），还取了二十多斤蜜。其时我尚幼，全家高兴得象过节一样。

父亲开始了他的发展蓝图，后来成为一个养蜂大户。他初步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教师同仁们纷纷来家参观，表示要参加从业的意向。父亲爽直愿意多几个养蜂的朋友，所以一谈即妥，使养蜂作为一种副业悄然向教育界渗透，这个发

展势头为范志鹏始料未及，但他不怕，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在麻城一代养蜂大王是不会服输的。

养蜂人的集会

到1948年麻城养蜂实业出现均衡局面。

养蜂头等大户：范志鹏

城关：范志鹏、颜伯英、颜伯明昆仲

迎集：范策先（由城关迁至迎集）

中驿：陈贤哲、叶道阳

白果：罗祥云、李俊阶

闵集：钱××

宋埠：王牧师

歧亭：×××

以上可称养蜂实业大户，在他们周围还有一批作为家庭副业的养蜂者。养蜂实业投资少、见效快，有利于农业，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在取蜜季节养蜂实业大户是很忙的，除范志鹏、颜伯英独来独往外，其他养蜂者用变工方法互相支援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主家必备酒肉相待。但到我家来的客人多为教书先生大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怕蜂子伤人，帮不上忙只是凑兴。那时我在武昌求学，只有在暑假期才有机会躬逢其盛，他们或交流养蜂技艺，或谈诗论文，类似今天的学会、沙龙，无以名之，余绍礼先生戏称为“游吃队”。夏天炎热，工作之余，饭后饮茶、清谈，“大人说话细仔听”，一般无我插话的机会。那些古今中外无所不包的清谈，令人长知识

开眼界，惜当时无录音技术，要是能够记录整理成篇，不也是近代的《世说新语》、《桐阴清话》吗？

自然谈到养蜂技术，诸如人工育王技术、强群继箱法、防盗蜂、防蜂逃、防治蜂病毒等等，俨然是一次次小型养蜂学术研讨会。只有范志鹏和颜伯英二人不曾参加这类活动。

话题不断转换，也谈时局，对当局的腐败、经济崩溃、民生凋蔽等表示深深的忧虑，这些从忧患中奔走的知识分子只好喟然长叹。这时的情绪是低沉的。

但转到社会轶闻趣事时气氛又为之一变。我记得杜竹君和胡衡甫先生的两则诗话。其一是《咏某“臭皮子”和风流女士结婚》诗曰：“谁家洋号兑多多，红轿抬来小翠娥。王八有钱娶婊子，天生一对贱×厕。”杜先生是我的老师，这时我忍不住多嘴了。我说杜先生这诗一、二句情景交融，颇见功力。唯三、四句似有漫骂之嫌，先生未交代新郎、新娘人品如何，一骂了之，似不合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古训。”杜先生开怀大笑曰：“赐也始可与言诗也矣。”其二胡先生咏李培文诗，我只记得其颌联云“义井残碑移政绩，武昌牢狱有啼痕”二句，胡先生说孺子有何高见，他老人家点我的名了，我只好应曰：“孺子以为全诗警句恰在颌联，咏事论人尽在其中。窃认为律诗不可能句句都成警句，那是诗仙诗圣也做不到的。颌联要对仗，先生之作对仗不工。当然林黛玉也说过只要有奇想平仄格律倒是其次也可以不必计较了。”

“商也，始可与言诗也矣。”胡先生也大笑了。充满了欢乐轻快的气氛。

彩云星散

陈先哲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于1948年弃教养蜂，基地在麻西中驿。解放后仍在那儿经营蜂业。后来运动频繁，终于回黄陂老家，音问遂绝，不知所终。

杜竹君先生也养了少量蜜蜂。我最后见到他是1951年春天。一次星期天我从汉口罗家墩军校到汉口有事，路过中山公园，几位战友要同入园内一游，遂和杜先生偶然相遇，我向他行了军礼，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记住了我的地址，给我父亲写了信，几天后父亲到军校看我，说是杜先生写信告知的。军校从湖南迁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家信呢。父亲说杜先生境遇欠佳，语焉不详，我也不曾深问。1956年冬天我从广州军营回乡探亲路过汉口时参观了湖北省第一届全省美术作品展览，其中有杜竹君先生的一幅国画，题有“布谷声中”几个字，他是我的美术老师，我见到他的作品参展感到十分亲切。回家后才听说杜先生在汉口投了长江，我顿感惘然。他曾赐我一幅国画，上题一首古代女子的词：“飘上下，落西东，秋林树树不胜风。一叶先惊秋讯早，教人长是恨梧桐。”这幅珍贵的画在“文革”中也化为灰烬了。

胡衡甫先生是一代名中医，解放后任麻城县人民医院院长。他志在医学，精于诗律，和董必武主席有诗唱和，一时传为佳话。他养了箱把蜜蜂，纯属好玩。他不是养蜂实业户，只能说是一位“蜂友”，和养蜂人的过从甚蜜。在“文革”中他和夫人都不幸逝世，结局是十分悲惨的。

向河南新县辐射养蜂技术

1952年春天，河南新县农业局长方宗耀到麻城访问养蜂能手，和我父亲范策先相遇。相约至迎集我家，一夕畅谈，态度十分诚恳，他想在新县发展养蜂实业，但一无人材二无技术三无资金，他说我只有诚心慕名来请，不知你的想法如何，我父亲慨然应允，抵掌而谈留住三日，商定了细节。我父亲以三十多个强群及全部工具作价一千元转让给新县并作为农场正式职工奔赴新县开拓养蜂实业，拟在蜂场壮大有盈余时才结算转让费。不久即派车来接人及蜂群蜂具。次年方局长又聘我母亲李文秀加入蜂场。士为知己者死，我父母在方宗耀诚心的感召下在新县艰苦创业，大力培训学员，造就一支养蜂实业队伍。发展很快，到1957年冬天已达100个强群远征广东，在中山、东莞、淡水一线扎营，取了大量优质荔枝蜜，是岁全国大量蜜蜂涌入广东，1958年元旦后打听到铁道运输紧张，要不到车皮计划，到1958年国庆前都申请不到车皮。在请示新县农业局同意后果断地就地转蜂群，卖到现款2万余元（包括所取的荔枝蜜）电汇回新县1.5万元。留0.5万元回湖南发展蜂群。当时农场经济困难，职工工资及开春备耕经费无着，方局长及杨场长十分焦急，突然接到广东汇来现款1.5万元，真是雪里送炭大喜过望。父亲将卖蜂的经过、凭证及留少量资金到湖南恢复蜂群的计划等情写成书面报告命会计回新县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农业局批准我父母为特等劳模。我父母到湘后很快购得种蜂，经过几个蜜源期发展到了原来的规模。1958年秋天胜利返豫，那年冬

天被县委和县政府评为特等劳模。这是他们在养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父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对全国蜜源分布情况掌握了可靠的资料。他对蜜蜂的病毒有独到的研究，能及时防治，从未出过问题。由于长年奔波，工作十分辛苦，没有时间写作。他曾说等他退休后撰写两本著作——《中国蜜源》、《蜜蜂病毒学》。他培育了十多名能够独立工作的养蜂骨干，在河南新县养蜂实业也逐渐普及了。

随着局势日渐吃紧，方宗耀的历史问题又被提出来了一张国焘的营长，够怕人的。张国焘投了敌，张国焘的营长并没有投敌，有什么可怕？在那节骨眼上谁能说得清。我父亲母亲和他们领导的蜂场在“四清”后调入新县外贸局，“文革”中方宗耀倒了，外贸局长杨信昭把我父亲打成方宗耀黑线上的人物，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参加学习、批斗。父母惨淡经营的蜂场下马停办。1970年冬天，在经历了多年磨难之后的一个夜晚他到外贸局造反派那儿去晚汇报时失足从石桥上跌入河内，时置冬日水已结坚冰，至次晨始被发觉救回已负重伤，杨信昭们不给治疗，将他和母亲遣回原籍麻城。1971年4月逝世于故乡。临终前他口述给方宗耀一封诀别电报，电文云：“策先生前受先生知遇之恩，今当永诀，最后一电，结缘来世。”（时方宗耀仍在干校。）还说他半生心血记下的养蜂资料大小十数册，他编的讲义，他在北京黄子固主编的《中国养蜂杂志》发表的三十多篇文章统统被造反派烧光了……他是带着无穷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我的《哭父诗》中有“书未编成身遽逝，九京应有恨悠悠”之句。

余 音

文天祥《正气歌》中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中国的史德讲究秉笔直书，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先哲们已树立了榜样。但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是不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这个党的传统作风，才能追溯真实的历史轨迹，我倍感珍惜，文明和进步从来都是来之不易的。历史是人创造的，离开人的活动也就谈不上历史。本文从一个侧面通过一些人物活动的线索，企图多少反映一些时代变化的风貌。但历史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简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承认我不具备驾驭复杂历史材料的能力，本文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追溯而已，不免挂一漏万以致一鳞半爪而不见全龙，尚望识者指正赐教。

1992年春节初稿

国庆节二稿

开创鄂麻人工科学栽培食药 菌之起源与发展

李敬白

风动竹声清夜永，月移菊影矮篱幽。易延炳和李敬白兀坐易氏书斋，说文论哲。可是生计偷袭人心，易谈及某年前偶得驻美大使案头之中国农学界先知先学潘惕恒（志农）博士所著《人工种菌大全》一部，曾在露天试种过草菰。潘博士留美留日，是中华科学菌界之开山祖师。易又言银耳神品，价值每市斤二百元，还缺货，可算是难信难试之宝物。因此劝李从潘之高足浙江杨万周先生函授种菰技术。李敬白疑信参半，但又叹念“文革”蒙冤已离开教育工作，真想创点事业，以好为集体为身家而奋斗！

于是，1966年冬季，款信并汇，杨师函劝李学种银耳。李敬白茅塞顿开，大胆设想，立意冒险创业，试探转高山密林中栽培为平原室内栽培，函询杨先生，答以“试试看”。这正是阻碍银耳等等菌类人工科学栽培发展大道上的最大难关，也是易先生多年来不敢居处深山或野外一试的症结。1967年春，李敬白扫疑克惧，购湿栎树五十余斤，室种银耳失败！但深受教益，心更坚而意更锐。1968年春季春，李约易各购湿栎数十斤，共技分种。未几，李敬白亲

眼看到手自栽培鄂麻开天辟地以来室内科学第一朵银耳，贴开段木如水晶牡丹，时而观者如堵，真个是欣喜若狂！！不久，易先生也成了功。

1969年春，李敬白深入龟山国营茶场，多次接触干群，以实事实物和担保，解除了茶场干群重重懊恨与顾虑（因其曾在60年高价请技，全茶场遍山砍栎树几千万斤，种植白耳，终究无收！反被“技师”说成“尖砂地带不出耳”！），因而受雇于茶场夏家河大队，开种湖北第一场大规模室内人工科学植银耳，声震遐迩，上海、武汉寄信汇款到夏家河大队索购。李敬白更初次试制微少三代黑木耳栽培种。易延炳先生也在其公社开场植耳。

李敬白69年间产生幻想——将菌类扩组全县，推向省外，因而先先后后应李茂莲、叶辉钊、李汝伟、朱富宽等等请求，并为其粗宣技艺，更先后介绍给杨先生函授，同时带朱富宽去浙面杨，购白耳种，又为其在龟山买栎树，多次帮朱学习湿树、半干树和干树栽培食用菌技术。意在以青年人为头面，以李、朱等当助手，形成一个团体，呈请县人民政府批示，建成鄂麻一项新型科技体系。

1970年李敬白再赴浙江金华，旋赴福建厦门、泉州等地访问学习。万里归来，为本大队开创鄂麻此时仅有的第一个菌种场，其各地栽培场由本大队与各地协议，扩大增有金公社八个场（含公社场），茶场和龟山区几个场，安徽省几个场，品种有白耳黑耳草菇磨菇香蕈等种类。易先生及叶辉钊、李汝伟、朱富宽。再求慕莲老先生，分别在家中在小队在公社栽培食用菌。这时，已有各自争雄之势，敬白幻想渐趋破灭！！

1971—1972年，白果土产请来杨先生次子国生同志开办银耳菌种场，易先生次子元信叶辉钊、李汝伟入场学帮。李汝伟，听说也在家中仿试。杨国生说白耳母种被偷！朱富宽规联系外地买来白耳原种，为他家公社办白耳栽培菌种场，可惜后来卖出三万多瓶栽培种（每瓶一元）是错误的，朱富宽父子险遭大祸，幸公社挑了担子。这当中朱又与李汝伟等为菌种彼此发生勾斗怒骂！李敬白的幻想彻底破灭！

李敬白只得独善其身，自在本大队继续办母种—原种—栽培种一条龙菌种场。更呈请县外贸局（当时没设科委）开发开办菌品罐头场，未准。白果财政（当时省红旗单位）与李敬白所在大队先后提出三套方案，多次商谈，要过问菌种，大队则多次拒绝。因此，财政将到白果订种者都去联系李汝伟，大力维持，发展很快。稍后，李敬白复职，易延炳逝世，麻城县医药公司则请去叶辉钊。而李慕莲相继仙游……

时到今天，已历寒暑二十七，发展菌种场十多处。更是市科委、科协、生物所、菌协大力扶持，前程似锦，到此，略可慰李敬白幻想千分之几尔，易延炳先生在天之灵，亦或莞尔一笑！

政协麻城市第三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副主任：范志斌（专职）

江乐山

胡梅兰

委员：程敬顺

梅基癸

段美物

范道熙

李继唐

编 后

麻城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的文史工作，始终在主席和主席工作会议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麻城文史》第四辑，在征集、整理、编审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政协领导、本委成员、联络处主任、政协委员、机关同事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尤其是李蔚青主席极为重视，为文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李德望副主席多次赐稿、荐稿；曹正海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予以经常性的关心；一批离退休的老同志和骨干作者，不避寒暑，不计得失，收集资料和撰写稿件，为抢救麻城的文化遗产，为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由于编者的浅陋，诚恐有负重托。在工作中我们抱着虚心诚恳和求实的态度去征集、采访和编审，终因能力有限难免有疏忽和错谬之处，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文史资料以首次发表为上。本辑收录了六篇散见于市外刊物上的文章，因其反映了麻城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样捡来穿成一串，或许便于有心人翻阅而有利于麻城的两个文明建设，在此特向推荐者、原文作者和原刊物编者谨致谢忱。

编 者

1992年10月31日